0021872

现代化的动力

VISIT…

2 020 8261 9

现代化的动力

〔美〕C·E·布莱克 著
段小光 译 刘 东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钱学文
特约编辑：刘　东
封面设计：戴士和
封 面 图：魏　虹
插　　图：戴士和
装　　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现代化的动力

〔美〕C·E·布莱克 著
段小光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9.375 插页5 字数145千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344—7/C·85
印数：1—32,000册

定价：1.82元

《走向未来》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划排列）

包遵信　严济慈　杜润生　张黎群　陈一谘
陈翰伯　钟沛璋　侯外庐　钱三强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金观涛

副主编：陈越光　贾新民　唐若昕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学良　王小强　王岐山　王军衔
王晓鲁　王　焱　尹蓝天　乐秀成
朱嘉明　朱熹豪　刘　东　刘青峰
刘　溢　严家其　何维凌　张　钢
阮芳赋　陈子伶　林和生　易小冶
秦晓鹰　夏小万　翁永曦　陶德荣
黄江南　黄　鸣　萧功秦　梁晓燕
董秀玉　谢选骏　樊洪业　蔡大成
戴士和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本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G02891 v.10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脉搏，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前　言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自己弄清一些问题。我也希望别人对它感兴趣。

这项研究的第一个文本，是于1960年11月为弗吉尼亚大学詹姆斯·W·理查德比较历史讲座而准备的，当然，它与本书的形式相去甚远。但是，若没有那次富有挑战性的学术访问，这本书便不可能撰成。

这个论题的某些部分早以纲要的形式在“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政治现代化”一文中得以阐明，这篇论文是为社会科学研究协会于1959年组织的政治现代化讨论会准备的。本书的某些材料曾提供给普林斯顿大学大学生联合会1964年春主办的威瑟斯庞讲

座。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曾在美国历史联合会，现代欧洲史分会1964年12月在华盛顿市召开的会议上宣读过。

本书的研究工作连续多年得到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人文科学研究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鼎力襄助。本书是作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持的研究项目之一而出版的。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我曾在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过一年的研究，这一年为我在绝好的净心沉思的气氛中探索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提供了机会。

我也从多不胜数的好友和同事的指教和帮助中受益匪浅。最为有价值的还是多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正式研讨课和非正式的交谈以及1964年和1965年春在斯坦福大学和日本北海道大学从同事和学生那里得到的批评和激励。

C·E 布莱克

1966年5月于普林斯顿大学

目　录

前　言

一　现代化 …… 1

1 引言：革命时代的挑战 …… 3

2 现代化 …… 8

3 传统与现代性 …… 14

4 现代化的阵痛 …… 36

二　比较历史 …… 47

1 比较方法 …… 49

2 作为过程的现代化 …… 64

3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之比较 …… 69

三　现代化的政治 …… 77

1 政治与现代化…… 79
2 政治领导…… 87
3 现代化的阶段…… 94
现代性的挑战…… 96
现代化领导的强固…… 99
经济与社会的转变……105
社会的整合……112
4 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各个社会……122

四 比较现代化……131
1 比较的标准……133
2 政治现代化的七种范型……148

五 现代世界的前景……177
1 现时代的世界政治……179
2 现代世界的概念……192
3 国际整合的范型……202

六　现代化及其政策 ……215
1 历史与政策……217
2 多样性的方面……220
3 不稳定性的方面……226
4 国际行动的基础……230
5 国际性认同的形成……236

七　现代化之研究 ……241
1 形形色色的世界历史……243
2 关切人类……250
3 现代化的概念……261
4 比较的问题……271

现　代　化

1 引言：革命时代的挑战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人类的伟大的革命转变。在全世界，在各不相同的社会里，人们都在寻求将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发明运用于古老的生活问题。那些案有成效的变革范型既为人类境遇的改善开辟了亘古未有的前景，同时也以以前绝对想象不到的毁灭可能性威胁着人类。正因为差错失误有可能铸成灭顶之灾，寻求理解那些变革的力量便成了令人振奋的事业。驾驭这一革命的过程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人们是在和平中奋斗还是在战争中湮灭已到了最后的关头。只有那些最清楚地理解世界

中不同社会受诸影响的不同方式的人们（他们知道什么是必然要改变的，什么是无论花什么代价都要保留的），才具有以有益于人类幸福的方式把握这一转变的创造性。

现在人类事务正发生着的变革，从其广度和深度上说，在人类历史上只有过两次先例，因此，我们只有以整个世界历史行程为背景，才能领略这次变革的意义。第一次革命性转变是在大约一百万年以前，人类在从原始生命开始的千万年的进化之后出现了。通过放射性物质的分析，可以估计，宇宙正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业已存在了一百至二百亿年，我们的太阳系是在大约四十五亿年以前形成。又过了二十五亿年，低等生命形式开始出现，而直到十亿年之前，人类的祖先还没有出现。

由于人类以前的生命与人类生命的重大区别，我们也可将这一极其缓慢的过程称之为革命，一旦人们考察这种区别，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过分。今天，人类学家们研究狒狒群落和其它灵长类社会，以其作为理解人类以前生命的手段，他们的发现把这两个生存层次之间的差异戏剧化了。尽管灵长类动物并非完全缺乏社会情理和组织能力，但与最为原始的人类的能力相比性质也迥然不同。原始人能制造工具、武器、住所和运输工具；他们能通

过言谈和书写符号、标记进行交往；他们能组成较大的群体以求得安全和相互援助；他们靠着增产、保存、贮藏粮食并且通过各种方式使自然就范，以此在某种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此转变过程中，人脑容量比当初增长了三倍，当人开始使用工具之后，脑容量的增长速率便加快了。

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革命转变是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转变，这次转变于七千年前在三个地区达到顶点。这三个地区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尼罗河谷，印度河谷。具有同等意义但却完全可能是独立的革命也相继在克里特岛，黄河河谷、中美洲和几个安第斯河谷发生。克里特和中国的文明社会出现于五千年前，中美洲和安第斯的文明社会则出现于大约四千年前；在这七个地区中，从土地的简单耕作到有组织的农业生产的转变，从村落、部族到城市、国家的转变，都采取了一种明确的形式。尽管中美洲和安第斯仍然非常原始，可是那些比原始社会更大也更为复杂的文明社会却拥有了交往的文字系统。

更重要的是，文明社会都有自己成熟的观念，这些观念表现于宗教信仰中，其中包括有关人之本性的观念、天人关系的观念，以及经验给予人们的深层真理的观念，这些观念以前完全超出了人的理

解范围。那些早期宗教一般都对水、土、生殖感兴趣，它们使用各种抽象的符号表达自己关于内在于已知世界之中的永恒真理的观念。这种理解水平反映着一种精神态势，即：知识的大大扩展不再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像在原始人那里的状况），而是势如破竹地向前发展，赋予了人类事务一种求变的能力，甚至也带给人们以前从未料到的不稳定性。文明社会在几个世纪内便改变了自己的特征并飞速发展，有时也未能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在七个原始的文明社会中，印度和中国尽管命运多舛，却一直持续存在到今天，并在印度教、佛教和儒教中得到表达。中美洲和安第斯文明业已解体并被同化，没有留下有意义的遗产。余下的三个文明社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将其知识与体制传诸后来的一些社会，它们经过几个世纪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并未失去其本质特性。这种特性（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它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关于人和环境之本质的观念）被以最抽象的形态反映在那些伟大的宗教：即希伯来的、希腊罗马的、伊朗的、基督教的（包括它的东方形态和西方形态）以及伊斯兰的宗教之中。观察者依据自己的兴趣和观察角度可以从各种结构来研究这些社会，把它们看作各种文明、文化、语言集团，或者

政治和经济系统。

那些原始文明社会的后继者并非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它们在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时，也并非获得了同样的成功。为何有些社会成功了而另外一些社会却失败了，这仍然是一个估猜推测的问题，尽管我们从最基本的层次上可以说，这必定是因为领导者在维护传统的价值形式（它是社会聚合的基础）和适应新的知识（它要求修改传统的价值系统）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方面无能为力，而这种平衡是生存之所需。将这些社会彼此区别开来的正是它们各自对传统体制的特定适应性，这表现在宗教、语言、文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某种对环境的一般理解（这种环境使它们处于相似的技术层次上），以及主要凭藉过去接受的真理，而很少依据客观实验看待知识的态度。这些传统社会彼此共存，相互影响，但没有一个社会在知识和力量上有足够的优势去支配其他社会。

现时代的变革过程像从前人生命到人的生命，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一样，具有重大意义，它是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发生伟大革命转变的根本动力。有所不同的是，在现时时代，自科学革命以来，知识得到惊人的增长，同时，适应这种知识的空前努力，已经逐渐成为全人类的要求。人们审视

着自从人类存在以来第一次成为全球性的机会和危险，把握机会、控制危险的需要便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本书的研究所关切的正是现时代的这种变化过程，它是人类历史上又一场伟大的革命转变。本章要界定现代性的特征（我们可以将这些特征设定为普遍有效的）并从一般意义上探讨诸社会在使传统体制适应现代功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第二章要涉及在对现时代中人的经验总体作系统概括时所运用的比较方法以及有关问题。第三章要从一种编年学的观点考察现代化的进程，阐明各个社会都会出现的某些主要变化阶段。第四章在比较的基础上，依据七种主要范型考察170多个当代社会在面对现代化的特殊的政治问题时的经验。第五和第六章研究现代化过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及其对于可以预见的将来中之政策的意义。最后，第七章探讨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寻求理解人在现时代的发展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对现代化研究的现状进行考察。

2 现 代 化

“现代化”作为一个描述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

事务发生迅速变革的过程的一般概念，出现较晚，但是“现代”作为一个指称当前时代性质的术语可以追溯到六世纪晚期拉丁语的用法，这个术语首先在拉丁文中，尔后在英文和其他语言中被用于区别当代和“古代”的作家与作品；到了十七世纪，“现代性”、“现代派”和“现代化”被运用于各种多少有限制的、专门化的语境。“现代”，在早些时候，往往被赋予一种陈腐平庸的贬义（一如我们将其直译为“摩登”时所具的含义一样者），莎士比亚一直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当英国作家把法国革命的领导人称作“现代派”时，他们无疑也是在贬义上使用这个词。然而，还是有人在更为客观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们逐渐放弃了已为普遍接受的以基督纪元为基础的历史分期，开始采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期。人们当初认为现代历史随着君士坦丁堡的衰落或美洲的发现而突然开始，如果人们想说得确定一点，也可以说现代史开始于1453年5月29日红日东升之时或1492年10月12日凌晨2时，但是，现在更流行的说法是，现代史开始于“1500年前后”。

在上一辈人那里，“现代性”被相当广泛地用于描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最先进国家的共同特征，而“现代化”则被用于描述

这些国家获得这些特征的过程。乍看起来，“现代化”一词可能给人以同义反复的印象——使事情变得更现代，或渴望追随比自己先进的东西——但是，用“基督教化”或“工业化”指称基督教的引进或工业引进亦是同义反复。有所不同的是基督教和工业都有公认的意涵，而“现代性”尚不能表达一种被广泛理解或接受的意义。本章的目的就是去弄清这个术语的含义。

“现代化”不是唯一用于描述这个过程的名词。“欧化”和“西化”也是在这种一般意义下被使用的，尤其是在描述近代较先进的国家对较落后的国家的影响时。然而这种影响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尽管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它不仅不能说明先进国家本身当初转变的过程，而且也不能说明曾经落后的国家对仍然落后的国家的影响。我们不能把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转变过程称作“西化”，也不能把二十世纪日本对满洲的影响说成是“欧化”。在其他意义上使用的一些术语诸如“工业化”、“工业革命”、“带来希望的革命”均嫌过于狭窄。它们所强调的仅仅是经济方面，技术革命的直接后果，不能表达转变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普遍渗透的特征。另外，“改革”倒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术语，但它可以用于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

所发生的一切变革。同时，它也可以专用于技术革新。

本文使用的"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过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它发源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那么"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从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这种适应过程发源于西欧一些国家并开始产生影响，在十九、二十世纪，这些变革延伸到所有其他国家，并导致了一场影响各种人际关系的世界性转变。政治科学家往往将"现代化"一词限于指称伴随着工业化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但是，只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定义才更适于描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各方面的相互关联。

大凡已被广泛接受的解释都有其文化上的约束力和决定论的特性，它一直阻碍着人们理解现代化过程的努力。显然，那种认为"进步"便是把被误认为对西欧和英语国家是正确的变革观念向全世界投射的观点是不严格的。

其他被广泛坚持的观点往往是以狭义的决定论为特征的，它力图根据某一个初始因或促动因说明一切变化。这些理论缺乏对社会过程的根本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理解，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它们确信基本问题的解决已为期不远，只要这种理论包涵的纲领被普遍接受，或许在我们有生之年基本问题便能得以解决。像"现代化"这样一个术语的优点不仅在于它的范围比"西化"、"欧化"、"工业化"、甚至进步更广，而且在于它对于意义的拓宽并无大碍。

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生活在十五世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到今日的大不列颠，他该会发现哪些东西是熟悉的，哪些东西是陌生的呢？他或许对书写语言还略知一二；某些宗教仪式可能还是熟悉的；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纪念性建筑可能还巍然耸立着；在乡间村里，田园生活起码乍看上去还未发生太大变化。然而，转变还是令人瞠目结舌，他所闻所见大多已是沧海桑田，面目全非了。

这种转变所发生的过程可以从既定的体制对变化着的功能的适应来讨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经历着这一过程的体制界定为世界上各种社会的传统体制。然而，"传统"与"现代"是两个相对概念，在这里，我是在特定的意义上使用它们。对于西欧各国而言，传统体制就是中世纪的那

些体制，现代性对传统体系的挑战发生于十二至十八世纪。我们在所有其他社会中，也都可以发现这种尚未受到现代性挑战的比较传统的阶段。在那些最不发达的社会里，传统阶段一直持续着并长驱直入二十世纪。在率先建设现代化的那些社会中，由于现代性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因而转变过程徐徐展开，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在后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中，这种挑战越发来自于外部，因而转变来得更迅速、更突然。当然，那些仍处于传统状态的社会各自不同，有的已经老到圆熟，有的还仅仅是部族。但其共同点在于：它们实际上已构成了从历史中演进而成的特殊体制模式的背景，这种特殊的体制模式适应现代性的功能并且赋予每一现代化社会以自己的特性。

现代并不像传统那样五花八门，就其特殊的功能而言，现代性的特征对于全人类来说大体上是相同的，但若要证明这种共同性则大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社会尚未发展到使这些现代性清晰可见的地步。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亦仍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只有借助于想象才能猜度这些国家的哪些特征可能是一切现代社会的共同特点，哪些只是源自各个独特社会之文化的特点。

5 传统与现代性

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同时都发生着转变。现代化的过程极为复杂，无法将其用寥寥数语归纳之，否则就将大错特错。然而，考虑到本文的研究方向，人的各种活动可以从理智、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五个方面来讨论。显然，它们实际上是为了方便起见所采用的不无任意性的范畴，是为人熟稔的术语，对其进行过于严格的界定或许是错误的。另外一点也许是清楚的，人的活动的各个方面，无论如何被界定被概念化，都处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而且只有用审慎的而又灵活的方式才能分门别类地讨论它们。

①理智方面 从理智领域开始谈起是恰当的，因为在现时代的变革过程中，人对其环境的全部复杂性的理解和控制力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显然真正发生变革的只有人的知识，这是因为在人们开始理解自然环境的潜在性之前，它的丰富业已存在，而且，在历史的时间中，人及其环境的演进变革历来是无意义的。历史学家们将现代知识在西欧的直接起源追溯到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那时，希腊和阿拉伯一些学者的著

作已渐为人知，建立恒长秩序的创造性工作业已在各方面展开。这种文艺复兴的基础就是这种认识：寻求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合理的说明是可能的。在自然科学方面，西欧于十三、十四世纪达到了古希腊和阿拉伯所达到的水平，而这种自然科学给现时代烙下了很深的印记。到了十七世纪，对自然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增长，但这在人的掌握之中既成为强有力的工具也成为祸水之源。

毫无疑问，科学革命在人对其环境的理解中孕育着最富戏剧性的变革，但实际上，这只是对公认的行为方式进行的更全面重估的一个方面。的确，人的所有观念都受到了严格检验，理智活动的各领域都经历着迅速转变，这一代人从这个或那个方面推倒了上一代人的偶像，变革是一切知识的常态——已成为人们应为接受的观念。

如果人们能在观念领域寻求到一种简明的增长模式，寻求到实际经验，政治思想、文学艺术与关于人、上帝宇宙本质的沉思之间相互作用的简明的增长模式，那将是令人鼓舞的。相互作用是连续性的，而且，在知识的积累尚未达到现在这样的复杂状态时，个别伟大的心灵在众多知识领域前沿创造性地发挥作用是可能的。与其说人们是要寻找一种简单的模式，不如说由于相互沟通和相互激励的日

益便利，由于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至今天不同领域的出类拔萃之辈都难以理解相互间的研究实质），人们必须考虑到在其他许多方向上发挥作用的各种思想。

欧洲历史学家发现，根据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反改革，启蒙时代或者唯物论时代，以及某个与此类似的仍作为一个有用参照系的传统时期来描述人们理解力的演进是便利的。尤为重要的是，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这种理智革命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了欧洲的成果。早期人类的智慧受惠于古希腊、阿拉伯和印度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已为众所周知，在中国和东南亚也有相应富有贡献的发展。然而，现代对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理解方面的伟大成就，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的功绩，那时其他社会已变得老于世故，盘算着是否有必要参与这种太大的冒险。甚至在今天大学和研究所已遍及全球的情况下，欧洲原先的理智创造中心仍在人类所努力的许多领域拥有最多的天才，即使他们在某些领域受到挑战和超越，那也主要是其他英语国家以及曾是他们学生的俄国人所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不少人把现代化看作是"欧化"或"西化"。知识的积累以及对知识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无疑是通常最能被接受的现代化的方面，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

式，它处于现代化过程的核心地位。

过去，理智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科学以技术的形式运用于人的实际事务。在现时代，始终不变的主题之一是新知识为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提供了机会，而且，这是一种伟大成就得以表现的氛围。无论是在机器制造、交通运输、农业还是医疗卫生方面，新技术都使人类处理自身事务的方式发生了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指望食宿、教育、医疗条件最终充分地提供给每一个人，而且贫困也有可能被最终消除。不仅商品与服务在量上不断成倍增长，而且人均使用的能量也在持续提高。由于自动化，对人力的需要进一步迅速削减，有意义的人为地改变气候的可能已经能够被设想了。

科学态度也影响着人生所欲特的价值。建立在早期有关世界之本质观念上的神学体系和宗教信念正面临重新估价的要求，以便区分其中代表永恒真理的那些信仰方面和反映着特定时代和文化观念的那些方面。信念和价值总处于变化之中，但现时代是一个特别强调批判态度的时代，在这种价值重估的过程中，人的利益自然成了人们首先关切的问题。现时代从物质上改善人的生存条件的潜力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对这方面的关切超过了其他任何方面。历史学日益专注于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文学

领域，小说成了一种人们最喜爱的表达感情的方式，这或许是因为小说尤为适合探究现时代特有的无限复杂的问题。现代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深刻关切着社会变革，关切着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冲突，关切着处于一个特别缺乏稳定行为规范的时代的人之命运。在所有这些方面，人的本质，人的生活，人的前景，成了现代思想关切的核心。

自十二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着的探索精神和方法产生了意义深远且丰富多彩的成果。在对之进行反思时，重要的是要看到，不少最为引人瞩目的贡献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做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理智丰产的时代。据估计，在最发达的国家有占总数四分之一的人口和资源被以各种形式专用于知识的生产和分配，这个比例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的三倍。1850年，世界上定期出版的科学期刊的总数约为十万册，而到了2000年，科学期刊的出版总数将有可能达到一百万册。自从1450年以来，正式出版的书籍每二十年就翻一番，现在已出版到三千万册左右，1980年计划出版六千万册。在发达国家，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数在以更快的速率增加。的确，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在时间和能源耗费总额上所占份额的增长速率必须要减少，因为按现在的速率，它在不久的将来会把一切人和资料都吸引过

去，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对知识的关切在现时代居于中心地位。

②政治方面　现代化的政治内涵在公众和个人领域出现的决策的强化方面最显而易见。这种决策的强化无疑部分地归因于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发展，这种发展使得行政管理人员从单一的基础不断扩展到更大的事业与区域。然而，决策的强化更应归功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中推行现代化的领导人为了获得更大的控制力、效率和生产而表现出来的动员社会资源并使之合理化的要求。

在公共事务领域，这种决策的强化采取了国家行政机构日益集中化的方式。尽管世界上各种传统政治形式极不相同，但在过去，国家之权威一般均未能抵达每一臣民。国家的权威通常限于对外抵御侵犯，对内维护纲常法纪，从事全国工程，并征收足够的赋税以完成这些功能。即使在中国和俄国这种素有独裁和集权的传统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威亦只能通过各种中介才间接抵达每一个个体农民。在进入现代之前，政治权力通常由为数众多的权力当局分享，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众帝王才成功地制服把持地方一级权力的各层政体，因此在全国基础上强固了他们的权力。在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上，那些最扣人心弦的篇章无不载满中央、区域、地方

政权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厮杀的内战。

现代国家正是从这种地方政权的强固之中崛起，尔后又进一步在某种功能基础上将其权力扩展到历来属于私人或地方的各种活动领域。原由家庭、乡村、地主、教会和其他各种力量所执行的功能，都逐步集中到国家手中。在某些社会中，教育、交通、运输、社会安全乃至产品制造等一切功能皆归属国家，其他许多活动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国家的控制下展开。即使在那些具有强烈的地方权力传统的社会，诸如瑞士和美国，当年中央政权仍免不了以牺牲地方政权为代价来提高自己的权力。在这些社会，私人企业具有坚实的根基，但并非与强大的中央政府冰炭不容，它一般都有最富成效的生产方法。在那些有史以来国家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的社会里，或者在那些战火、劫难一直殃及私人企业的国家中，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各种形式的国家经济统制。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都趋向于把那些其他机构不能有效地执行的功能吸收过来，而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因具体社会历史上发展而来的不同的能力而相互有别。今天的各现代国家为了补偿日常行政、国有企业、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开支，征收的税额大致上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而在传统社会，这种税收

可能相当于或低于生产财富的百分之五。

要使现代国家的功能相对集中化合理化，若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由官僚科层维护的法治以及国家与每一个社会成员之间密切的关系便是不可能的。的确，由一种法律体系代替个人专断行政是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一块界碑，承担着诸多任务的现代行政机关若不依靠法制而依靠其他基础，便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专断式的抉择在较高的决策层，甚至在较低的决策层仍然是必要的，因为一种法律体系不会排斥其他多种多样的选择，但是，选择的范围要受制于众所公认的规范，否则，一个现代国家就将无法很好地发挥功能。由那些献身于国家事务的人组成相当规模的官僚科层是现实所需。适合于多种多样机构的组织原则一直在发展着，而现代行政方法和管理技能则使各种复杂的方针政策有效地得以实施。

由于国家第一次与社会的每一成员发生了直接的关系，现代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便是必不可少的。若没有公民的理解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自己的角色，国家就不可能完成有关国家岁入、对外政策、国民教育、社会安全以及其他难以计数的各种功能。然而，大众参与在政治上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在那些有着根深蒂固的个人权利传统的社会

里，现代政府在下述意义上可以说是典型的民主的：所有的公民均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政治领导人和政策的选择；个人的选择权由有效的公民自由得以保障。在其他一些社会，这种密切关系可以靠各种形式的民众启蒙和宣传运动来维持，而一旦靠其他方式无法取得认同，那它就要靠警察手段来强制。然而，就是在控制极为严密的警察国家，主要还是依靠政治宣传和经济刺激来获得必须程度的公众承认和参与。纯粹靠恫吓威胁不可能管理现代政治系统，现代独裁者也得通过思想控制、公民投票和名义上的代表机构来竭力赢得公众支持。

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居民各种方式的承认和参与，以致国家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提高这种承认的能力来决定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安全状况会把不同的地区划分为相互有别的政治单位。的确，有人会说，大陆范围内或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系统按今天的理解不还是一体的么？但事实上，一个国家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不能大到超出支撑它的基础。这种基础通常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其中共同的历史经验无疑是最有意义的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种共同的语言是这种经验的主要特征，民族主义一直是现代国家特有的集合点。它一再被证明是强化忠诚的最有效的手

段，否则这种忠诚就会为对其他各种联合的依附所分裂。然而，语言民族主义决非建立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先决条件，甚至不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有许多例证表明 国家可以是多民族的，可以由多种宗教或各种信仰组合而成。的确，国家的疆界难以恰好与某种语言或其他形式的民族性重合，而将疆界与语言密切关联起来的努力一再导致无休止的冲突。毫无疑问，具有共同语言传统的人群群落往往不致于造成四分五裂的政治实体。为联邦制和少数民族权益而制订的各项条款正是从消除这种分离的努力中发展出来的。

在相对互为隔绝的现代国家中出现人类的组织意味着：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组织问题必须用与传统不同的政治方法来解决。自从十七世纪以来，主要解决方法一直是国际法和外交原则的展开，它使得现代国家在处理某类问题时有可能不必诉诸武力。这种国际法和外交原则的展开所导致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国际组织的建立，其目的在于运用专门化的功能（诸如通讯）影响各个国家。最近，具有更广泛的维护和平之政治功能的世界性组织也建立起来了。

上述关于在现代条件下决策强化的考察，既适用于公共领域也适用于私人领域。在我们考虑某一

地区时，私人企业也愈发变得集中化和科层化。在纯粹谈及规模的功效时，理所当然地会产生意见分歧。一个企业集中的程度必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企业之活动的实质。有时得承认，如国家能够更好地协调、整合一个社会的各种复杂因素，那么国营企业本来就比私营企业更现代些。然而，历史经验并没有表明这样的事实。就现代性而言，从本质上考虑的是其功效，对这一社会有效的组织形式对另一社会未必有效。功效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活动内在的本质，因为没有哪个现代社会发现自己能在纯粹私有基础上管理军队，从事全民初等教育或承担基本建设项目。至于其他活动类型，其功效主要依赖于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有些社会多少世纪以来一直长于私有企业的管理，而其它社会长期以来则主要依靠国营管理并且没有发展出个人的或其他企业形式的价值系统。因此，一个社会中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关系与其说是其发展水平的功能，倒不如说是其文化遗产的功能。

即使在那些私有企业有着极为深厚之根基的社会里，用于生产的财产大部分也从私人所有转变为法人所有。在这种法人形式中，财产管理者可以不是财产所有者，财产的使用受到国家为了公共福利而施加的种种限制的制约。生产财产的国有化是一

种由来已久的控制形式，当年，在国王靠着剥夺冥顽不化的领主和教会机构的房地产寻求国家强化时，它便成了西欧社会的一个特征。在发达的社会里，法人财产之受国家的控制（通过税收和其它管理形式），比那些原则上属于中央经济统制或极权主义的不发达国家对国有财产的控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另一方面，对消费财产的控制，在自由经营社会一直不像经济统制社会那样严格。就此而言，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为了公众利益（它由政治领袖来解释）对生产财产实行公共管理。不管这种公共管理是通过公有制实施（如在经济统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借助法律制约，都依赖于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依赖于政治及其领导的偶然因素，而不是依赖于现代性的程度。

③经济方面　经济发展可以从储备和投资这两个重要的相互关联的功能来讨论。传统经济实质上趋于将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殆尽，几乎不留下投资和增长的余地。如果人口的增长快于生产的增长的话，那么在不发展经济中，即使有少量的储备也无济于事。用于投资的资源储备以人均纯剩余为先决条件；正是这种剩余的有效利用使得发展成为可能。两三个世纪以前，当现在的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时，它得益于相当高的人均收入和人均

耕地面积。这的确是西欧各国率先发展的原因之一。从总体上说，西欧各国当时的这些水准要高出今天那些不发达国家几倍，将新技术运用于这种相对繁荣起来的经济导致了风驰电掣般的增长。与这种增长相随的是一定程度的专门化。正是这种专门化使得远比以前更大的剩余生产成为可能，因而也使更大的储备成为可能。

与专门化相伴随的势必是国内外贸易的扩大，它有可能将广阔的资源与人力整合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经济系统。传统的农业社区实际上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它运用当地能提供的资源生产出它所需要的粮食、衣物、工具的绝大部分，只是偶尔从流动商贩那里购买些商品，而一个现代社区则可能全力以赴地生产某些产品，并从外面购进它所需要绝大部分供给品。储备可以采取私人利润或国家税收的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都会提出许多涉及储备所能实现的途径的政策问题。

投资是分配资源的补充功能，储备和投资通常是由相同机构来行使的，例如政府、银行、企业、个人。投资政策有赖于一种经济的各种能力，也有赖于投资者的目的和经验。一般说来，在生产资料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交通运输、原材料生产、工厂建设，重型机械——将会导致更快的经济发展，

但也将会对人口问题造成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在消费资料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将会有益于人口问题，但也将会削弱经济生产的能力。而且，在这个方面，社会的选择并非总是自由的，因为，一个社会只有在相当发展之后，才有可能强调生活资料。然而，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对这两种投资方式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的选择，有些政治领导为了生产资料的迅速发展而准备让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而另外一些政治领导则宁愿提供逐年提高的生活标准，甚至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亦复如此。

现代化的经济方面一直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不少人把它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力量和决定力量。实际上，不管怎么说，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过程的理智方面和政治方面，依赖于知识的增长和政治领导动员资源的能力。然而，经济的增长无疑对每一个人发生着影响。在较发达的社会中，人均实际收入在过去二、三百年里，大约提高了十到二十倍，或者更多。这种增长的内在原因是科学技术革命，它通过劳动的机械化，有可能使生产的增长令人惊诧。在这方面像在其他领域一样，现代形式的改革也能追溯到中世纪，但是十九、二十世纪迅速的工业化把这个过程引向其最富

生气的阶段。

由于专门化的提高，商品交换与服务交换的领域不断扩大，国内与国际间往来和贸易的屏障被逐渐摧毁。这使得由大批量产品供应的大规模市场，随着商品单价的相应削减和每小时劳动实际收入的增加而被创造出来。市场的扩大对农业的影响并不亚于工业与贸易，机器在人的一切活动领域都成了人的助手。

在经济领域中，传统和现代性的不同可以用各种尺度一目了然地加以说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被广为采用的指标，尽管它有许多弱点，在十多个最发达的社会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00美元到2500美元之间，而在25个约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在现代社会中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用于重新投资，刺激了经济在几十年内持续迅速增长。在传统社会中，情况相反，仅仅只有二十分之一或者更少比例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再投资，同时人口增长率快于经济的增长，因此，几十年来，人民变得越来越穷。那些能够和不能有效地利用技术的社会之间经济增长的水平和方式的深刻不同，通过比较今天的发达社会和不发达社会，比较几个世纪前的那些发达社会和不发达社会可略见一

斑。各种社会在拥有的资源与掌握的技术方面如此不相同，以致我们无法断定所有社会都能达到与现在那些发达国家同样的发展速率和水平。的确，历史表明，二十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在扩大。要想寻求说明这种增长趋势的差异性，就要跨出经济领域而深入政治、社会、心理领域。

④社会方面　深刻的社会变革伴随并补充着现代化的理智、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多少代以来，几乎仅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从事行政、制造和贸易，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可能只需几代人就变得只剩下相当少的人留在农村。与这种职业变化相伴随的是大量人口向城市迁徙，也可能只需几代人，便有四分之三或者更多的人口生活在都市里。这种都市化逐渐使得家庭发生意义深远的转变；通常与农耕生活相联系的几世同堂大家族变成只有父母和孩子构成的较小的核心家庭。在发达社会里，地理上的流动性更大，每年大约有五分之一或者更多的人口从一地搬迁到另一地，以适应职业的需要。

这些趋势与收入、教育和机会各方面的相当水平相关联。无论如何，让大家都处于社会和政治角色的相同层次是无法达到的。事实上，人们疑惑，

社会分工最终能否消灭。姑且不谈个人的天赋能力大不相同，一个社会的功能需要也呼唤着众多而各异的角色分工，从最高层次的富有想象力的领袖到同样必要但不太起眼的工作：饲养牲畜，清扫街道。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无论在什么社会，领导人（有时也被称之为“精英”）的构成与训练是最为重要的事。

现代化相伴随的还有文化教育的扩大，传统社会仅有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人识文断字，而现在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掌握了这种能力。联合教育的发展在某些社会业已达到这种程度：全民享受中等教育，三分之一的适龄人接受正式的高等教育，这导致了信息获取与信息传播方面的革命。

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进入现代之前，妇女的地位一直基于这种状况：大多数人尚赖以重体力劳动谋生，而惟有男人最胜任这种重体力劳动。随着体力劳动逐渐为机器劳动以及文牍工作和脑力劳动所取代，大工业削弱了由来已久的功能的不平等，这对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接受的男女关系的范式提出挑战，男女关系上的这种变革充满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实可行的体制形式现

在只在较发达的社会得到阐明。教育历来是妇女解放的主要途径，教育使得妇女们适应技术性的、管理性的、以及文牍性的职业。与此同时，妇女的法定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转变。她们被赋予与男人同等的机会与责任。

通过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介，热心人能够不断接触到许多领域的发展状况。通讯网络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并使得社会中众多分散因素维持一种密切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报纸的年发行量每一千人为250到500份，每年人均国内邮件交换为100到350件，每千人拥有收音机250到950台，电视机为50到300台，每年人均看电影10到25场，传统社会在上个世纪以前尚无任何这种通讯手段，甚至在今天，它们所拥有的这些通讯手段也极为有限。

由于现代化的成就，只需要很少一部分人去谋稻粮，而在早年，大部分人必须从事农业生产。在发达社会中，各种职业之间在劳动收入和劳动条件方面的差异大大被缩小。的确，由于机器越来越多地承担了以前由人力从事的工作，劳动角色本身的比例也显得更小。在这些社会中，一半以上的人从事技术性、服务性和文牍性的工作，体力劳动角色相应减少了。

同样令人瞩目的变化还有，由于现在医疗条件

的发展，人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在传统社会，出生和死亡的比率通常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之间，长期以来，一直相对稳定保持这个水平。随着现代医疗条件和环境卫生的发展，死亡率已迅速下降，而出生率则一直保持着高速度。在发达社会中，由于客观状况的压力和家务活动的变迁，出生率在有效地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平缓。早先，欧洲人口从1800年的一亿八千八百万增长到1914年的四亿六千二百万。在那些较晚发展的国家中，现代医疗条件的影响更为强烈地被感受到，但出生率却继续遵循着传统的方式，因此，那里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在现代社会中，1000个新生婴儿中，死亡数字下降到16到30人，而估计寿命高达70至75岁。在传统社会中，每1000个新生婴儿中，死亡数字高达100到225人，而估计寿命低达25至50岁。在现代社会中，每500到1000个居民中便有一个受过训练的医生；在传统社会中，每10000到100000个居民中才有一个医生。

与此同时，现代化促进了收入更为平等的分配。这种情况不仅是由于在较为发达的社会中分级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贮备趋于缩小收入的差距，而且是因为高生产必然依赖于高消费。由于社会的工业化，从长远来看，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境

况都会得到改善，而且相对说来收入不高的那些人要比收入较高的人受益更多。的确，一种高生产的经济若没有能吸收其产品的大批消费者就会崩溃。在传统社会中，百分之五的最上层的收入比百分之五十的下层社会高出15倍到20倍；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这个比例接近四比一或五比一。收入的分配不只是与发展水平相关联，但那却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收入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与西欧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相同的，而在“社会主义”的苏联，相对说来，收入的分配更不平等，这与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其他社会相类似。

这些复杂的变革构成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被归诸于社会动员，即义务承诺的中心从诸多个人转向社团，从地方转向国家领域。社会动员是现代社会中大批人口从其传统的农村住所自然迁居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通过通讯手段的大大扩展而提高了对国家利益方面以及外部更广大世界的认识的必然结果。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内邮政的流量相对于海外邮政的流量来说，增长的趋势更大，同样，在国民收入中，国内贸易比国际贸易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些趋向，尽管在各个国家中不尽一致，但看来都反映了在国家层次上以及在文化、政治忠诚、经济利益和社会信赖各方面资源和技术动

员的加强，也反映着与地方和国际领域的联系在相应减弱。社会动员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借助于激励民族主义和经济社会的整合，而促进全国水平的认同的形成，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了国家共同体对其所有公民的控制。

（5）心理方面　现代化的心理方面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为最后我们要分析，它是一切事物都要依赖的个人的感知过程。单个人适应其环境的方式，在其生命的早期阶段，是常态地接受家庭影响的结果，在其生命的后期阶段，亦可能是受在孩提时代业已建立起来的坚固的模式之强有力影响的结果。在一个典型的稳定的传统社会中，孩子有可能模仿成人，他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遵循着可以预见的范式。在地方性的社区中，孩子们了解以后在生活中将要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众所公认的方式。当其进入成年以后，大多数人是按照地方上以往的习惯处理生活中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首创性和独创性行为大受限制。

传统社会的极为僵硬的社会结构也倾向于抑制个人主义，大多数农民从来不希望改变自己的职业，人数较少的大地主、武士、商人、僧侣和统治者，构成社会中圈子狭小的阶层，他们亦趋于坐守承袭而来的地位，那种由渴望有所进步，渴望获得

新的特权所激励的成就感因而受到限制。传统社会大多数成员相对静态的生活也使他们没有去适应孩提时代未曾碰到的人与境况的要求，人们几乎没有关于山外青山或水外绿水的更广阔世界的概念。当然，我们不应夸大传统生活的静态性质。由于每一个人都经历着生活的循环，他与其他人发生关系的范式会不断发生变化。在一切时代，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努力间，自我与他人间的紧张均衡状态之中。可是从一种相对意义上说，传统世界在社会方面是静止的，其行为方式倾向于代复一代，稳定不变，即使在战争和迁徙时期亦复如此。

人的本性与人际关系等根本问题，并不会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改变，但它们受不同环境的影响。一个根本的不同是现代条件下缺乏传统社会的相对稳定性。父母生活所遵循的规范等到孩子长大以后可能已经过时，行为方式由于社会条件的改变和外来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不断变化。支撑这些变化的社会流动性也影响成人之间的关系。在农民大规模迁入城镇的情况下，手工业工人变成管理者，被赋予特权的精英集团必定与以前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为了大量新的工作展开竞争。适应能力、创造精神、主动热情是获取成功的素质。青年人受其同辈人的影响比受父辈的影响更大，个人主义比服从遵命具

有更高的价值。大部分人都可能得到升迁性流动的机会，而在传统社会中他们从未想到过改变职业和居所。人从传统社会中沉淀下来的那种一直窒息个性的习惯和信仰中解放出来。在将来某个时候，知识增长的新的平稳时期可能会容纳一种新的稳定性，但那个时代尚未被见到。今天发达社会确确实实发生着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刻更迅猛的变革。

在传统社会中，个人通常主要被卷入与家庭、地方社区以及他们所属的功能团体的关系中。他们倾向于根据由自己在其中有安全感的狭小交游圈子所培育的狭隘观点来看待他人，他们没有理解其他观点或鉴别不同的行为方式的能力，而把一切异国他乡的人和习俗视为敌对的。更有甚者，在传统社会中，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诚然，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历练深广，通达世故的人，也有一定程度的改革和社会变革；各种类型的反抗和迁徙证明了不稳定状况的存在。然而，相对而言，传统社会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

4 现代化的阵痛

上述关于传统与现代性之主要不同的走马观花

式的检视，目的在于强调那些发展和改进了的因素，它或许表达了这种观念：人类从现代化的过程中受益匪浅。在某种程度上说，情况确实如此；的确，常常会听到这种论断：一旦人的新知能使一切人受益，那么就到达一个“进步”的时代。于是，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便被构想出来，人们指望在乌托邦中人类一切形式的病态都将被克服；即使是那些严谨的、不具空想目的的社会研究者也在讨论世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摆脱战争与贫困的可能性。然而，众所周知，现代化所伴随的却是人类业已看到的最大的灾难。现在，人所拥有的极为精良的武器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生命。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其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

在现代性所带来的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新的生活方式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蕴含着旧的生活方式的破坏。如果人们想象现代化是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的整合和重建，那么他们也必定会想到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在一个合理的整合完善的社会中，体制有效地运行，人们一般在追求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上是一致的，暴力与动乱被控制在较低的限度。然而，当意义深远而势头迅猛的变革席卷而来之时，社会中没有任何一对因素能以同等速率适应这些变革，社会动荡可能会变

得不可收拾以致广泛的暴乱突如其来，大批大批的人被迫出走，正常的政府已变得不可能——所有这一切在现时代都屡见不鲜。

因而，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现时代比其以前任何时代都更是一个谋杀的时代，一个国内战争、宗教战争、国际战争的时代，一个以多种形式大屠杀的时代，一个集中营的时代。人类生活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了直接的目的而被轻而易举地出卖。民族主义，在为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社会中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力量，一旦国家获得成功，它很容易变成保守和压迫的力量。很少有政治领袖具有将其人民作为人的需要置于国家目标之上的远见。司空见惯的是：将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而且不惜牺牲这些目的而以狂热和冷酷的手段去搏杀。

以过时原则为基础的知识系统已逐渐破坏，现代世界中的无数个人除了眼前需要和目标之外找不到其他方向的依据。通常体现在宗教教条和神学教义中的永恒真理不可思议地被丢弃了，因为它们是以被认为过了时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但这些真理后来却往往工作为最新的现代科学的启示而被重新发现并被宣明。人的二重本性的悖反——同时既是理

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在人类早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经过多少代之后，当有识之士呼吁理性崇拜之时，这种二重本性却再次被现代心理学证实了。对现代的渴望往往导致对过眼云烟的赞美欢呼，对以传统制度形式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的不断拒斥。

政治整合和集中化的过程尤其危害着人与体制。民族史赞颂那些打败地方政权、使教会受到控制、夺取邻国领土的统治者的丰功伟绩。每一种诸如此类的行动都可能有助于国家的强大和整合，因而也有助于国家锻造出一个现代社会的根本能力。然而它们不仅蕴含着大量屠戮，也蕴含着多少代以来一直在成功地发挥着作用的体制和组织的覆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当清洗掉已缔结成网的地方官员之后，中央政府必须寻找其他人来代为执行同样的功能，而这些人往往更无能力，更没经验。

现代化的过程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这就是：它既趋向于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层次上集中政权，同时又趋向于在更大的结构中整合人的活动的各个方面，有时要把全人类都卷进来。当普遍有效的知识系统第一次展开的时候，当各个社会的安全日益依赖远远超出自己疆界的那些因素的时候，当生产系统需要某一社会无法提供的原材料、市场和技术的时候，当社会关系和文化体制覆盖了

国家的边远地区的时候，当个人的倾向发展到获取自己国家疆界之外的价值的时候——到了这时，人的活动的各个方面就必须在有组织的控制下发挥作用，行使有组织的控制就越来越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层次上，集中于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层次上。现代化发展到目前阶段，独立自主与相互依赖之间矛盾的增长是当代国际关系危机的根本所在。

有时，人们认为现时代尤为倾向于国际主义，但事实远非如此。在传统社会彼此不同的人们往往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乐于在大而松散的联合帝国中结成流动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系，并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较为普遍承认的语言。今天，现代化不可抗拒的要求在国家层次上已集中到这种程度：对国家危亡攸关的各种国际组织只有在绝不干涉本质上属于成员国内部管辖范围内的事务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只有当对和平的威胁非常之大，而大国愿意互让解决它们的分歧并采取适当措施阻止大规模战争时干涉才被许可。

现时代动荡不安之特征的另一个根源是发展中的现代整合社会对曾经演化展开的传统和价值造成威胁，当时这些传统和价值是由一个较小的特权领袖集团所培育的。这个问题使得严肃的研究者追问：如果每个人都必须受教育，高质量的教育是否

还能存在下去？如果观念和规范必须用人人都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它能否不受侵蚀？如果每个人都能使人们感受到他的影响，民主是否还有用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担忧无疑会出现在从前有特权的领袖集团中，他们忿恨自己的特权不可避免地要被瓜分。然而在一个整合后社会或大众社会中，保证质量的问题不能说已得到了解决。当国家预算必须通过那些代表着无数彼此不一致的利益集团的人们才能获准的时候，当文学艺术在失去财政支持的威胁下必须迎合广大观众的时候——姑且只举两例——问题便成了现实。

现代化带来的其它社会问题也同样严重。在许多不发展国家中，当死亡率下降之后出生率却一直很高，人口的增长以相当大的幅度超过粮食产量和制造品的任何可能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农业和工业靠地方的努力和外来的援助而促进，人均产量仍可能下降。这些国家的人们不愿意采取控制生育的措施是因为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作祟，它们的变化速率远远落后于医疗水平的发展。印度就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那里不仅不使用控制生育的措施，而且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还拒绝宰杀那些漫游不羁、经常毁坏庄稼的牲畜和吞食大量水果与坚果的猴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道德禁忌要

比人的需要和成千上万人的苦难更为优先。

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为了提供必要的投资，大多数人口的消费水平必须保持稳定，这种情况可以缓解人口问题。但是，当人口增长业已快于生产时，该怎么办呢？言重一些说，答案尚未找到。在相对发展的国家，诸如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的俄国，在新的工业生产的优越性尚未广泛收益之前，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出现了绝对的下降，并且一直持续了一代或几代人。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增长起点要比那些较新的国家高得多，它们享有更有利的发展条件。

现代化对人格的稳定和认同的影响也是令人担忧的。传统社会由其环境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在那里，文化遗产经历千百年，变化甚慢，而老人则是这种文化遗产的公认受托者。孩子在家庭邻里的一片安全感的氛围中长大，他们乐于与自己社区的成员发生面对面的关系，但与具有不同文化遗产的人们却是相对隔绝的。这种环境和关系有助于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因此，传统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从不会因遭遇规范和价值冲突而紧张。

虽然个人调节的基本心理问题不可能因时代而变，而且侵略性人格、被动性人格以及神经病患

者，精神病患者可能极为鲜见，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调节的环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文化遗产迅速被削弱，而让位于基本不确定的规范和价值。孩子成长的环境、培育他们的规范直接受到各种潮流的影响，都市化改变了家庭结构，地方社区解体了，农民丢弃了乡村而奔向城市，而且时有出走海外的。随着劳动机械化而发生的男女之间关系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多少世纪以来区别男女角色的古老的认同方式。

比起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不大受其环境的支配，就此而言，个人更自由了。但同时，他更无法确定自己的目的，而且在大动荡的时代，他要准备着为了有目的的领导而交出自己的自由。这就是所谓的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个人认同特征的丧失。现代环境倾向于把社会原子化，它使得社会成员失去共存感和归属感，而没有这些，个人的实现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完成。不少人把个人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视为现时代的标志，这可以直接追踪到现代化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分裂。

传统规范和价值的解体从标志现代社会特征的各种形式的病态中显现出来。尽管难以证明，但一般人们都相信，各种类型的社会混乱——普通犯罪、少年犯罪、离婚、自杀、精神病等——在变成

较为现代的社会中频率加快。在此种倾向之下出现了这种情况：由于成千上万的人从乡村向城区迁徙，在亲密无间的环境中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被松开了，而且对传统社会的那些规范和有效法令的遵奉也被削弱了。从一般意义上说，个人的这种孤立就被称之为异化。

异化的核心就是社会的非人格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全部生活——工作、持家、饮食、健康、交往、娱乐——都由各种科层组织来管理，科层组织倾向于把人当作数字、物体或抽象物来对待。人们可能居住在公寓套房中而不认得自己的邻居；在办公室或工厂里工作同事们每月一换；从不相识的人那里购买食物，在餐馆里陌生的人群中进餐；或靠电器转播、或在剧场和体育馆挤在素不相识的人群中欣赏文娱节目；在礼仪、教士、会众都不熟悉的教堂中做礼拜；从孩提时代便和父母没有亲密的关系；在大街上潜伏着危险的、没有树木和动物绝迹的环境中生活。的确，个人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在现代军队中也比在发达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大都市中更受重视。从个人与其环境之关系的角度来看，现代大都市中这种非人格化的生活方式（或许因为强调问题而有些言重了，但它却是千百万人典型的生活方式）就在于与传统乡村社会亲密

无间的共同生活极端对立，没有多少人能令人满意地调节自己以适应现代环境，而且那些有助于个人健康调节的社会组织形式尚有待发展出来。

与这些变革相关的是暴力事件的增长，增长的途径尚不完全清楚，但它也是随现代化而来的。对从1820年到1949年精细的但并非结论性的世界性估价表明，大的战争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并付出了46800000个生命的代价，比较起来，同一时期2900000个生命丧生于小规模的群体暴力，而9700000人丧生于1—3人以上的凶杀。我们或许从下面的事实中获得某些安慰：由于暴力而上升的丧生人数没有超过世界人口的增长。尽管比较统计对人类的早期历史并无效用，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在现代社会，因暴力而丧生的人的比例远比传统社会大得多。

在这些暴力事件中，无疑有些可以归结于政治领袖的恣意妄为，但大多只能解释为由现代性内在变革的激进特点所造成。这些变革要将人类行为的所有方式都裹挟进去，与此相应，它们在个人与体制的认同和安全方面是令人不安的。传统体制与功能必须改变，而不经过一番斗争它们是不会让位的，在国内方面，暴力采取各种形式致力于强固国家政权，镇压叛乱，推翻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从传

统的政治领导向现代的转变总是要卷入暴力，并往往发生相当激烈而持久的内战。在国际方面，多民族帝国的解体，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新建国家的领土统一，新老国家的安全防卫——所有这些过程都充满了暴力。这种暴力主要集中在率先进入现代化的欧洲和英语国家，或许使人们发展出现代知识并将其运用于人类事务的创造性和活力就伴随着一种莫明其妙的好战性。拉美、亚洲、非洲等各个社会能否不用暴力而实现相当程度的现代性尚有待证实。

从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内在的问题来看，较为现代的社会不比传统社会更自由，从总的或绝对的意义上说，较为现代的社会不比传统社会更文明。现代社会由于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的环境有了更深的理解，因而便有了更大的能力确保人类的物质福利；然而它们同时面临着更复杂的人与社会的问题并掌握了更大的行使暴力和毁灭的能力。现代社会的任务是充分利用自己的机会，并尽最大的努力防范自己力量中的毁灭潜能以保卫自己。

二

比较历史

1 比 较 方 法

比较研究在对人类的问题进行系统概括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因而对这种方法的使用以及滥用特别值得注意。在这一点上，注意一下近来有关大脑机制的研究是令人感兴趣的，它表明：我们人类作为计算机，其信息的储存、整理和回忆以一个联想和相互联系的系统为基础，而这个系统的特征从根本上说是相对的。在整理人和自然所体现的多种多样的数据中，比较是一种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所有描述性术语都蕴含着许多实例，无论是一般的词汇如“树”、“人”，还是较为特殊的术语如“国

王”、“奴隶”、“机器”等都是适用于成千上万个实例的、具有不同程度复杂性的概括或模式。这些术语，来自于对事物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考察，在此意义上，它们是以比较方法为基础的。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甚至人们致力于研究独一无二的事物，也难以写出一个不含概括性术语的句子来，而概括性术语适用于对多种事例的观察并以此为基础。

然而，这里所关切的并不是思维和逻辑上的一般意义的比较，而毋宁是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之特殊运用的比较。在本书的意义上，比较用于两个相关的目的，首先是对复杂事物的整理和分类。即使是在讨论一个小的社区时，也不可能孤立地描述其每一个成员及其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对个人的描述必须依据于群体，群体建立在通过比较而得到的一致性的基础上，而这些比较往往越是明确便越是含混。在那些较大的群体，如几个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历史记述中诉诸一般概念显得更为重要，而诸如：“伊斯兰”、“民族主义”、“农民”等每一个范畴都反映着以诸多相互有别的事实为基础的一致性。为着整理和概括的目的，我们必须强调由这些范畴所标志的一致性，并且首先必须讨论各种变化以作为确定术语适用范围的例证。

比较的第二个目的在于解释，解释与整理要运用相同的比较原则。如果说，整理所关切的是已完成的事件并且具有一种静态的性质，那么解释则关切变化，关切历史的动力。然而它们的主要区别并不在方法上而在所比较的对象上。整理所关切的是体制和形式，解释所关切的则是功能和原因。就此而论，在这两种运用比较的方法中，解释更为不可靠。体制的性质和同一性比较容易确定，但功能和原因的研究却是另外一回事，它要牵涉一连串事件的比较。一系列力量和动机的比较，对它的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学者们的见地并要求尽可能的客观。解释的欲望往往是由当代某些紧迫的问题所呼唤出来的，要求解答问题的压力可能促使某一学者提出一种不成熟的假说，然而这会对他的研究产生歪曲。假说和证据不断相互作用是学术研究的特征，它需要我们在其间不偏不倚，甚至当我们研究与个人兴趣相去甚远的对象时也需如此。当学者们被从历史中寻求有可能影响当代问题的解决的答案的愿望激发起来，人们更可能经受不住那种要求提出不成熟的假说的压力——的确，历史学家往往要屈从。

* * *

如果说比较对于用以整理和解释历史材料的概

括而言是如此的重要，那么，为什么人们常常对它表示怀疑呢？在历史学中，对比较方法的抵制似乎主要来自关于历史事件不可重复的信念。个人的存在可能容易比较，而那种全人类的共性则过于宽泛，只有依据充分的把握才能说明各种差异。然而，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一群人的问题，有时是几百万人的问题，考虑到他们在较长的时间里，在复杂的环境里共同引动并相互影响，情况就反过来了。这种群体中的差异可能很大，而且普遍性的因素限制于极其一般的范型，或许乍一看上去，这种范型并无太大解释的价值。

随着一代历史学家迅速成长，而历史研究的课题日益分化，强调历史事件不可重复性的观点（有时被称之为“客观主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档案工作和其他原始资料搜集工作的发展激励了这种趋向，以致于出现了这种情况：成卷成卷的书可能写的只是几天中发生的事，或是关于一件事的抉择。在其先辈那里，当历史研究从神学中脱颖而出时，历史学家们通常还是从全人类的角度和通史的角度思考问题。但今天，多半是这种情况：普遍性留给了预言家、百科全书编纂者、教科书编写者，而历史学家则以其才能去作了专业学者，他们所炫耀的是自己的专门知识。就其强调精确、翔

实、严谨使用证据而言，这种态度有很大价值，它对于构成专门史的基础是大有好处的，然而，这种态度也暗含着缺乏自信心和缺乏想象力，而且只希求借助于掌握范围有限的知识，恪守众所公认的观点而获得理智上的安全。

这种关于历史事件不可重复的信念和对翔实精确的知识的关切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那些过分坚持从历史研究中可以获得普遍有效的规律的人的反动。这些规律的炮制者，在其还未进行研究之前，便设想好了具有普遍性的发展模式；他们把自己的设想引向这种信念：这些模式确实能被投射向无限的未来。这些决定论的解释把普遍的系统建立在古代模式的有限的基础上，建立在一个特殊国家、一个种族群集或宗教团体的民族性上，或者建立在某种社会关系（诸如阶级冲突）上。规律的炮制者以为，这对人的经验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被推广到荒诞程度的、基础狭窄的结论，往往被委以解释并解决人类的问题双重救世大任。这种理论上荒谬实践上无用的决定论，从本质上说与严肃的学者无缘，而对忽视历史中的比较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伟大的历史规律的炮制者们，说得好些是受高尚动机的激励，他们的研究有时歪打正着，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识，说得差些是净生产一些粗

制滥造的一般法则来蛊惑那些稚嫩的心灵，并使得历史学术所能达到的理解程度染上恶名。

规律炮制者们还羞羞答答地承认他们的概括的价值是有限制的，但其门徒们却往往连这种羞羞答答也不要了。起初，这些概括仅仅是一种假说，或隐喻，到了那些门徒的手中便成了万世不变的规律。一旦这种关于历史规律的信念输入政治领域，有时便会被当作清洗成千上万人以至数百万人的藉口（据说这些人阻碍了“规律”的实现）。一个喜好历史决定论体系的国家、种族、阶级或政党，一旦其主张被认为是受以往全部历史经验支持的，即使是最极端的实现手段也会被辩解为正义合理的。

* * *

比较方法确实有它的漏洞，但这不应成为大量使用这种基本工具撰写历史的障碍。在一个人类作为全体第一次严肃地承当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同时也承当了有组织从事毁灭的基础的时代，人们不能不接受进行更广泛概括的挑战，而这种概括的有效性正有赖于比较。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运用了比较方法，而在于如何运用它，以便能够避免它的漏洞并利用它所提供的机会。

不管比较是用作整理性概括的基础，还是用于

寻求原因的解释，进行有效的比较时所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这些问题：（1）时间中的关系，（2）被比较的对象的界定，（3）证据的运用，（4）概括的系统阐述。

①文明社会业已存在了七千年左右，富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们企图在寻找可资比较的材料时吸取人类的全部经验。很清楚，在这里，对同一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体制进行比较的价值远比对在时间上相互远隔的事件和体制进行比较要大得多。比较那些合乎情理地关切着相同问题的社会或较小的群体要比比较相隔几世纪而存在的社会，更有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如果人们要研究政治领导和奴隶制度，无疑，从古埃及和古希腊寻找体制方面的例证与现代阿拉伯世界和美国相比较是合理的。但这种比较的困难在于，由于一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总体文化，所以，时间间距拉得越大，其一致性便越是虚设的，而差异性便越是真实的。

然而，强调同时代性也有它的问题。不会有两个社会在一给定的时间点上处于相同的发展水平，即使它们可能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并具有相同的影响。如果从今天苏联和美国在许多重要方面相互展开着竞赛来看，就应当将苏联和今日的美国相比较

吗？如果从人均生产的产量、农业和工业的平衡、中等教育的普及性较为相近来看，就应当将苏联和三十年前的美国相比较吗？在尼日利亚和其他处于不同水平的政治整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之间，能进行有效的比较吗？比较的合理性有赖于对所挑选的问题的界定，而且，如果被比较的对象都能表明其有意义的差异，比较的解释性价值便会大大提高。

②历史比较的价值也依赖于对所比较的对象的精心界定。比较的基础越是特殊和受限，比较的结果就越是精确。对人权条款和议会程序规则的比较要比对各种文明的比较更能得到精确的概括。概括的价值与所比事件的具体性成正比。在有关人的问题的概括中，比较的单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比较的单位必须大到足以产生一般性的结论，因为我们无法指望从比较地方政府体系中了解到大量的人类问题。然而，这些单位也必须具体到足以进行有效的比较。历史学家遇到的困难在于，人们总是以“文明”、“文化”、“文化——历史类型”，或“社会文化系统”作为他们比较的基础。这些庞大的对象通常是根据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和价值系统来界定的，往往也掺入某种程度的政治霸权。诸如此类的文明决非是自明的，在如何描述它们的问题上，确

切地说，在到底有多少种文明的问题上，历史学家们有很大的分歧。由于比较的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所比较的文明的构成与数目，因此，对这些对象加以界定便成了非同小可的问题。

标志现代特征的变化一直发生在一种政治行为的框架中。就此而论，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国家、民族、政体）比更为模糊的所谓“文明”和“文化”提供了更为合适的比较基础。然而，就是把这些较为具体的对象当作比较的基础仍有某些严重的欠缺。其中不算太小的一个限制是这个事实：各种政治上的有组织的社会在结构和性质方面相去甚远。这些社会小到具有长期稳定的政治传统，相对同质的社会（诸如丹麦或泰国），大到通过征服或劝诱而由大而复杂的次社会群集统一而成的共同政治结构（如中国、英国、美国、印度和苏联）。同时，有些小社会（如黎巴嫩）混居着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观点的居民，而有些大社会（如日本）却是相当同质化的。在某些情况下，社会进入现时代后，在规模、结构、政治忠诚甚至地理位置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些社会的变化也波及到它们那些已获得独立并与其他社会相互融合的、仍保留着宗主国文化的海外领地。此外，不少社会已兼容并蓄了许多地区的差别，因

而已难以对社会整体作出完善的概括。这样，我们就必须转向个人存在以寻求分析的个别单位，尽管有些人具有分裂的人格。

尽管将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用作分析的基础存在着一些欠缺，但它对于研究现时代具有明显的优势。现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民族感情和目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关于现代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标志现时代特征的法令法规、统计数据、纲领计划和各种成就主要是以政治形式表达出来的，而且思想倾向往往要依据特殊社会的问题来阐释。现代社会的全部复杂性可能最好地反映在政治观念、政治纲领、政治问题和政治制度上。“文明”和“文化”作为一种考虑古代社会的框架或许有某些效用，但它们不是现代社会经营运作的框架。“文化”或“文明”并不能批准一项法律或建立一支军队。

比较对于研究人类整体是适用的，对于研究比民族国家低的层次可能也是适用的。对诸如奴隶主义、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帝国主义等各种体制和各种革命所作的富有价值的比较，可能会比那种对一些明确的和含糊的对象或一系列事件的比较，产生更完善的结果。这些中观比较关切的只是人类事务的有限的方面，它们解释的价值正在于不图谋超

出这些限制，除非这样做能提出对有关事物的洞见。

③第三方面的问题，牵涉到在进行比较中对证据的运用。近年来，由于许多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们寻求以整个世界为基础进行比较研究，这个问题便显得特别重要。建立在统计数据上的一些比较（诸如：国家的规模与人口、都市化和文化教育的程度、宗教、语言、种族集团的分布，或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的分配等），其基础往往是不牢固的。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人口统计学也有百分之五的允许误差，在其他国家，这种误差更大。以中国为例，人口总数的允许误差可能高达五千万人。当然，极为精确的统计还是有可能得到的。

问题最大的还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专家们仍未能就用什么来衡量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许多纳入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因素只是一种粗糙的近似值。当人们将世界上各种通货兑换成美元，而汇兑率成了他们自己的价值时，这种近似值变得更为粗糙，计算通过两种不同通货的均衡估价给弄得更不精确。当这种估价用以人口数字为基础的人均水平来表达时，这种不精确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人口数字本身就是粗糙的近似值。每当看到表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错落有致的数字退后了一个美元，

或描绘这种年变化率的数据的图表出现了百分之一的分数，敦厚的历史学便的确该引起警惕了。这种数据图表并不比政治科学家或历史学家在比较中惯用的主观判断更实在(虽说仍需谨慎地把握它们)。另外，精确合理的统计只在为数很少的国家得到应用，而且刚刚起步了几十年。

体制的比较，只要经过认真的选择，并没有多大危险。行政立法制度、政治系统、官僚科层、警察和军队的社会作用等都可以进行比较。这些体制在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形式，但它们在一般情况下都易于确定并且可以提供数据收集和比较的依据。如果我们以模糊不清的标准为依据（诸如，政治稳定性、意识形态倾向性、政治的文化适应、利益结合、利益聚集等）而进行各种社会的比较，那是不会得到富有成果的结论的，即使是持相同观点的学者也难以就这些术语的意义达成一致的意见。

④最后一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到比较方法在系统阐述概括中所使用的方式。在理伦上我们可以在任何事件系列中寻找统一性，不管它们在性质上如何有别于时间上如何不同；但在实践上我们必须在有限的参照系中寻求统一性和差异性并举。历史比较中一个常见的欠缺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寻找相同事件

或体制的相同原因，这往往源自于一种先验推断，即仅仅以某些相关事例的研究为基础，设想或确定出共同原因，然后便将其应用于一切同类的事例。这种做法会导致忽视那些超出历史学家视野的一切因素，结果往往是一种类比而不是比较。

在系统阐释一个比较的问题中，重要的是将功能和结构或体制区别开来。鉴别功能和结构总是不容易的，它们的区别在生物学中比在人类社会中更明显。一切有生之物小到阿米巴，大到大象，都执行着进食、呼吸、循环、排泄、生长和生育等相同的功能，但这些功能执行所依赖的结构或器官却大相径庭。如果将这种区别应用于人类社会，可以说，言谈和交流是功能，语言是结构；利益集团的代表是功能，职业机构和政党是结构，维护秩序是功能，官僚科层和法令法规是结构。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应从功能和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可能是最富成效的方法。

在系统阐释一个比较的问题中，另一个方法是将模型或理想类型用作比较的基础。实际上，这包括两个阶段的比较。第一个阶段是模型的定义（如议会、政府等），它依赖于对此一范畴中现存事例的比较。第二阶段是用这种模型作为构思比较的基础，以探索在各类这种模型由以发生的情况下，这

种模型会在多大程度上出于共同的始源，反映着共同的环境等等。这种方法使我们有可能分清从属变化的结构和独立变化的结构，相互关联的结构和共同变化的结构，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整理那些挑选出来的问题的资料，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下得出具有解释性、预见性的结论。无论用什么方法来系统阐述这些问题，它们实质上都是在每一阶段被细心鉴别地被比较的对象，是被明确界定的常项和变项之间的关系。

当哲学家们讨论历史之解释的问题时，他们喜欢采取泾渭分明的立场，要么坚持特殊的，相对的独一无二的立场，要么坚持一般的、绝对的、普遍适用的立场。这种两极对峙的态度在哲学判断中或许是有用的，但它与从事实践的历史学家的经验不符。历史学家既关心特殊的东西又关心一般的东西——而且，特殊的东西决不会特殊到只能用适合于一种情况的词语来描述，一般的东西也不会一般到足以用自然科学一向详尽发挥的各种相互关联的概括系统来系统阐释。

对于从事实践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不是一个是否问题，而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且这个程度依赖于所使用的比较标准。强加于历史学家的限制不是逻辑的而是史实的。历史学家所处理的材料要比任

何一门自然科学或所有自然科学加在一起处理的材料都要复杂得多。而且，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概括所需要的许多信息已不复存在。即使有关当代历史的档案记录卷帙浩繁，那与自然科学所可能拥有的文献相比也只是人们作出解释和概括所必须了解的一小部分文献而已。以历史材料为基础复制出自然科学家所提供的那种概括性的规律是不可能的。

比较方法的漏洞和全面概括中可能遇到的限制不应成为不断扩大包括整个人类的现代社会的研究的禁锢。不久以前，历史学家还在概括欧洲的情况（并且仅仅根据个别国家作出概括）面前踌躇不前，而现在已到了系统阐述关于整个人类在现时代状况的概括的时候了。有不少观点的模式我们是应当避免的：提出自开天辟地以来，相互竞争的文明之谱系的历史；把整个人类的经验看作一种观念作用的结果的历史；把现代世界简单看成西欧和英语世界中所发展出的制度向其他一切人类扩展的历史。

然而，另外一些类型的概括有可能产生有意义结果，譬如，那种基于对人类现在组织成的一百三十多个独立国家从历史上演化而来的传统体制进行比较的概括，那种基于对传统以及现代的体制和功能所发生的对抗进行比较的概括，以及那种基于对传统体制适应现代功能的不同方式进行比较的概

括。至于被比较的对象是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体制、过程还是观念体系并不重要，只要它们具有历史的现实性就够了。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概括能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问题，但是这些概括能够使历史学家对现代世界的理解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他们将自己固守于研究不可重复的东西时所做不到的。

2 作为过程的现代化

把现代化看作一个传统体制适用于现代功能的过程是很有用处的，只要对功能方法中内在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功能主义是分析一个系统的运作的最常用的方法，也是依据系统各部分所执行的功能阐明其相互关系的最常用的方法。功能方法对于研究现代化的价值在于它把各种社会看成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生命机体的各种系统、各种体制或各种机构，并且可以根据其为维护这种系统的存在所采取的方式来考察它们。把社会当作一些体制和功能来研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从经验上予以研究，这样便能澄清标志人的行为特征的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

功能方法的使用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问题。就

这种分析具有说明维持系统所必须的诸功能的目的而言，它有一种固有的偏好均衡的倾向。如果人们是在根据一个火炉和一个恒温器去分析一种被设计用来为一个房间供热的机械装置的运作，偏好均衡并无多大妨碍。在某种情况下，说明性逻辑的循环性与功能的循环性是一致的。然而，当研究的是人类事务方面的问题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偏好均衡的倾向就成为一种严重的欠缺。在行为科学中，功能主义也大有言过其实的危险，它有可能夸大人类事务中理智方面和目的性的方面而忽略那些非理性的方面或那些植根在传统行为方式之中以致相对不受理性驾驭或控制的方面。

在关于社会的研究中，偏好均衡的倾向，以及功能方法中的循环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忽视了变化的因素。在均衡状态下分析一个社会势必导致狭隘的结论，因为社会决非处于均衡状态。社会永远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与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相比，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变化更迅速、更彻底。这种变化的终极源泉是知识的增长，它对体制所执行的各种功能施以直接的影响。理智创造，政治整合，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人格调节等，所有这些在最一般意义上标志着现代特征的功能均具有动态性质，它要求自近几世纪以来，当人的能力大大

提高，逐渐开始被感受到时，便已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体制基本上适应这种动态性质。

重要的是，功能可以迅速地变化，甚至可能深受一个人的影响——他可能是一个改革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者，一个揭示了大自然一项新的秘密的探索者，或一个发展了一种人类事务新理论的创造者。确定地球是圆的，蒸汽机能做大量马力和人力之功，猪肉加以适当的蒸煮食之便无危险，生育控制能采用简宜而有效的方法等事实，毕竟由少数人，承担起来了。而改变成千上万人的信仰方式和行为方式，却没有相应的捷径。

有时，人们认为，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个人能够一呼百应，率众向前。然而，个人的魅力纵然再大，也只能将一个社会牵动一两寸而已。在这些领袖的谆谆德教化为人们内在的东西之前，他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方式可能已形成几世纪了。尽管这种接受是由于与前已存在的信念无数次的重大妥协而逐渐实现的。人们一想到圣诞节，必定会联想到圣诞老人和基督诞生，并且会联想到亚热带植物枝叶环绕着的耶稣诞生图，旁边是缀满礼物的冷杉树；或者人们一想到复活节，便会联想到在小兔、鸡蛋、羔羊、郁金香的装点下耶稣复活与春之来临同欢共庆。这些使我们看到实践

和信仰的新旧交替，循环往复如何可能形成一种和谐的整体，无论它对于那些榆木疙瘩脑袋或夫子气的头脑可能显得是多么地不合情理。

功能变化几乎不依靠什么，因此常常迅速而轻易，结构变化所依据的条件甚多，因而缓慢而频难。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调节功能与结构，调节新知和旧俗，而这决非易事，所有体制都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于变化，有些体制可能连年激变不衰。在不发达社会中，家庭可能是生产、教育和社会安全各方面实际上的基本单位，而在现代社会中，家庭的功能则可能仅限于青年人的社会化。有些传统体制易于适应现代功能，譬如，官僚专制制度不能不适应现代集中化的行政管理。其他一些体制，诸如部落制，便难以指望保存下去。

不管体制方面的变化有多大，适应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传统体制的许多特征仍保留下来。传统体制的不少特点，正是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体制才得以继续存在并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在这方面最明显或许也是极端的例子是语言，语言被看作是执行着交往功能的一套体制。传统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发展出许多根本不同而且相互难以理解的概念，如果将其作一比较，这种不同就相当于两种语言在语法和词汇上的不同。由于这两种文化都在不断现

代化，它们对其周围世界的理解趋于合流，径直达到这一点：现代知识的普遍性使得观念能够相当完善准确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两种语言的结构也可能改变了.至少,通过借用，出现了用完全相同的术语描述某种典型的现代事物的情况。然而这种结构的变化很可能微乎其微，比如，汉语和英语仍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大相径庭。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大多情况下，体制的变化比汉语和英语发生的变化要大得多，但是传统体制完全改变其功能也是极为罕见的。家庭、政治系统、宗教价值、文字符号都表明对几个世纪以来诸多方面的功能变化是适应的。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导向一种趋同状态，或者说，导向一种功能的普遍化，但只要世界上175个社会作为各种系统保持着彼此相对分离的状态，就不可能导向体制的普遍化。这一点很明显，日本与法国，英国与苏联，墨西哥与波兰在功能上变得越来越相似，但在体制结构上却没有出现相应的趋同现象。它们要做的事情越来越相近，但它们做事情的方式在一些重要方面仍大不相同。

3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之比较

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比较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或政体既会遇到政治性质的问题，也会遇到较为抽像的方法论问题。社会并非简单地作为抽象物而存在，也不象植物那样分离独在。各种社会维持着相互的关系，人们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他们可以各种方式被隔离、被重新安置。的确，在将来某个时刻，我们今天所知的从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将趋于同化为一个较大的实体不是没有可能的。

因此，我们考察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既要将其当作独立的实体，即正在适应现代功能的传统体制，也要将其当作受诸多外力影响的社会。的确，外来影响非常之大，以致有时现代化被认为首先是一种文化引进，即对另一社会文化特质的适应。对建设现代化的社会进行比较，至关重要的是区分国内的变化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较发达的社会体现的模式所起的作用。除却在那些曾率先展开现代化的社会之外，从事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所采用的模式多多少少总是来自于自己的社会之外。然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却是本国的问题，就其性质而言是独一无二的问题。因此，同时关注两个层次

上的比较是必要的：既要关注国内传统体制适应现代功能之各种方式的比较，也要关注为这种适应提供根据的现代性之各种模式的比较。

在讨论变化过程时，与众多具有各种传统体制的社会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专门术语，但这些术语只有在其原始意义形成的历史关系的框架中才是适用的。我们似乎只能作这样的取舍：要么只是在严格限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要么放弃这些术语而寻求更抽象的术语，甚至寻求适于千变万化情况的富有各种意义的新词。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曾被认为具有绝对不同的意义，但时间磨钝了它的各自锐不可及的边缘。若“资本主义”意味着使用资产生产财富，那么，共产主义国家全都是资本主义的；但是若“资本主义”意味着私人所有制，私人掌握生产资料，那么，那里存在的是国家、集体、私人多种因素混合控制的状态，而且国家直接参与在其中所起作用不低于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若“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占有用于生产的财产，那么的确有些社会在国家占有方面原则上比另外一些社会走得更远。若“社会主义”意味着在真实意义上按人分配财富，那么，大多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最趋近于社会主

义。这很容易证实，比如瑞典，联合王国，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比苏联或那些“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更加具有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最好不要去修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应从功能方面去描述私人或国家占有或控制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诸方面的问题。

“民主”这个术语也存在着多少相似的情况，民主，原义意味着在一个系统中由人民来管理，在这个系统中，主导性的政治文化和人权的实际保障使得政治领导者有可能密切响应大多数人的意愿。一旦这个系统的支持者们谈的只是“经济民主”，那么他们就是在毁坏“民主”的完整性。“经济民主”从字面上看如果不是意味着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同，经济问题在民主的形式上是决定性的，那么这个概念就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经济民主”仅仅只是意指经济上的平均主义。非民主社会在生产财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平均社会的事实而未妨碍这一概念的沿用。“民主”一词由于被当作一个一般的术语用来指称所有未被共产党“征服”的政府，而进一步被弄得模糊不清。一旦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民主”一词，它便包罗了许多明显各不相同的政府。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用“民主”意指共产

主义的控制，以与“帝国主义”相对照，并且使用诸如“国家民主”和“人民民主”之类的字眼指称共产主义政治影响的程度，“民主”一词也是被弄得含混不堪。在这种情况下，要澄清问题，最好还是根据代表制的程度和类型、竞争政党的数目、调和相互冲突的集团利益的方式和人权的形式来描述各种政府。

从“阶级”的角度描述组成社会的各个集团（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范畴，还是社会科学家们经常喜欢使用的“上层阶级”、“中间阶级”、“低层阶级”等各种类型，亦是陈年遗风，它已不再行之有效了。譬如，在革命前的法国，三级议会传统上是三个分离的等级的聚会，这三个等级是贵族、僧侣，以及代表着律师、实业家、商人、手工业者、工人和农民的第三等级。第三等级的最终胜利摧毁了这种传统系统，但是这种把人分成几个较大的集团的习俗却遗留了下来，而这些集团所呈现的特征与那些等级是相同的。当初第三等级中较有影响的成员后来据信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且伴随工业化而来的迅速的都市化很快导致了新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产生。

对这种分类起码有两种异议。异议之一是：经

验考察业已表明，社会实际上被划分为数众多小群体，诸如职业的、宗教的、组织的、政治的等各种小群体，它们依据特殊的利益和抉择以各种范型结合而成。这些范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各不相同的集团的成员如何识别自己的角色和利益，并且依赖于各种时兴的意识形态或关于现实的解释。异议之二是："阶级"的概念源于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那种特殊的过分简单的分类法，因此使用这个词难以脱出当年所赋之意义的窠臼。这样，最好的办法还是丢弃陈旧的术语，而使用近些年来由行为科学家发展的更为精确的概念，诸如：职业类型、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等。

* * *

为了弄清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区别，人们总是从近几百年来变化之本质的一般概念着手。通过对所有社会和社会的个别方面的比较，人们关于现代的实际特性的精确概念以及哪些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特性的精确概念便逐渐出现了。这种较新的现代性的观念在能清楚确定的范围内当然是以那些因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最有影响的少数社会的经验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应当重视这种可能性：在这些国家，表现为"现代"的东西可能主要归因

于它们的发展的特质转变为普遍的性质，后来从事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其经验会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我们的观点。早期研究者以为代议制政府是现代性的一般特征，因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用了代议制。但以后的经验和研究对这个结论提出了许多质疑。代议制政府可能是封建社会各阶层用以代表自己利益的方式的现代化，而具有其他传统政治体制的社会则可能从不同的方向上展开现代化。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从出于较狭窄基础上的概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现代性的定义仍采取了据信能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的一系列特征的形式。这种现代性的概念，一旦被看作一种模式或一种理想类型，便会被当作一种衡量任何社会的尺度来使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所碰到的主要的重大阶段（我们在第三章中将要讨论）同样有可能被当作模式或理想类型。像现代性一样，它们的一致性基于对相对不发达的社会的经验的比较。在第四章中，我们将把世界上各种社会置于两种模式或理想型式——现代性和现代化阶段——进行比较，这是表达对这些社会现代发展水准的印象的方式。这种境况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涵义以及对于未来的意义将在第五和第六章中予以讨论。

对比现代性和传统只是确定这些概念的最基本

的方法。当然，有一点是清楚的，在此意义上的传统和现代性都是抽象物，因为在现实中没有哪两个社会会完全相似，而且一切社会都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种过程的概念（这确是现代化的全部问题所在）促使我们注意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大量使用逻辑思维模式的需要。自然，社会科学家应当十分重视静态的模式，因为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的研究者，他们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分析概括最容易获得的有关当代社会的资料，最后才能从事比较，而比较对于研究变化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变化是历史学家首先关切的问题，但是他们往往既注意相对静止的境况又重视极其简明的变化概念。

我们决不能把现代化视为从传统到现代性的一场简单转变，而应将其看成从远古时代到不尽未来的无限连续体的一部分。本书仅仅考察这个连续体的有限部分，当运用传统和现代性这些抽象时，我们应当意识到它们只是历史之动画片中的一格，但为了研究的需要被放大了。这种从变动不居的连续体中进行抽象的形式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因为它易于在作出选择时人为地走极端。有关民主与专制、领袖与信徒、秩序与运动、右派与左派的概括就是从两个极端对连续体所作的可能是最简单的描述。我们应当以对130多个主权政府中中央权威

和大众统治之间各种各样关系的强调，对各个层次的领导（从素有影响的圣贤到在人的活动领域完全缺乏创造性的庸碌之辈）作出精细的分类，以和这种概括抗衡。比如博弈论、因素分析和系统分析，就在有关学科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旦人们将现代化看作一个过程，就会想到它是一个伴随知识增长及其对人的各种行为方式的影响而连续变化的系列。作为一种将某种程度的秩序赋予极为复杂的人类事务的方式，我们可以将传统社会设想为在现代知识施以最初的影响之前的一种相对静止的承继而来的体制或结构。现代知识的影响将改变传统体制必须执行的功能，反过来这也影响体制本身。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三

现代化的政治

1 政治与现代化

现代性在全世界扩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除却表明这个过程的种种复杂性，提出整理考察这些复杂性的方式，我们不应企求靠目前的印象还能干一番什么。如果我们从已经提到的五个方面（理智、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一起入手探讨现代化，那只能以牺牲许多本质的相互关系为代价来获取一定程度的明晰性。这些方面不能以相同的速率或同样的方式产生影响，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也未必发生同样的相互关系。

在正常情况下，知识与观念很容易找到通向世

界的途径。尤其是在自然科学以及有关学科中，交往系统组织得如此之好，以致今天某项重要的发现在某个国家一公布立即便被传给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学者们。其他领域亦复如此，领导人尤其是政治领导人的声明很快便为一切感兴趣的人们所知。即使在现代通讯工具被引入之前，受过教育的人之间也有相当多的知识交流。传播出去的观念是否被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然而，甚至外来观念也有成为我们思维的一部分的倾向，外来观念往往以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我们思维。的确，尽管人地分殊，但到处都有受教育者的群体，他们不断与遍及全世界的同道交流对话，分享着相同的价值。再者，在观念领域，个别人可以经历迅速地转变。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或牧民的儿子可以在一所著名学府中接受教育并且在较短的时间里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熟悉现代观念世界。

现代化的其他方面的传播均不像知识领域那样迅速而广泛。它们的影响能够被感受到，但它们降落于多种多样的土壤，产生着各色各式的果实。唯一能确定的是：现代化的后来者没有一个会再造出与先行现代化的社会一模一样的现代体 制 范 型。有些社会发现很容易发展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另外一些社会则不然；有些社会很快使自己适应

了工业生活的方式，而另外一些社会则必须克服由传统信念和行为设置的诸多障碍。至少，中国的情况表明，传统的生活方式牢固地持存在领导者的思想中，因此现代性受到许多代人的有效抗拒。这种特例表明：那种最老到成熟的传统社会亦是长期以来最难以实现现代化的社会。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政治是行动计划的概念化也是它的实施，现代性的增长和传播从其政治方面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政治发展，相对说来是比较容易确定的，它为分析、比较和分期提供了最为恰如其分的框架。尽管现代化的每一方面因其代表着探索同一现象的不同角度所以可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他各个方面，但能为一个社会提供组织基础的却是政治。政治斗争就是权力斗争，它使得从各个领导集团的创造性设想中所产生的纲领开始生效。这些纲领往往包涵着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若赶上革命的时代，它们也可能力图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急风骤雨般的变革。通常，人们使用拿破仑时期、维多利亚时期、明治时期，基马尔时期、斯大林时期等政治形容词，不仅描述其法律与政府，也描述其教育系统、通讯、文学，甚至在政治上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行为方式，无疑，一种政权往往会给整个文化打上自己的特殊印记。政治上有组织的

社会为研究现代化提供了最为令人满意的基础。尽管有某些局限，但它们是现代化过程在其中展开自己全部复杂性的框架。

我们可以把组成联合国的一百多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和差不多同样数目的因各种原因未加入联合国的社会作为出发点。若非如此，便有武断之嫌。为了进行比较，我们这里把那些在外国统治下的、显然正在争取独立或真正自决的社会，也看作独立的社会，以与眼下正在成为更复杂的社会之组成部分的那些社会区别开来。在这里，我们必须作出艰难的甚至有点武断的选择。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国家的数目和国家的统一决非是一成不变的。十九世纪那种促使德国统一，促使意大利统一的力量现在正在阿拉伯世界、东南亚，或许也在非洲发挥作用。众多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可能会突然融为一体，而兴许它们经过一个时期的不得安宁的共处后又恢复了自己的独立存在。

尽管政治探讨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但由于其他研究问题的方式的特殊性和精细性，从事比较则会在那里遭遇更大的困难。若力图从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上研究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徜徉在无数捉摸不定的数据之中。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只是当今时代才有较为可靠的统计资料。首先从经济或

社会的观点探讨现代化的问题就会把自己限制在笼统状态，限制在某些深入发展的国家，或限制在最近时期。训练有素的社会科学家向来可以富于想象地、发人深思地使用得到的数据，他们的研究实质上是要理解现代性与传统的相互作用。但是人们要更全面地理解它的过程和问题就必须转向政治学。

变革是历史的本质，标志现代化特征的争论、斗争和妥协最好地反映在通信、演说、报告、法规和其他用作政治史基础的文件上。我们可以在一个社会根据它所面临的问题而演化出来的观念框架中考察变革。这种观念反映在它的宗教、意识形态、“作风”和价值系统中，并渗透在各种表达方式中。一个社会对自身及其问题（它统一的意义和目标）的理解是将那个社会的成员整合起来的主要凝聚力，它使得他们有效地共同行动去解决他们国内和国外的问题。这是一种深刻的保守力量，严格说来确实如此。一个社会不能轻易丢弃被以往经验证明是可靠的信念、习俗和体制，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安全有赖于它的作用。

与此同时，一个社会对自身及其问题的概念化正不断地受到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内部。大旱、洪涝、地震和各种恶性流行病，都可能从根本上摧毁支撑一个社会的周围环境，这会导致其生活

方式的深刻重组（其中或许包括向新的地区迁徙）。儒生学子总是在修道院、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寻找新的观念，这些新观念对公认的信念提出质疑。那种振聋发聩的发现，诸如地球是圆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原子包含的巨大力量可以释放等等并不是很频繁的，但是，即使对一种公认的观念作小小的修正，也会危及那种花大力气才得到的确定性。技术发明一旦诉诸改变劳动条件，就有必要重新安排社会秩序，这也会对稳定性提出挑战。一个社会的成员可以到国外旅游，也会在国内接触到外国旅游者、书籍和机器，而这些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国外的影响也可能由于外来入侵威胁到无力迎接挑战的社会的存在或由于长期占领（有时长达几世纪之久）而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可能完全是在外国监护下更新。

各种社会会在这种或那种方式上遇到挑战，并且必须对付这些挑战。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可能会有选择地集中自己的力量——或者是同时地集中自己的各种力量，如果我们从一个社会的组成要素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保卫既存的观念并使其适应于一种已改变的观念，以对付变革的问题。人们用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朝派与在野派、保守派与自由派、秩序党与运动党的说法来表达政治

斗争，决不是偶然的。这种在稳固和适应之间的基本选择（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在尝试与坐视、有识与无知之间的选择）最终可能在社会的最高层次上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各执一端的形式，但是它反映着实际上无法穷究细研的无数较小选择的积累，若孤立来看就无法得到明确的结论。

类比是勉强可以倚靠的脆弱芦苇，在历史问题上尤其如此，但是它有助于根据进化过程去思考问题，比如：经过几百万年，气形成了土，后来又形成了水，水为低等生命提供了环境，生命向着越来越复杂的形式发展，直到出现了创造历史并记载历史的人类。人与低等生命、水、岩石或气体之间的差异比之现代和传统时代甚至远古时代的差异大得不可计数。然而，这种巨大的差异经过千百万年，以一种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方式通过无数小的适应和化合竟被弥合了。历史变革也有这种复杂的秩序，但由于有很大的差异，一旦这些变革在某种方式上积聚到对人类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就会动员起来处理这些变革。有些历史学家往往从挑战和应战的角度或从周期的角度（如生长、兴盛、衰落；信仰、理智、完善；直觉、合理性、唯物论）来讨论变化，这些探讨方式并不能正确处理复杂的问题。在这个方面，社会科学家倒是更切近现

实，他们寻求在某种十分复杂的方式上把各种变项理成各种分级秩序和一系列功能问题，以便正确处理有可能被理解的问题并诉诸实际应用。

各种社会都可能纠缠于这些变化的积累，但它们未必能成功地适应这些变化。有些历史学家的业余癖好是描绘文明的兴衰，于是大部头的著作从这种努力之中问世了。这是一种“自己动手的”历史的形式，由于各种文明并不像现代国家那样能被清晰地确定，因而，历史学家们在以各种适于它的方式描述整理它们时，是相对自由的。困难在于，这些关于人类生命时间的类比过于依赖各种文明各自分立的特性，并且忽视了这一事实：当各种文明“衰落”或“死亡”之后，曾处于那些文明之中的人们却延续下去甚至有可能繁荣起来。文明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比如我们称作民族国家的社会）的确可能是转瞬即逝的就像栖居于其中的众多个体的人那样。然而，人类的总体却像一种社会机体那样延续着，并以新的方式不断重组自身以对付新的问题。我们不必过分牵挂较大的结构（不管是实在的还是人为的结构），而应更加注重组成社会的个人。许多帝国（或许也是一些“文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寿终正寝”。然而那里的人民历尽艰辛却依然存在着，并欢享着更加繁荣、更有希望的

时刻。现代化研究更应关注的是这种适应形式而不是文明的气数。

2 政治领导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横跨几世纪发展而来的概括趋向，并在人类的各种活动得以展开的框架中讨论了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然而，我们决不能忘记是众多的个人创造了历史，只有通过他们，这些趋向和活动才能得以表达。政治领袖就是在一个社会进行决策时，承担或积极寻求承担一份力量的那些人。政治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政府也包括对公共政策各个领域的抉择，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研究政治领导是大有用处的。政治领导可以在国际、国家或地方各个层次上行使，它所涉及的可以是利益集团的代表、政府形式功能的发挥或非政府领域政策的决定。对政治领导的研究不应依据极少数声名显赫的领袖而应依据在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每一社会中成千上万的个人。在相当静止的社会中，政治领袖通常产生自为数很少的政治寡头的家族，或者是由完备既定的程序所选拔和训练。然而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政治领袖的来源出现了较大的多元趋向。一切进行变革的社会，都在某

种程度上经历着政治权力从旧人之手向新人之手的转移。新的政治领导的起源和本质已成为变革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精英”这个词首先由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喜好行为术语的政治科学家所使用，它被用于描述那些在各种集团中享有最大权威或最受尊重的人和地位。这个词往往被用于指谓那些凭藉其出身或身份而在一个分层系统中占据高位的人。有时，它也用来描述由论功行赏而得到的地位。从各种情况都可以看出，精英包括了一个社会或各种社会集团（比如十八世纪欧洲的贵族）中一切有特权的个人。我们可以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区分出更特殊的精英，诸如那些涉及到宗教、艺术、社会、理智、军队、政治，或其他领域的精英；我们可以从地理上区分开国际、国家、地区、州省、都市和乡村的精英；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区分标准结合起来使用。“精英”与“领导”比起来更狭窄、更确定，而在那些主要涉及政治权力研究的学科中，通常不用这个概念。一谈到精英，人们往往想到的不是现代社会而是传统社会。只要经过严格地界定，我们也可以在“政治领导”的同等意义上使用“政治精英”和“权力精英”，而不致于发生误解。

“知识阶层”被运用于各个方面，它是比“精

英”和“政治领导”更特殊的术语。一般情况下，知识阶层是指那些用其才智工作的人，它往往被限定于指称那些受过较高的教育或受过同等的非正规训练的人。在苏联，这个词现在被用来描述整个“白领阶级”，以与产业工人和农民相区别。实际上它也在广义上被当作“精英”的同义词来使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或许最好使用的“政治的知识阶层”的概念。无论如何，严格说来，“知识阶层”或“知识分子”是指那些用自己的头脑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在这种较为严格的界定下，知识阶层是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它在关注政治领导的社会中是一个重要集团。

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将固执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在传统农耕社会中，较小的特权家族集团掌握着政治权力，我们确实可以称之为“权力精英”，尽管在不同的社会中，这种精英的结构和组成有很大差别。在这些社会中，政治权力通常与土地占有、军事实力、宗教影响紧密相关。在某些情况下，如在东方专制主义那里，国家官僚集团可能凌驾于其他一切权力源头之上。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领袖从集体上看比政治系统的中央领袖更加强大。一般说来，那些政治领袖，不管是地

方的还是中央的，与现代国家的政治领袖相比行使的权限很小。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拥有远比以前更大的责任和权限。它通过税收以及其他各种控制和服务，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着所有居民的生活。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在发达社会，所有居民都有文化，大多数人至少受过中等教育，因此，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真正的权力的范围远比传统社会扩大了。一个小的政治寡头集团与有组织的庞大的农民队伍相对抗的问题已不复存在。现在，动员起多元化的能动的人力资源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科层，只靠几个家族是很难控制的。

政治现代化中的领导通常可能来自两个源头。第一个源头就在在任的传统领导本身，有些成员可能出于某种信念或必然性，判定他们从过去承继而来的制度业已过时，必须朝向现代政策激变。实际上，这在那些率先开展现代化的社会中司空见惯，遗憾的是，许多历史学家执迷于各种革命，妨碍了他们更多地注意帝王、君主和官僚所从事的初级阶段的现代化改革。同时，必须承认这种类型的改革者往往是不彻底的，他或早或迟会认识到他正在将自己和自己的亲朋好友从他们一向享有的地位上改革下去，他所启动的这一过程势必要破坏那种地位的基础。这些改革尽管意义深远，但很可能具有

有限性、保护性、防御性和贵族性。

第二个源头来自于对在任的传统领袖不满的那些人，这个源头可以从两种类型来考察。其中一类是由传统政治领导本身中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成员所组成。在这个类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已与旧的生活方式疏离，有些人确信现代化是值得追求的，尽管现代化意味着他们的特权将会丧失。这种类型也包括出于权宜之计而拥护现代化的人：朝思暮想发迹升迁的王子王孙、总被冷落轻视的领主勋爵、寻求海内称雄的地方领袖等等。另外一类是由律师、医生、实业界人士、论功晋升的新型军队的军人和采取各种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所构成。第二种类型的成员不属于传统的政治寡头统治集团，他们认为自己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不相称，并有一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动机。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建设现代化的领导者，甚至那些倡导激进革命纲领的领袖人物几乎都不是农民、匠人和劳工。从克伦威尔、华盛顿、罗伯斯庇尔到列宁、阿塔蒂尔克①、毛泽东、胡志明、尼赫

① 阿塔蒂尔克（Atatürk1881—1938），原名穆斯塔法·凯米尔，土耳其共和国奠基人和首任总统。英国和希腊于1920年占领土耳其后，他召开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并被选为首任总统兼总理，在1920—1922年的希土战争中指挥作战。1923年缔结和约后，他废除奥斯曼哈里发职位，着手广泛的改革和现代化运动。1933年，他更名为阿塔蒂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译者注

鲁、卡斯特罗，这些革命领袖往往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他们不被疏离，也会在既存社会中为自己谋取一个体面的地位。

由于既任的政治领袖置身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利害关系中，因此毫不奇怪：不是出于胁迫，他们就不会放弃自己权力。传统政治体系决不会以立宪方式为最初的改革作好准备，领导的变更意味着传统政治寡头的失势，因而不可能没有暴力而实现。现代国家很可能正在避免流血而使自己的殖民地得以独立，但这不是惯例而是例外，从传统领导向现代领导的转变通常是一种疾风骤雨式的过程。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大不列颠、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意大利都饱受大革命和内战的重创，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后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将能够避免暴力。暴力或暴力的威慑是一切政治关系所固有的，但是在现时代，暴力则成了特色。这样说并非是为暴力辩护或要倡导暴力。它仅仅旨在说明这个事实，暴力和瓦解社会的其他形式一样，在现时代越来越司空见惯。人们往往依恋于传统的行为方式，他们把自身的安全与在孩童时代便被灌输的文化同一起来。只有在坚定的领导下，在人民开始确信变革势在必然的情况下，暴力的规模才有可能削减。

伴随政治现代化而来的暴力采取着许多形式，但是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革命。对于从事现代化建设的领袖来说，推翻一个传统政府并非是手到擒来之事。因为传统政府本来就控制着镇压的工具并且以众多在政治上活跃的臣民为后盾。人民的不满可能以农民起义或城市暴乱的形式而爆发，但这种骚乱经常会被镇压。的确，只有当在任的传统政府已经严重衰败内外交困之时，它们才能被推翻。当政府在对外交战中失败时，往往给谋反者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当这种失败是败在更现代的国家手下时，现代性的优越性就会昭然若揭，传统军人和官僚体制的一些重要部门就可能准备转而向更现代的领袖尽忠。在极端的情况下，获胜的外国军队可能连续多年占领一个国家，任命一个它自己挑选的政府，将它自己的军队用作当地的镇压工具。如果没有军事失败，革命形势也会在现任政府一拖再拖现代化改革，以致自己与邻国的差别已触目惊心时得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更现代的国家的榜样日益给传统的官僚集团也给它的现代化的对手留下深刻印象，不偏不倚的观点就会转而认为现任政府注定要变得不堪一击。

历史的变革依赖于个别领袖人物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危机关头，在选择牵涉到全社会之努

力的各项可供选择的政策时，中流砥柱，独当一面，从而使这些社会面临着这种可能性：领导人的更换最终将影响着社会的命运；所谓历史中的偶然性就是社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问题。一位领袖由于身体原因而意外故去或隐退都可能对事变的过程产生决定的影响。通常，重大抉择并非依赖于某一领袖人物本身的存在与否，历史的抉择往往是由许多个人共同承当的，就其个人而言并非是不可或缺的。诸多微不足道的选择会集腋成裘，最终选择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最高决策者的风度与个性。从这种意义上说，个别领袖人物的生老病死以及他在展现其个性的整个生活经历中一举一动，都会在事变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会影响整整几代人的命运。

3 现代化的阶段

现代化的各个层面都充满着冲突竞争，由于相互竞争的领导人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策被接受而明争暗斗，现代化的政治尤易于产生危机。风险极大，压力极强，冲突甚烈。构成今天人类组织框架的170多个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提出了多种多样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把所有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所面

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归于四个阶段：①现代性的挑战——在其传统知识的框架中，一个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而现代性的倡导者出现了；②现代化领导的强固——在持续几代人的往往贯穿着剧烈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入现代化领袖的手中；③经济和社会的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发展到这种地步，一个社会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转变为都市工业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④社会的整合——在这一阶段，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引起整个社会从根本上改组社会结构。

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政治领袖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使他们自己社会的特殊的传统文化去适应于相应于现代知识所提供的机会而出现的生活方式。政治就是争夺权力以实现他们所倡导的纲领的斗争。相互对立的纲领，实质上包涵着一个社会面对的全部问题。政治现代化的危机反映着理智、经济、社会、心理诸方面的问题，也反映着政治本身的问题。因而，有关政治危机的讨论需要考虑全部过程。毫无疑问，我们从现代化的其他方面讨论现代化的过程，亦能殊途同归，但是由于政治首先关注的是公共政策和社会的组织，因此它为讨论整个复杂的发展提供了最方便的框架。尽管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伴随着持续的危机，但这里所要讨论的

四个阶段也标明了在国家发展中需要领力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也表现在各种法定假日、纪念设施、宪法、法令、条约上。一旦国内国际暴力事件一触即发，这些危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在这些危机之间，却往往是相对稳定的扩展时期，在此期间先前的收获得到了消化。

现代性的挑战

当传统社会开始面对现代性时，当某些先知成为新的富有挑战性的生活方式的鼓吹者时，现任的领导人可能会相应采取各种各样的对策。他们可能扼杀新观念并将改革者当作异教徒迫害；他们可能讨论这些新观念接受一些，又拒斥一些；他们也可能认为这些新观念是行之有效的，从而力图据此从根本上改造他们的体制。通常，这几种反应会联袂而至，而且这种联袂，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形式。

率先开展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在许多领域都是航道通畅的；因为他们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咀嚼新知识新技术，并循序渐进地吸收其影响。英国在这方面是最成功的，尽管那里也有各种形式的革命和继起的暴力，但寡头政治统治集团（实际上已被改造）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依然存在。在西欧各

国，这个过程都延续了很久。

现代知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意义深远的学术新成就和技术新发明，历史学家通常更喜欢将其归因于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现代观念和现代技术明确出现于十五世纪，而到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一场羽翼丰满的科学革命便起飞了。当时，经济增长、城市化和社会动员迅速展开，更有效地组织起人力的需要导致了新的交往和经营方法，特别是导致了政治的强固。君王不惜牺牲地方领主和教会的权势而开始行使更大的权力，行政和税制的惯例也被修正，以满足新形势的要求。

知识的增长以及有关技术的增长，最初主要是传统精英（一些大地主、教士、商贾和工匠的小圈子）所为，并且开始被看成有用的、可以接受的发展。然而，一旦早期现代化的后果日趋明显，一旦传统社会的基本信条渐受挑战，转变传统秩序的过程便会逐渐发生动乱。1632年，宗教裁判所因其宣扬太阳并非绕地球转的异端邪说而对伽利略进行审判，并迫使他放弃自己的信念，——这只是众多新的知识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对抗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情节。

尽管到十七世纪末科学态度及其诸多后果已被广泛接受，但现代的生活方式却远没有渗入社会。

统治者这时承认需要改革，作为“开明君主”他们一般支持商贾、厂主以及与带有土味的乡绅相对立的城里人的利益。然而，他们坚持在传统框架中进行改革，指望保留达官显贵们一直享受的特权和财富。开明君主的现代化改革是防御性的或预防性的，在此意义上，他们盘算着在不危及传统特权的情况下满足迅速变化的社会的需要。这种对策与其说是出于贪婪的本性不如说是源于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主人和仆从的传统划分是天经地义的，对于任何秩序良好的社会来说，它都是不可或缺的。直到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时，传统的寡头政治的框架才在它们的进程中最终被打破。

那些率先出现现代性的为数不多的欧洲国家，从现时代之初便开始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十五世纪末，它们发现了美洲大陆，探查了非洲海岸线的大部分，大大加强并发展了自古以来便与东地中海和亚洲社会的交往。就此而言，在其早期形式上，现代性的挑战从一开始就是普遍的。然而当时现代与传统的照面只是擦边而过，到十八、十九世纪，现代观念和体制的影响才更深入地渗进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

与那些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直接毗邻的社会即俄国和土耳其拥有十分强大并且极有远见的政

府，它们能够控制西方在其领土上的直接影响并且预见到如果要使自己独立就必须采纳西方的方法。俄国在十五世纪末，土耳其在稍后，便着手实施一套雇佣西方技术人员和专家的政策、使军队和官僚集团现代化，以及建设边防和公共设施、建立工厂、开发自然资源。这种政策在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和马赫穆德二世时期的土耳其采取了最活跃的形式。也有一些防御性现代化的典型例子，在那些情况下，传统系统的大部（尤其是那些具有严格的农业部门的规章和税制的部分），被蓄意加强，行政系统被重新整顿，以期防备直接从外部和间接从内部产生的更普遍的现代化的影响。

现代化领导的强固

政治现代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危机是涉及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向现代化领袖手中转移的危机。或许“权力转移”这个说法太苍白，不足以描述这些事变，因为这些事变在每一国家都牵涉到一些重大的政治斗争。我们现在知道，而且当时就有许多人确信：现代化者最终将是胜利者——但是旧政权的领导者却一直为维护他们的地位进行着殊死的、往往又是狡黠的抵抗。

我们可以从三种本质特征上考虑这种斗争。第

一是决计进行现代化的政治领袖的主张。传统寡头政治集团中那些不满的成员或代表着新的政治利益的现代化领袖的主张可能采取革命的形式。传统寡头政治集团本身偶尔也会触发这种过程。通常，经过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政治斗争之后，现代化的纲领才赢得广泛的接受并以此提供了支持现代化领导的可靠的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有效地果断地破除与农业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相联系的体制，使其转变为工业生活方式。在那些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相对封闭的社会中，这种破除往往采取从传统农业体制中急遽解放出大量人口的形式。在其他一些社会，它则可能是作为农业的商品化、意识形态的变革，或其他体制的改革的结果而逐渐发生的。

最后，在原先并不存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的情况下，将它创造出来也是本质特征。许多社会在创造一种可行的政治组织形式时遇到很多困难，但它对于现代化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全部居民都迁往新的土地上，有时这些土地上先前无人居住，从而为原先的社会建立了旁枝。还有这样一些情况，率先现代化的社会将它们的权力伸展到处于早期现代化阶段的社会并沿着现代路线改造它们。

* * *

革命使现代化政治领袖获取权力，而各种革命的性质却大相径庭，但是可以说，一切革命至少都有两个方面：暴力的或非暴力的、内部的或外部的。一些著名的革命——诸如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土耳其、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都是暴力的、内部的。我们在这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内部的：国内革命在斗争中首当其冲，尽管这种革命往往得到国外的大量援助。这一点也是重要的，所有这些革命的任务都不是推翻稳固而强盛的政府，而是在它们的稳固性业已动摇之后瓦解它们。在对外战争中，传统政府往往未等革命爆发便先行失败了，譬如在俄国、土耳其、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就是如此。传统政府也可能在发生革命危机之前已变得腐败不堪，以致弄得众叛亲离，譬如在英国、美国殖民地、法国、古巴、阿尔及利亚就是如此。有一些革命运动（诸如美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的革命）具有争取独立和社会变革的双重目标。然而，这两种动机往往难分难解以致形成了一个目标。

革命也可能从外部引进，而且一开始并没有国内的支持。一支外国军队可以横行于一个国家，并

在摧毁了前任政府后确立一套全新的体制。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在西欧和中欧许多国家就是这样，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德和北朝鲜亦复如此。从外部引进革命未必不是一种革命，而且有些业已被证明做的相当好。

非暴力革命是罕见的，虽然这种类型的革命有一些也非常成功。1868年日本推翻德川幕府实质上就是不流血的，它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初期所从事的改革，被公认为是一种和平变革的模式。同样，1861年俄国的农奴解放引起了广泛的改变并导致了1890年代的迅速工业化，俄国和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这在俄国历史中是一个主要转折点。

评价向现代化领导转变的第二个标准是土地占有权的改革，这种改革使得农业在经济大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最有效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土地所有制各色各样，因此，对其要运用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农业产量以供应发展中的城市，为加工制造业供给农业商品，并为工业投资直接提供更多的资本。

农业，直到现时代之前还是主要收入来源，它形成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自然，它是社会中最保守的部门，努力变革土地占有系统和耕作方法必然成为主要的政治问题。在英国，地

主和商人提供了现代化的领导，而农业改革则是由地主圈占先前的公地而激发起来的，因此他们能够使用现代化方法以提高生产。英国的情况不是惯例而是特例，无论如何，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大地主一直是现代化的反对者，不愿将其收入用于经济发展。

在这些国家，农业改革的目的在于瓦解大的庄园，这可以靠把土地分给农民，也可以靠用其他方式组织土地以便使它的剩余贡献给工业化。在地主反对现代化的地方，农业改革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因为地主是传统政府的主要支持者，所以农业方面的任何改革都意味着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拉丁美洲、近东和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是这种情况。

判断是否发生了现代化领袖获得了权力的转变的第三个标准是，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它拥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和合乎情理的稳定的舆论（它代表着人民要实现的目的以及实现目的的手段）。这个过程最令人瞩目的特征之一是：当今存在的 133 个独立国家中，在现代化的领袖取得权力之前就已有了与现在大致相等的领土的国家不到 20 个。这些国家——如率先现代化的英国、法国、瑞典，和后来发生转变的俄国、伊朗、中国和日本——在现代之前，就已实现了明确的国家统一。它们能够随着现

代化的建设向前迈进，而无须为保卫既存的疆界而烦扰，因为在这方面它们往往比侵略者占有优势。这些国家有许多其他问题，但起码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来说——包括目前即将诞生的30个到40个国家——创造一个民族国家是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核心问题。现代化领袖从思想深处坚持：只有从歧视他们、妨碍他们奋斗的外国老板那里解放出来，他们才能从事改革、征税、教育和建设。这种代价甚高的民族建设过程采取了多种形式。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它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国内和国际战争中，将许多较小的邦国、公国和其他领土合并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它则瓦解了庞大的多民族帝国，从而使各部分人民得以建成新的国家。南美、北美、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都是靠着监护人的实力，经过长期而激烈斗争之后而形成的，很少有例外。

无论如何，民族主义都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目的——现代化——的手段。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争取独立的斗争是那么漫长而艰巨，它激起的情感是那么强烈而有力，致使民族主义往往竟然淹没了现代化并使其转移了主要进程。争取独立的斗争所吸引的生命和力量是那么多，保卫疆土、保持

独立所需要的财力物力是那么大，以致其他问题都成了配角。民族主义的强大呼声会阻滞改革，并且往往是借助保守的领导人阻滞改革，民族主义在独立之前一般是与自由主义相联系的，以后却常常成为一种保守主义的力量。民族建设对于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动员人民为之奋斗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它也引起现代化的某些最困难的问题。

* * *

这些本质的变革类型——政治革命、农业改革、民族建设——所发生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大不相同。它们完全可能相继发生，并且结合起来形成对政治领导的各种复杂的挑战。在某些国家，其他问题可能比这三个问题更突出。然而，它们对于有效地动员人民为之奋斗都是本质的问题，直至找到了这三类问题的解决办法，才能说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到了现代化的领袖手中。

经济与社会的转变

经济和社会转变的阶段，就我们在本文中的理解，标志着这样一段时期：从现代化领袖获得了政治权力到社会发展至城市占据了优势，而大多数人的动员集中指向了整个社会而不是地方社团和特殊

群体。在发达社会中，这个阶段被认为持续了一个时期：在英国是从1832到1945年，在法国是从1848到1945年，在美国是从1865到1933年。在较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人们认为这个阶段在俄国开始于1917年，在土耳其开始于1923年，在巴西开始于1930年，在中国开始于1949年，在埃及开始于1952年，而且均仍在继续中。在其他许多国家，现代化的领导仍在强固自己的地位，深入的经济和社会转变阶段尚未崭露。

如果说现代化领导的强固是一个政治上大动荡的时期，其间充满了政变、革命、民族独立和统一战争，那么它还只是一个相当表浅的发展阶段，它所影响的只是普通人的国民性、公民身份、合法地位而不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几百年来，各个帝国，兴盛沉浮，很少对其大多臣民的个人事务发生影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现代化领袖获得政权所产生的影响没有早期的变革那么大。另外，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很少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但却有更深远的意义。较发达的国家在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所发生的普通人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比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或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初期发生的变化还要大。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人的各个活动领域都发生转变的时期。

这种迅速转变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激动人心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之初，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各门自然科学彼此也难分难解，一个人可能通晓一切或在许多科学上齐头并进。我们可以举出一例，尽管这显然是一个特例，这就是歌德，他竟在法律、戏剧和小说上，也在解剖学、植物学、地质学和物理学上都做出了独创性的工作。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即使同一学科的学者也难以相互理解彼此的研究，因为专业化的程度提高了。实际上，此一时期，各门现代科学都已展开，而技术却正处于大发展的前奏。蒸汽机刚刚被使用，而电学、冶金学、电子学，更不消说核能技术尚未诞生。导致人类事务大转变的正是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

经济、社会转变所需要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集中在民族国家或政体的层次上而不是地方或国际层次上。这种转变的典型是1837年德意志关税同盟以及在其他国家的同样旨在打破贸易的地方壁垒、发行全国货币、确立全国邮政系统等诸如此类的运动。这些发展导致了公共和私人的决策相应集中在国家层次上。这种对国家事务的专注趋向于削弱社会在地方上和国际上的联系。在此一时期，各社会变得更缺乏世界精神而更加以自我

为中心。个人的安全与认同在更大程度上维系于国家共同体而不是地方共同体或国际共同体。

这种力量集中在国家层次上的政治后果不仅反映在行政管理的集中化上，也反映在民族主义的大大强化上。在以前的阶段上，民族主义关切的是独立和统一，这反映了一种摆脱传统束缚的自由精神和争取新机会的愿望。而在经济社会转变时期，民族主义则成了一种对自己社会的安全近乎病态的妒忌性的关心，同时成为一种对可能威胁到国家内聚力的地方忠诚或意识形态特性的系统攻击。在法国，完整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共和主义和教权主义之间的长期斗争、在德雷福斯事件① 中世界主义与沙文主义的激烈对抗都是这一阶段的特征。法国似乎有一种把这些冲突戏剧化的特殊能力，但这些冲突也发生在各个社会中。甚至带有强烈的国际色彩的价值体系，例如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也被民族主义所淹没。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民族主义从个人安全的广泛投入中汲取了情感的力量。

① 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Case）——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法国军事当局对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的诬告案。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上尉德雷福斯被诬告将秘密军事文件出卖给德国并被判处终身监禁。沙文主义趁机煽起反犹运动，鼓吹对德战争。真相大白后，法国当局仍拒绝纠正错案。左拉发表公开信《我控诉》，伸张正义。从此，法国的世界主义者与沙文主义者展开激烈斗争，酿成国内危机。——译者注。

事后回顾这场转变的理智和政治方面，可能比在当时更清楚，但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却一直都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它们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社会理论家无法抵挡住强调它们的诱惑，从而掩盖了现代化一些更深刻的特征。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这些变革的范围表现在社会劳动力的半数以上从农业向制造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表现在大部分人口从幽静的乡村向喧腾的都市转移。这种转变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和西欧许多国家，从十五世纪上半叶开始，农业在国民生产和劳动力方面所占的份额已低于二分之一，但许多制造业仍带有乡村特点，并且未能对后来的都市工业化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在亚洲、拉美和非洲各国，农业成份在这个阶段之初相当高，这种转变的影响很可能更深远。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统计数字来描述所发生的经济转变，但这样说就够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发达国家的整个产业和通讯体系，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的。

这场转变在社会方面带来了许多好处，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个阶段是一个中等教育和医疗事业大发展的阶段，而且这些发展带来的利益扩展到大多数人口。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运输业、通讯业、服务业的转变伴随着社会各阶层相互之间行

使政治权力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个阶段一开始，直接与政治权力发生关系的仅仅是一部分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或农村和城市中的工人没有什么政治作用。在这一时期中，随着教育的发展，管理和服务方面的干部迅速增加。由于招聘的来源从土地所有者转变到工商业和需要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专家的活动领域，统治集团的基础也大大扩展了。一个社会行政、管理和服务阶层可能拥有半数以上的人口。

这场转变的负担由大多离弃了他们世代生息的乡村而挤入业已人满为患的城市的农民承担起来。但情况并不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美好可靠，实际上，在某些国家，相当一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准甚至连续几十年绝对下降。在那些劳动力主要由外国移民提供的社会中，如美国和加拿大，似乎并未出现这种下降。在那些由强大的政府迫使劳动力转变的社会中，劳动力所承受的负担一直特别重。在西欧各国，将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花费了30年到40年时间，相形之下，苏联所花费的时间少于它们的一半。一般说来，在较早发展的国家，这种转变更从容些。

这种从农业向工业转变所依据的政策是区分自由主义政策和经济统制主义政策的关键。苏联的高

度集中倾向导致了劳动力的迅速转移，但这种动力是以人的痛苦的高昂代价换取的。据估算，直到50年代，苏联的实际工资和人均购买力才达到1928年的水平，而1928年的水平仅与1913年的水平相同。然而，农民和产业工人的苦难并不仅仅是苏维埃政策的结果。行政管理集中化和对老百姓的强制也是沙皇的典型做法，苏维埃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其本质特征而是强化了它们。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能列举出许多有关经济和社会的转变执行的政策产生差异的例证。然而，尽管有这些差异，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各社会还有一些基本的共性。

价值系统似乎总是落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个阶段，领袖人物的设想和眼界仍深受传统农耕和乡土观念框架的影响。的确，劳动力本身，尽管从农村流向了城市，但仍保留了许多乡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乡土传统被带入城市，农民对地主的依从也转变成未受教育的人对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的尊重。同样，少数民族集团在此整个阶段仍然在许多方面能力低下，尽管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实际的变化，尽管他们所在的社会制定了世界性的目标。有农耕生活作为缓冲保护了大批人口免受城市生活之苦，但同时也延缓了他们的期望的实现。

社会的整合

现代化的第四阶段所代表的发展阶段被冠以各种各样的称谓：成就社会、发达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社会、自由社会、伟大社会、工业社会、整合社会、群体社会、高消费社会、流动社会、现代社会、新社会、有机社会、合理社会、理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技术社会、都市社会、（以英文字母为序排列）。所有这些术语所指的是大致上相同的现象，但不同的称谓反映了设想、强调和期望的不同。在所有这些术语中，“整合社会”是最令人满意的。这个阶段的实质是，人们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迁移使得相对自主的地区化、组织化、职业化群体的社会结构转变成高度分散的社会，个人在其中是相对分离的。

在这里所使用的整合概念是专指：个人与地方性、地区性或其他中间性结构的联系被同时削弱了，而与大的也更分散的都市和工业网络的联系却被加强了。这种关系的转变给个人在一个更灵活的社会提供了更多的良机，并使其在教育、消费品、各种服务方面的资源分配上占有更大的份额。然而，这不仅使他丧失了在一个更为自主的共同体中的全体成员所给予的支持和安慰，也剥夺了乡村生活在

常态下提供给他的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关系。都市环境带来了大大丰富的生活方式的根本希望，乡村环境则提供了社会温暖和个人安全的当下现实。

到达这种整合阶段的社会能够有效地开发利用人的资源——如果我们可以用这种非人格的方式指称人的存在的话。它为消费者产生了很大的市场、很高的人均国民收入、高水平的普及的和专门化的教育、广阔有效的社会安全保障和适当的供闲暇用的机构。当然，只有当社会组织良好、一切事情正常运转时，才会有这种情况。一个社会机械化程度越高，对无组织的麻痹状态越是敏感。在混乱和经济衰退的时刻，它会受到大规模的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的困扰，在较低的整合社会中，也有很多失业现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充分就业，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会被农业部门所缓解甚至掩饰。在较低发展国家，城市工人通常不割断与乡村共同体的联系，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转身回去求得支持。在整合社会中，个人被原子化了——他脱离了传统共同体的系留之地，除了直系亲属外，他和其他人都隔离了，他只能在那些能够提供他就业、医疗、社会福利和退休金的较大的非人格的公共或私人组织之间寻找出路。在这种境遇下，孤独、不安全和人际密切关系的削弱，使个人丧失了宜于心态

稳定的环境。

我们可以依据许多指标来判定社会的整合，尽管把整合的开端置于一定点上必定多少有些武断。如果我们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当作核心标准，那么最合适的整合指标就是人们从事与农业以及其他初级生产形式不同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例。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当作发展的计量器来排列各个国家往往也是一种做法。很明显，其他一些发展指标——识字率、学校注册、都市化、健康、通讯工具的有效性——都有追随职业结构和人均生产的倾向。以这些标准为基础，我们可以确认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进入了社会整合阶段的十四个国家：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国。在下面一代人的发展中，将会有另外十多个国家进入这个阶段，它包括苏联、日本和南欧、东欧的一些国家，也包括拉丁美洲一些较为发达的国家，如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

整合社会在其政治权力结构上与处在前一经济社会转变阶段的社会不同。个人权力通过官僚科层化趋于被制度化，权力的行使被分配给许多专门机构并由许多人分担。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分层的倾向是一致的，通过高校教育，那些被聘参与直接

行使政治权力的人的层次越来越高，而且人数也比早期阶段更多。同时，统治集团被扩大了，并且它开始依赖功绩而不是特权，统治集团的数目与社会规模相反，到头来被削减了。

随着社会更富庶，财富分配趋向于更公平，农村和城市劳动者与领取薪水的雇员的生活标准也趋于接近。现在，有五分之一或更多的适龄人完成了中等教育，到了19岁后他们中有五分之一可以继续受高等教育。对个人来说在社会阶层中升降沉浮而不顾及社会出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结果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中领取工资的雇员）被大大拓宽了，他们从原先被雇作农村或城市劳动者的家庭中被招聘出来。这种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收入和地位趋于平等化的倾向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高消费，高生产是不可能维持的。即使统治集团想这样做，社会不把产品分配给消费者而维持人均国民生产的高增长率，在经济学上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过程的目标难以预见，但是由于自动化削减了维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那么整合社会高比例的生产力有可能不管人们是否工作都能保证其收入。在这种条件下，从根本上重新分配工作和闲暇已成为正常的要求，恰如其分的安排会让社会

适应之。低就业和闲暇绝不会造成囊涩财尽，卯粮寅吃，由于社会已更加丰裕，更短工作日的机会和问题将扩展至更大多数的人。

当社会到达了这个阶段，在各利益集团间便实现了关于理应遵循的种种现代化政策空前一致的意见。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可能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有关主要问题的政策方面的分歧被大大减少了。整合达到了这种程度：对公共福利的迫切要求支配了各种利益集团，在早期阶段关于现代化政策方面流行的五花八门的理论趋于被归为一种切实可行、顺应人心的现实的协议。在今天的西欧，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共同之处，如果说整合社会仍未终结意识形态的争论，但起码争论的范围要窄多了。

这种类型的社会往往被人称作群体社会，并且有关群体社会的论著已汗牛充栋。这种论说涉及的核心是“群体化”的忧虑——被原子化的个人将形成一种毫无区别的“群体”，它很容易被蛊惑人心者牵着鼻子走，去实现毁灭的目的；中间性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的逐渐削弱将会导致国家政府积聚起所有的权力；唯一能保留下来的文化将是那种诉诸直觉和按最低级的共同标准理解的文化，一般认为这种文化相当于少年的思维水平；那些肩负繁荣现

代知识大任的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偃旗息鼓，被大众的流沙所淹没。

论述极权主义的著作大多都有相同的倾向。以牺牲以前由正式和非正式的地方和社团群体行使的权力为代价，而将一切权力向一个独裁政府手中集中，有时被视为是群体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极权主义政治系统都诞生在仍处于经济社会转变早期阶段的社会中。在某些情况下，如在苏联和中国，极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传统独裁和专制的政治系统的现代化。这并非是说这些社会必然要演化为极权主义系统，而毋宁是说在缺乏追求更自由的现代化政策那种强劲的政治运动的情况下，传统的包袱已先给它们准备了集中化的极端形式。在另一些社会，诸如北朝鲜和除南斯拉夫之外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政权都是被军事力量从外部强加进来的，并不适合当地的传统。有些国家，如1933年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斯拉夫、1954年的北越，极权主义系统是为着国内的原因，作为对政治和经济崩溃的反应出现的。在所有这些国家，唯有30年代的德国是已跨在社会整合门槛上的社会，如果人们对极权主义的社会起源有兴趣，就不应当把它等同于苏联或其他共产主义社会。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和佛朗

哥时期的西班牙有时也被人看作极权主义，但实际上，与其说它们与现代极权主义系统更相近，不如说它们与传统独裁政权更类似。当这些政权建立起来时，那些国家仍处在经济社会转变的早期阶段。

因而，德国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情况：解决社会整合问题的失败导致了极度变化的公众道德的急遽堕落。我们应该从局部条件而不是一般条件中寻找它的根源。不少国家并未诉诸极权主义和大屠杀，却一直在并继续在沿着整合之路前进。一个社会采取的反应整合危机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具有多元主义的还是独裁主义的政治传统、代议制和对个人自由的法律保障是否有深厚的根基、政治寡头集团通常是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领导的品质也是一个很重要因素，如果那个人在攫取权力前横遭车祸或暴病而卒，就不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希特勒了。机遇在这种事上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现代化领导者获取权力的状态也会对后来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权力从传统领袖那里的转移是通过大流血实现的，就有可能导致连续几代人颂扬暴力。

“群体化”是一个标志现代整合社会之特征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它们的主要特征。在稳步实现整合的发达社会中，宗教、种族忠诚和其他一些在现

代化中幸存下来并且没有丧失活力的传统凝聚力，在维持社会秩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犹太教、天主教以及许多新教派系在大多数整合社会中保持着自己的生气，并能在生活危难之时提供慰藉和一种有助于缓和原子化和群体化危险的社会行动框架。

然而，核心问题是现代整合社会中的个人被从相对自主的共同体中抽出并被引入都市的氛围与众多素不相识的人打交道。在早期阶段被回避或在某些地方基础上被缓解的许多人际关系的问题现在成了当务之急。发达社会的体制仍未被充分地理解，为了社会的稳定而控制这些体制的方法仍在探讨阐述之中。

在一个由相互迥异的宗教、社会、种族背景的人民组成的社会中，整合也是困难重重的。在美国，“整合”一词用于消除黑人种族隔离的较特殊的意义决非偶然，这个问题直到黑人从农奴制下被解放百年之后才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黑人过着相对自主的农耕生活，未真正卷入与占优势的大多数白人的竞争。然而，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注意到：每当经济迅速增长之时，黑人便被日益吸引进现代都市中心。这种问题终于出现了：黑人已不能再忍受生存待遇的不平等，而美国

社会则被迫寻求解决。这是社会的整合引发危机的一个例子，尽管这是一个特别尖锐的例子。那些对美国种族整合的步履姗姗大失信心的人们，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得到宽慰：具有如此迥异之背景的人必须努力在一个发达社会中共同生存，这在世界史上还是第一次。

* * *

从四个阶段描述各种社会内部现代化的进程，并非旨在造成这种印象：这些阶段是一些密封防水舱。的确，所有这些关键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会延续于整个现时代。现代性在其基本原则被理解被接受以后许久，还会一再提出挑战。传统观念和体制有一种惊人的滞留力。现代化领导人在获得政治权力之后，还必须长期奋斗以保持自己的首创精神。经济和社会的转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只是在其发展最活跃时期的前后，发展速率才有变化。各社会逐步走向整合，有的需要几十年，有的甚至需要几百年。

集中力量对付这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的个别阶段，有一个时间上相继展开的问题：当一个社会开始认识到了现代性的挑战，就必须集中力量制订应付这种挑战的方案，不管这种挑战是从内部还是

从外部来的。接着，只有当现代性的挑战在一个社会深入相当一段时期，现代化领导者才能取得优势。同样，只有当那些将经济和社会的转变视为其首要任务的领导人获得了权力，这种转变才能以能动的形式展开。最后，只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达到很高水平，社会的整合才会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然而，将这四个阶段作一区别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都会并驾齐驱地经过这四个阶段。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可能表现的更从容不迫，它们在十九世纪之初，其制造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方面的经济比例比今天亚非拉许多国家还高。然而每一个相继进入经济社会转变阶段的社会，都是在较发达的社会不断促动的情况下开始实现转变的。

在那些民族解放或统一成为现代化领袖夺权斗争的一部分的欧洲国家，独立的国家状态是在这一阶段结束之时达到的，那时，这些国家已顺利踏上经济社会的发展征程。另外，在较晚展开现代化的社会，现代化领袖是在政治强固阶段之初便在一个新的独立国家获得了权力。他们获得权力并不标志着漫长的国内斗争的终结，而毋宁意味着一场斗争的开始，他们必须要赢得地方上和地区的头头脑脑以及形形色色社团对自己权威的承认。与此同时，他们的国家也还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

譬如1949年的印度尼西亚和1960年的尼日利亚，表面上与1871年的德国和1919年的波兰处于相同的政治发展阶段，然而，在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得不远溯欧洲历史以便找到亚非新国家新代表的政治组织类型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这四个相继阶段的逻辑联系必须要在发展水平相互迥异的领域里来考察，每一社会的现代化必须根据其自身的传统遗产、资源和领导来理解。根据这些阶段来比较各种社会对于形象地描绘作为一种世界性过程的现代化是大有用处的，但是除非在一般意义上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现存的社会都能根据那些前人已有的经验勘定自己的路程。

4 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各个社会

若想弄清介于对一切社会都适用的和对每一社会都是独具之间的政治现代化的特征，必定会导致一般性、暗示性的结论，而非限定性、精确性的结论。因此，这些结论大有被任意的解释所误解的危险。然而，此刻根据本章讨论的政治现代化阶段和下章描述的现代化范型来排列世界上各个社会是顺理成章的。

这些阶段本身只是一般地被界定。事实上，它

们是在若干种同时的发展中，而不是在若干个独特的阶段中被强调的一个阶段。同时，并非所有的社会都能整齐划一地囊入七种范型，埃塞俄比亚、以色列、黎巴嫩、尼泊尔和南非在许多重大方面就是例外。而且，无论依据哪些政治事件和抉择来断代都会引出争论。在我们能举出的所有日期中，或许只有1789年作为一个社会现代化的里程碑，才相对摆脱了论争的纠缠。

然而，只要这些限定被理解和重视，就没有理由不为世界上所有社会的现代化的各个阶段找出特定的日期。一般来说，被称为现代性挑战的阶段必然比其他阶段更明确，因此无须在下面的图表上逐一列出。各个社会首先按范型排列，而在每一范型中按年代顺序排列。年代顺序则依据现代化领导的强固的始期排列。（在美国是1776年；在法国是1789年；在德国是1803年；在俄国是1861年；在日本是1868年；在马拉维是1964年，等等）已完成现代化领导之强固的国家排在未完成的国家之前。

那些一直跟着本书思路的人会很清楚，这里所提出的断代和类型涉及的是政治的现代化而不是现代化的其他方面。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理智发展太难以把握以致于无法纳入比较的范畴。我们得到的当然只是近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变化的精确信息，

而我们对心理层面的理解仍然相当肤浅。同时，我们得到的有关社会发展水平比较的信息趋于表明：现代化的其他层面与政治层面相互关联。传统社会的资源和技术基础的差异如此之大，因此，我们若不了解大量超出本表的情况，就无法引出关于一个社会一般发展水平的结论。

现代化的范围

	现代化领导的强固	经济和社会的转变	社会整合
第一范型			
联合王国	1649—1832	1832—1946	1946—
法　国	1789—1848	1848—1945	1945—
第二范型			
美　国	1776—1865	1865—1933	1933—
加拿大	1791—1867	1867—1947	1947—
澳大利亚	1901—1901	1901—1941	1941—
新西兰	1826—1907	1907—1947	1947—
第三范型			
比利时	1795—1848	1848—1948	1948—
卢森堡	1795—1867	1867—1948	1948—
荷　兰	1795—1848	1848—1948	1948—
瑞　士	1798—1848	1848—1932	1932—
德　国	1866—1871	1871—1933	1933—
意大利	1896—1871	1871—	

续表1

	现代化领导的强固	经济和社会的转变	社会整合
丹　麦	1807—1866	1866—1945	1945
挪　威	1809—1905	1905—1945	1945
瑞　典	1809—1905	1905—1945	1945
西班亚	1812—1909	1909—	
葡萄牙	1822—1910	1910—	
奥地利	1848—1918	1918—	
捷克斯洛伐克	1848—1918	1918—	
匈牙利	1848—1918	1918—	
希　腊	1863—1913	1913	
波　兰	1863—1918	1918—	
芬　兰	1863—1919	1919—	
爱尔兰	1870—1922	1922—	
冰　岛	1874—1918	1918—	
保加利亚	1878—1918	1918—	
罗马尼亚	1878—1918	1918—	
南斯拉夫	1878—1918	1918—	
阿尔巴尼亚	1912—1925	1925—	
第四范型			
乌拉圭	1828—1911	1911—	
巴　西	1850—1930	1930—	
阿根廷	1853—1946	1946—	
智　利	1861—1925	1925—	
墨西哥	1867—1910	1910—	
委内瑞拉	1870—1936	1936—	
玻利维亚	1880—1952	1952—	

续表2

	现代化领导的强固	经济和社会的转变	社会整合
哥斯达黎加	1889—1948	1948—	
波多黎各	1898—1952	1952—	
古　巴	1898—1959	1959—	
巴拉圭	1841—		
哥伦比亚	1863—		
厄瓜多尔	1875—		
海　地	1879—		
秘　鲁	1879—		
多米尼加	1881—		
危地马拉	1881—		
巴拿马	1903—		
尼加拉瓜	1909—		
洪都拉斯	1919—		
萨尔瓦多	1939—		
英属洪都拉斯	1961—		
第五范型			
苏　联	1861—1917	1917—	
日　本	1868—1945	1945—	
中　国	1905—1949	1949—	
伊　朗	1906—1925	1925—	
土耳其	1908—1923	1923—	
阿富汗	1923—		
埃塞俄比亚	1924—		
泰　国	1932—		

续表3

	现代化领导的强固	经济和社会的转变	社会整合
第六范型			
阿尔及利亚	1847—1962	1962—	
塞浦路斯	1878—1946	1946—	
台　湾	1895—1945	1945—	
菲律宾	1899—1946	1946—	
朝　鲜	1910—1946	1946—	
南　非	1910—1962	1962—	
印　度	1919—1947	1947—	
巴基斯坦	1919—1947	1947—	
锡　兰	1920—1948	1948—	
以色列	1920—1948	1948—	
黎巴嫩	1920—1941	1941—	
叙利亚	1920—1941	1941—	
伊拉克	1921—1948	1948—	
马耳他	1921—1961	1961—	
蒙　古	1921—1950	1950—	
埃　及	1922—1952	1952—	
印度尼西亚	1922—1949	1949—	
突尼斯	1922—1955	1955—	
缅　甸	1923—1948	1948—	
约　旦	1923—1946	1946—	
牙买加	1924—1962	1962—	
苏　丹	1924—1956	1956—	
圭亚那	1923—1966	1966—	
摩洛哥	1934—1956	1956—	
香　港	1936—		

续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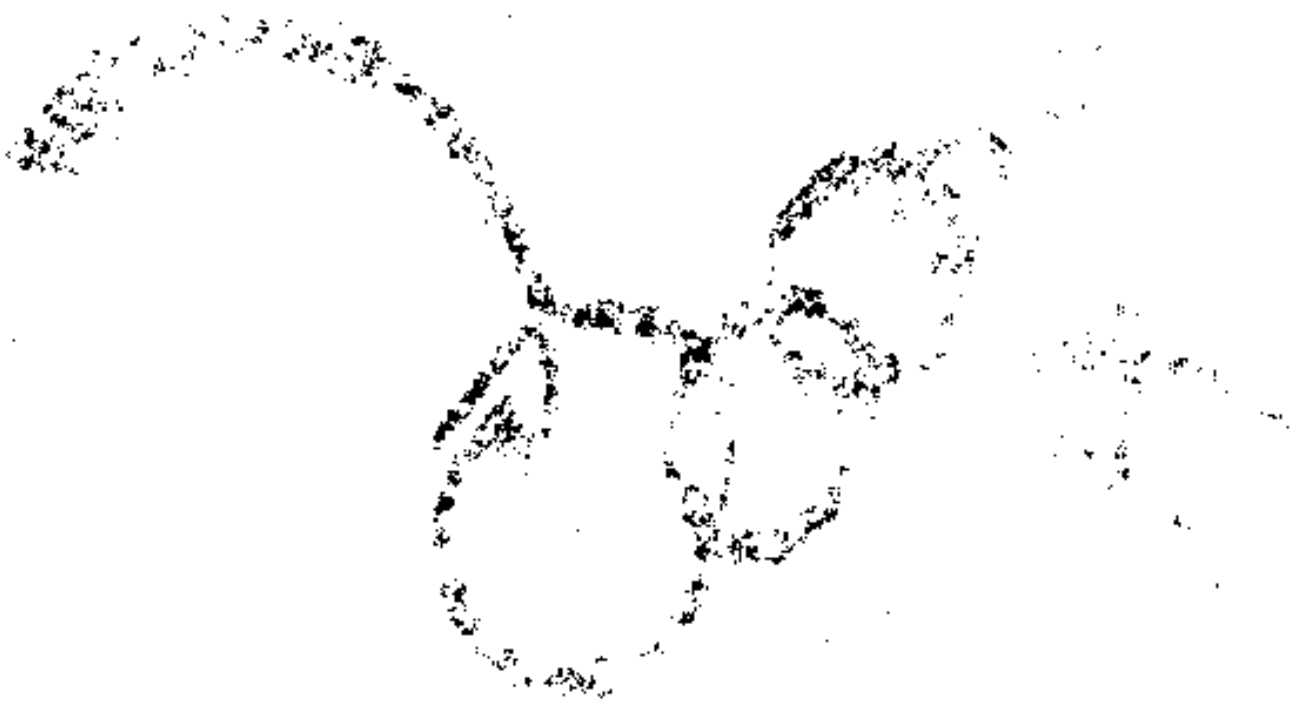
	现代化领导的强固	经济和社会的转变	社会整合
柬埔寨	1949—		
老　挝	1949—		
越　南	1949—		
利比亚	1962—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1959—		
马来西亚	1963—		
也门	1963—		
沙特阿拉伯	1964—		
马尔代夫	1965—		
新加坡	1965—		
第七范型			
利比里亚	1947—		
加　纳	1957—		
几内亚	1958—		
喀麦隆	1960—		
中非共和国	1960—		
乍　得	1960—		
刚果（布）	1960—		
刚果（利）	1960—		
达荷美	1960—		
加　蓬	1960—		
象牙海岸	1960—		
马尔加什共和国	1960—		
马　里	1960—		

续表5

	现代化领导的强固	经济和社会的转变	社会整合
毛里塔尼亚	1960—		
尼日尔	1960—		
尼日利亚	1960—		
塞内加尔	1960—		
索马里	1960—		
多　哥	1961—		
上沃尔特	1960—		
塞拉里昂	1961—		
坦桑尼亚	1961—		
布隆迪	1962—		
卢旺达	1962—		
乌干达	1962—		
西萨摩亚	1962—		
肯尼亚	1963—		
马拉维	1964—		
冈比亚	1965—		
罗得西亚	1965—		
赞比亚	1965—		

四

比 较 现 代 化



1 比较的标准

考虑所有社会共有的现代化的特征对于说明这个过程的广泛性是大有用处的，但是，个别情况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这种概括对于理解特殊社会的问题并无太大帮助。无论如何，分别讨论170多个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已远远超出了本章甚至本书的范围。它需要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并需要许多知识领域里的众多学者共同完成。作为包罗一切社会的概括和个别社会的分析之间的一种可以把握的折衷，我们可以探讨那些在考察各种社会群体时所出现的主要变体。没有两个社会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展开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会拥有相同的资

源和技术基础，没有两个社会会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没有两个社会具有相同的领导方式或相同的现代化政策。然而，在同样处理着主要问题和现代化政策的社会类型之间作出划分，而又不忽视每一个社会的个性还是有可能的。

类型的用处有赖于它打算澄清问题时所依据的标准是否恰当。在这里提出类型的目的旨在根据现代化领导者在获取权力以及在履行其纲领时所面对的政治问题的特征来比较各个社会。它尤其基于下列五个方面的考虑：①一个社会所出现的政治权力从传统向现代化领袖的转变，相对于其他社会而言是早还是晚；②一个社会中现代性对传统领袖的直接政治挑战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③一个社会在现时代是热心于疆界和人口的连续性还是经历着领土和人民的根本重组；④一个社会在现时代是自治还是经受着拖延的殖民统治；⑤一个社会进入现时代是带着成熟的体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适应现代性各种功能），还是带着实质上不成熟的体制（以致不得不让位于从更现代的社会所借鉴的东西）。

* * *

①政治领导和体制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中，首要的是要有一个批评性的标准，因为更现代的社

会对较低的现代社会施加着根本的影响。我们承认后来发展的社会可能会提供为现代观念和体制的演进做出重大贡献的环境，但是除非是在那些政治领导人全身心扑在现代化上的社会，这种贡献通常不可能被充分完成。我们强调在现代化中优先考虑年代顺序是至关重要的，并非要人们注意较早发展的社会在建设现代化的努力中绝对的独特性，而是要人们注意这些努力中相对的独创性。这种在没有外来模式的情况下对独创性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是塞翁失马，祸福互伏，尽管祸福往往一时无法把握。这种强迫出来的独创性的优点在于：率先发展的社会没有那种令人无所适从的并且往往使人误入歧途的外来模式的榜样，而更乐于从自身的长处考虑问题并依据特殊的适应问题来寻求解答。这是一种缓慢而艰难的努力，充满了错误和误解，但这种经历往往会带来稳定性。

在后来发展的社会面前，已有先行者成功的努力。这些社会的领导人依据那些模式认识自己的问题，在这些国家中关于这些模式对于自己的情况是否适用的论战著作日渐增多。在对外国影响的理解

中，由罗易①、爱默生②、亚里山大一世、赫尔岑·贾迈勒丁·阿富加尼③、康有为、内村鑑三④所代表的理论都是风行了两三百年的认为外国模式恰当而适用的大辩论的一方。各种意见围绕着这些一般问题趋于各执一端，诸如：是全盘接受外国模式还是完全拒斥它们；是相信早期现代化的社会演进而来的体制具有普遍性还是认为本国的体制应当有选择地适应现代性的功能。

后来者的好处在纯粹的技术领域是相当明显的，他们可以购买或以最先进的方式仿制早期现代化社会花大力气才发展而来的机器和技术。然而，在

① 罗易（Ram mohan Ray，1772—1833）印度宗教改革家。1814年前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税吏，后退职从事社会活动和研究工作。1817年创办印度第一所现代学校"印度学院"，1821年创办第一家印度周报《明月报》。1828年创立梵社。两年后移居英国。主张社会改革，反对种姓制度，提倡普及教育，呼吁出版自由。
——译者注。

② 爱默生（R·W·Emerson，1803—1882）美国作家。在其作品中批评资本主义社会，要求进行温和的社会改革，主张建立民族文学。
——译者注。

③ 贾迈勒丁·阿富加尼（Jamal Addin Al-Afghani 1838—1897），穆斯林改革家，生于波斯，在阿富汗、伊斯坦布尔和开罗进行政治活动，1884年出版期刊《最牢固的束绳》，抨击英帝国主义，鼓吹伊斯兰改革。
——译者注。

④ 内村鑑三（Kanzo Uchimura 1861—1930），日本思想家，1882年建立"日本基督教会，"1884—1888年在美国学习，回国后在日本教书，写作，传播人道主义和改革思想，对日本近代许多作家和知识界领袖产生影响。
——译者注。

包涵着大众价值和道德的体制方面，广泛引进与传统体制不协调的外国模式往往会导致广泛的混乱，有时还会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在较晚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中，外国模式的刺激是一种强烈而富有生气的力量。然而，这些社会领导人若非明智地区分普遍适用的现代性的功能和源于异国他乡传统的体制形式，外国模式的影响就有可能使他们脱离实际经验，妨碍他们以更强的识别力来考虑现代功能对本国传统观念和体制的遗产的适应性。

②现代化的政治挑战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意义关系到传统和现代化领袖之间的斗争的实质，强固现代化领导所需时间的长短，以及确立稳定的现代体制的限度。尽管没有哪个社会在发展中不受外国的广泛影响，但在不少国家（下述第一、第二、第五种范型）中，现代化领导的强固实质上是一国内过程。在这些国家的国土上没有与外国占领军的激烈对抗，意识形态在传统与现代化领袖之间的斗争中起着核心作用，同时，在领袖群中难以泾谓分明地划界。在这些国家，很典型的是现代化领袖来自传统精英集团，即使当社会经历革命动荡之时，从尚未成为这种精英集团一部分的阶层中补充新领袖相对来说也是循序渐进的。由于现代化领袖大多来自传统精英集团，所以，领导的变更是通过一系列妥

协而实现的，而在此种妥协中，具有传统思维的领袖在许多代人中保持着实际的影响。与此相应，传统体制对现代功能的适应也是循序渐进的，由于体制适应于从容不迫的方式及其与传统政治文化的较大和谐，因此体制很可能较为稳定。

在那些政治现代化多少直接源于外侵或殖民主义的社会（下述第三、第四、第六和第七范型），领袖和体制的转变过程有可能是疾风骤雨式的和不连续的。外来领袖的作用的主要差别在于促进激烈的变革，或以决断的甚至暴力的方式引入外国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非传统精英阶层的国内领袖有可能取得有影响的地位，而与外来侵略者的对抗以及外侵和殖民主义政治所引起的问题往往会搅乱关于现代化政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并使其复杂化。在这些状况下，传统体制对现代功能的适应比起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更加混乱，更加反复无常，更加迅猛，现代体制很典型地被打上较明显的外国模式的印记，因此与本国传统体制更加不和谐，也有可能更加不稳定。

③一个社会在现时代是热衷于疆界和人口的连续性还是经历着领土和人民的重组也能造成很深的差异。有这种连续性经验的国家很少（第一和第五范型），它们的优点在于能把较大的注意力用于国

内发展的问题。尽管这些社会碰上了有关对外政策的重大争论，并且处身在那些把自己财富的绝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的国家之中，但是它们并未遇到那些极受新形成的和新组合的社会关注的要从根本上调整的民族建设以及形成认同的问题。然而，不管大不列颠和法国，俄国和日本（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遭受外国干预的土耳其和中国）承受着多重的国家安全负担，它们所面临的问题都源自深植在过去传统的共同经验的基础。

大多数国家（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范型）没有这种连续性和内聚力的优势。的确，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些社会必然是一个领土与人民从根本上重组的过程。这种复杂的调整，以各种各样的结合形式将那些根据共同传统和利益聚集起的小政体合并起来，使得多民族王朝解体，把少数民族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重新组合不通过一系列打富劫强，搅乱人们的价值系统的内部战争和外部战争是不可能完成的。

即使在国家的独立实现之后，在此过程中引起的敌意也会遗留下一些干扰性的难题。就国内而言，这些社会在各种民族建设纲领的采纳上，在政府的形成上，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上，在强调国防的程度上深深陷入分歧。那些源于形成新国家的

不同人民的多元背景和经历，源于解放战争和统一战争带来的苦难的形式和程度，源于往往从先前政治系统中获取的错综复杂的体制遗产的分歧，甚至使得那些最稳定最有凝聚力的社会都扩大了通常争论的范围。

有些新国家，往往是第一次将过去一直在不同君主统治下生活但具有相同语言和传统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这些国家更具有制订连贯一致的政策良机。而由其他一些国家联合起来的人民则具有大为不同的传统，尽管他们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共同的文化遗产。在这些国家，同化和同质的问题加剧了由现代化引起的惯常的但并非无足轻重的问题，并且往往会对认同产生似乎无可克服的障碍。有些社会实际上是二元性的甚至是多元性的。英国借助于通过各种合法让步形成的包涵着同化和妥协的政策，将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领土融为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纳入了各种少数种族并抑制了各种地方上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继续安抚或压制十五个较大民族和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国能使包括较大的信奉穆斯林教的少数民族和许多较小的民族团体的地域群落团结一致。而其他国家要这样做就困难多了。南斯拉夫三个主要民族和六个少数民族只有在强有力的领袖统治下才能和平共处。阿拉

伯世界的以色列作为少数民族不甘心自己的地位。在塞浦路斯，占多数的希腊人和居少数的土耳其人显然有无法调解的分歧。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仍不承认印地安人和印欧混血儿的实际公民地位，而他们却构成了这些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在南美洲，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人是少数人，他们构成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在罗得西亚，他们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但却靠着在外人看来已是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寻求对大多数非洲人的永恒统治。

特殊的对外政策问题加重了这些国内的负担。每一个较新的国家的建立都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它的一个或几个邻国，在许多情况下，新国家应有的疆界都是悬而未决的。有些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与其所有的邻国都有不断发生的边界问题。就一般意义而论，新国家的创建趋于打破既定的政治秩序和力量的平衡，并必然导致新的调整，还会引起常常花费许多年才能调解的怨恨。由于伴随民族建设而来的对外政策的特殊负担，新建国家可能在这种或那种方式上分散了它们本应主要关切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力。

作为一种克服民族建设中之分裂遗产的方法，不少社会依靠唤起对光辉过去的回忆来寻求培养认

同和民族自豪感。中国和日本是少数几个可以不必大肆篡改历史记载便可以这样做的国家。埃及、希腊、意大利、伊朗和以色列则必须克服宣称它们的古代文明是正宗的政府和人民连续体之间的巨大鸿沟。而英国人凭藉更大胆的想象力的跳跃，一时竟确信他们就是希腊文化和罗马行政管理技术的传人，而且他们就如此来教诲他们的统治精英。查理曼①表明是一个具有多种用途的象征，当法国和德国激烈敌对的时期，他成了双方都引以为荣的祖宗，而以后在法国和德国成了亲密伙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中，他依然是享有盛誉的先人。土耳其不顾过去在中亚并不怎么荣耀的实际情况，试图去创造一段历史，以便为自己在赫梯时代找到据称乃是一切文明之起源的家世。当黄金海岸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之后，它的新的领导人便从距这个国家西北几百英里之外的、位于马里的、十世纪时闻名于当地的公国借用了加纳的名称。这在局外人看起来可能近乎怪诞，但那实在是大有用处的发明，它能够使新建或重组的国家人为地在过去植根，这有助于它

① 查理曼（charlemagne 742—814）即“查理大帝”，法兰克人的皇帝，矮子丕平的儿子。768年继位与其弟共治，771年独揽王权。统治其间，征服西欧基督教广大地区，联合罗马天主教会对抗拜占庭的优势地位。800年他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称帝，号称“罗马人的皇帝”。——译者注

们在经受现代化的狂风暴雨洗礼后仍存在下去。

④在一个社会中，现代化采取的路线也受它在现时代是自治还是长期经受殖民统治的影响。自治政府所面临的大量严重问题，都是有关国内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享有共同的公民地位、担负共同的民族目的的人民和领袖中激起争论。本少国家短期（但却是在它们民族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活在外来统治之下，为中欧和南欧各国曾受拿破仑军队的侵占，中国、土耳其、伊朗、和埃塞俄比亚经受外国列强各种形式的割据和干涉。但是这些外来统治的时间持续相对较短，而且往往刺激了民族复兴和改革的热情。

那些经受着更彻底的殖民统治形式的国家的经历大不相同。它有十分积极的方面；宗主国有时不惜代价地将政治法律体制、铁路、公路、港口设施、农业和工业、健康、卫生和教育体制输入殖民地国家，而这些本来要靠它们自己花大力气才能实现。

然而，殖民主义的恩惠一般只是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产生影响而且只能影响社会的有限部分，同时，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些影响也伴随着根深蒂固的缺陷。关键的问题在于：现代化的发展一旦超出起步的水平，就会卷入深刻的、代价高昂的、通

常是疾风骤雨式变革之中，这种变革只能由土生土长的领袖来完成。宗主国在主观上只带着有限的经济目标或战略目标来承担它们的殖民责任，它们不会提供资源也不会调兵遣将去监督殖民地社会从农耕生活方式向工业生活方式的转变。相反，它们指望以尽可能小的预算和人力许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一般倾向于依靠并强化传统领袖和体制来维持现状。即使它们找到了引入它们自己的体制（尤其在司法、财政、教育领域）的时机，那也只是以不影响大多数人口的有限形式引入的。

⑤最后一个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进行分类的标准是：它们的传统体制能否充分地发展以适应现代性的功能。发达国家的现代体制是由它们的传统体制对现代功能的适应而形成的，而且，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除了第七范型之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多少具有这种适应的体制。要想找到一种能表达现代观念的语言，就必须从一种能够通过意义的扩大和新词的借用或发明而发展的书写语言入手。对于语言是如此，对于各种水平的宗教、法律和政治体制亦复如此。甚至在抽象知识的范围内，东地中海和亚洲社会的研究和思辨传统，也对现代观念的演进有所贡献并且提供了与现代知识的联系。

与此同时，有些社会（第七类型）的传统体制

的发展水平从总体上说不足以为适应提供基础。如果社会没有一种书写语言或展开的政治、法律、或宗教体制，适应显然便会遭致无法克服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只能是从较发达的国家全盘借用体制。大多数非洲国家把欧洲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并且采纳了与他们自己过去的传统无多大联系的法律、教育和政府系统。这种态度是机敏明智的。然而，它带来了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广泛脱节，并且导致了一条与那些现代体制与传统体制较和谐的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 * *

当然，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标准能够用以对建设现代化的社会进行比较分类。由于已经指出的原因，上面提出的标准涉及了历史发展、民族建设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框架。同时，这种分类也在很大程度上以文化、经济、社会标准为基础而将各社会组合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按年代顺序的排列以及对现代化影响的源泉和本质的强调往往把同类的社会聚集在一起。较早进入现代化的西欧各社会及其分枝具有一直比后来进入现代化的那些国家更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市化和教育水平、从事非农业职业人口的比例以及社会动员程度。同样，

第七类型中的社会（在监护下开展现代化的不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程度一般都是最低的。即使在个别类型中，社会的年代顺序亦往往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应。这种分类也是根据其历史文化把许多社会组合在一起。西欧、中欧、东欧各社会及其在新世界的分枝处于前四个类型中；阿拉伯世界，次撒哈拉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社会都被归于第六、第七类型。按政治现代化的有限标准来分类多少反映了这些国家通常进行交往的共同经验的联系。

然而，这种政治、经济、社会特性的全面的相互联系，只是在很低的程度上适用于第五类型——俄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泰国。从政治现代化的观点来看，这些社会的共同之处只在于这个事实：它们的传统政府足以有效地抵御向殖民统治的真正屈服，因此，它们的政府在建设现代化中的作用与成为殖民地的那些后来开展现代化的社会中的政府的作用大不相同。实际上，这个类型中的社会在现代化的政治方面上有许多一目了然的类似之处，尽管它们在文化和历史经验方面相去甚远。俄国的传统文化是欧洲的、基督教的；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是中亚的、伊斯兰教的；中国、日本、泰国是东亚的、佛教的；而埃塞

俄比亚则是阿姆哈拉的、科普特基督教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俄国和日本相对比较发达，它们在许多重要方面，与前四种类型的许多社会相匹敌或超过了后者，因而第五类型所囊括的其他社会与它们的差别相当大。的确，若不是为着这种类型论的首要的政治目的，就完全有理由打散这个类型并将这些国家置入其他六种范型。然而，由于这些社会中的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有如此鲜明的特性，因此把它们单立一种范型也是无可指摘的。

支持这种分类标准的论证与这项研究的历史框架密切相关，如果这个主题从其他学科的观点来处理，就很可能采用不同的标准。人类学家将会更注重传统文化、家庭结构、语言或宗教群体；政治学家将倾向于强调立宪形式、政党制度、利益集团的结合、政治权力的分配；社会学家将注重社会分层制度、社会动员、都市化、识字率、传播媒介；经济学家则关注资源类型、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增长率、储备和投资制度。

也有人提出过令人感兴趣的综合各种不同标准的范型。它们基于这些变体之间可以看到的高度的相互联系，诸如识字率、国民生产总值和教育、健康以及传播媒介水平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促进了以容易使人领悟的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类型构成。那

种以从事现代化建设的领袖面临的特殊的政治问题为基础的分类标准在历史领域具有特殊的价值，但在其他领域，则必须详尽阐明基于其他选择标准的类型。

2 政治现代化的七种范型

第一范型

政治现代化的第一范型是由大不列颠和法国构成，它们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为所有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

英国革命发生得很早，而随之继起的复辟又拖得很长，因此人们往往不把它看作政治现代化的原始阶段。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十七世纪革命的深远意义，而且在其与更早的和后来的政治和经济趋势之关系的看法上一直有较大的分歧。然而，一个扎实并掌握丰富资料的学术团体现在能看到清教主义对传统政权的批判以及对本质上属于现代的新价值的探索。清教徒、雅各宾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之间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相同因素，譬如，在他们的领导人的社会起源方面，在他们强调秩序和纪

律方面，在他们致力于重新评价旧秩序方面等。与大多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情况相比，英国政治发展中的清教阶段被更充分地吸收进以后的发展阶段，它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销声匿迹了，但在十八、十九世纪却出现了有英国特色的现代化政策。

法国革命的独创性及其影响是众所公认的，即使在以后的175年中，在世界各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它仍不失为一种政治权力开始从传统领袖向现代化领袖手中转移的经典范例。法国革命的特色正在于树立了人们追随的榜样。现代英国体制的直接影响一直限制在其他英语国家以及受英国支配的一些亚洲、非洲社会。美国革命在对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进行限定并制度化的立宪形式上履行人民主权的理论方面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美国宪法及其制订的过程对当时的欧洲有广泛的影响，并且对十九、二十世纪许多新国家的宪法制订贡献了一些重要因素。然而，这种影响一直是有限的、间接的，因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少有产生美国革命的那种理智氛围和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却被广泛模仿。拿破仑的军队直接把法国观念和体制引入整个北欧、中欧和南欧。法国的共和制是许多穆斯林世界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建设现代化的领

袖所采取的模式。受法国支配的那些东南亚和非洲社会也深深依恃法国模式。现代法国体制通过荷兰和比利时人的统治在亚洲和非洲产生了间接的影响。雅各宾主义作为一种概括性的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言是最为重要的革命学说，也是近东的阿塔蒂尔克、纳赛尔、本贝拉，亚洲的孙中山、尼赫鲁和苏加诺，拉丁美洲的卡德纳斯[①]和1960年以前的卡斯特罗等革命领袖最初受到激励的源泉。这些领袖人物，每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无疑每人也都受到不少其他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思想中明显的雅各宾倾向使得他们被法国革命的纽带连结起来。

除却在政治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向现代化领袖手中转移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这种开一代新风的特征外，大不列颠与法兰西在从内部而来的现代性的挑战的深度上，在疆界和人口于现时代的连续性上，在传统体制对现代功能的适应上都与其他社会有所不同。

从这种发展范型中引出了一些结果。首先是在英国和法国，传统体制对现代功能的适应比后来进入现代化的社会所展开的要慢。尽管这两个国家都

① 卡德纳斯（Cardenas1895—1970），墨西哥政治家，1934—1940年曾任墨西哥总统。——译者注

经历了革命与复辟的震荡（法国在这方面的经历极富戏剧性和反复性），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中的实质性的变革却是循序渐进的。就英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传统领导向现代化领导的嬗变发生在1649到1832年之间。遇到经济和社会转变的政治问题是在1832到1945年之间。在法国，可资比较的日期我们认为是从1789到1848年，和从1848到1945年。

这种变革的步履缓慢是与大多数后来进入现代化的社会相比较而言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内在化的事实（即未受到激烈的外来干预，因而首先依据的是国内各种利益的平衡）导致了传统体制相对有秩序地、平静地对现代功能的适应。在英国，这个过程极其舒缓，直到20世纪，国家的政治体制才完全适应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早于多少代以前便开始了。在法国，经过最初的骚乱之后，拿破仑法典在1802年确立了现代体制的框架，它为以后尽管有许多政治动荡但实质上却有条不紊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这两个国家在政治领导转变的方式上，尽管表面看来有很大差异，但彼此还是相近的。在英国，这种转变非常平缓，甚至在20世纪中叶许多大学的毕业生还能找到最重要的职位。学生的招收越发来

自广大的社会阶层，但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却强烈地指向国家的认同，这种态势在几十年里变化很慢。甚至工党领导在很大程度上与保守党领导也同出一源。在法国，却从未达到如此程度的认同，在政治上活跃的坚持多党议会的法国人与支持强有力的个人领导的法国人之间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法国存在着周期性的政治不稳定，譬如1945年以后，13年间换了25个总理。尽管有这种显而易见的政治不稳定，法国仍然在许多代受过高等院校教育的训练有素的文官的主导下，在行政管理的水平方面经历了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转变。

英国和法国作为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与它们长期作为贸易和殖民国家的经验相吻合，结果这种角色赋予它们本来无力维持的国际影响的地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伦敦和巴黎在人类努力的各个领域实际上仍是世界的首都，大不列颠和法兰西是拥有最大海外属地的两个国家。这些属地在英国控制时人口最多，1914年总人口高达4亿2千万。这种优势地位未能幸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这两个国家由于那场损失惨重的冲突都对自己国际命运的衰落无可奈何。然而令人惊异的并不是巨星的黯然失色而是早期这种不均衡的势力，一旦世界上其他部分发生变动，这种势力便无法维持下去。如果

我们不是依据世界势力而是依据人均发展判定这两个国家，那么可以看到它们所获得的成就仍属于最高层次的国家之列，而且，它们只是依靠政治领袖追求继续增长的创造性而获得这种成就。

第二 范型

英国和法国在新世界的旁枝可以被视为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第二种范型。“旁枝”这个词谈到第四范型时还会用到在这里意指那些国家——来自于旧世界的人在此定居，尽管他们有时只占人口的少数，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却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力量。这些旁枝一开始往往是依附性的，但它们与那些占主导地位的人口仍与母国相同的殖民地不一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构成这种范型的社会，它们的人口总数有2亿2千5百万。

就这些社会之占主导地位的人口而言，其居民直到17世纪主要来自于宗主国，可以说这些社会也面临着作为内部问题的现代性的直接政治挑战，而且它们也随着使体制适应现代性的功能而步入了现时代。然而，在其他方面它们却与其由之脱胎而出的社会有所差别。在那里，政治权力从传统领袖向现代化领袖的转移，发生得稍晚一些，而且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们经历了土地和人民的根本

性的重组，而且遭遇着延宕的殖民统治时期。

由于前面已讨论过的缘由，这些社会的现代化领袖之获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与实现政治的独立的过程交织在一起。从理论上说，这些殖民地一直是母国的组成部分，比如法国向来这样对待它的海外领地，但是从长远观点来看它们的利益却与深深陷入欧洲事务的大英帝国迥然不同，而且它们远隔重洋，最后还有地广人众的重负。

在美国，传统领袖与现代化领袖的斗争可以说是从177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65年，呈现出惊心动魄的场面。一般认为，独立战争所具有的革命性极其有限，但是情况表明独立战争时，美国逃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比法国革命高出4到5倍，被没收的逃亡者财产的价值的比例亦不比法国低。美国的内战，导致了奴隶制的最后失败，从而也导致了传统政策的最终破产，它所卷入的人数比世界上从1815年到1914年期间的任何一次冲突都要多。从国内暴力的激烈的程度来看，美国历史上的这一阶段可以与其他任何国家相匹敌，而且引起这种暴力冲突的问题——独立、民族统一和奴隶解放——都是具有现代特征的问题。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过程则更平缓，暴力冲突也更小。这些社会的人口更为同质

化，而且由于商业往来更被母国密切维系着，而且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以后，它们才在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上足够强健起来，从而踏上争取独立的征程。这个过程在加拿大可以看作发生在1791到1867年之间，在澳大利亚是1809到1901年之间，在新西兰是1826到1907年之间，每个国家终止日期都标志着自治地位的确立。

这种政治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在于：这些社会脱离了母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它们对经济社会转变过程的展开并非以长期确立并且相对封闭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阶层为基础，而是借助于流动性的、更容易顺应变革的社会结构。这种流动性由于广阔而不发达的未开发地区的存在而大大提高，在这些地区，土地和其他资源丰富，而国家的权威微弱。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世界上都属于地域最大的国家，分别处于第二、第四和第六位，但它们（与新西兰）在人口与农业用地的比例上在世界上却是最小的。这些未开发地区的利用不仅可以获得资源和财富，也可以成为解决人口较稠密地区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安全阀。那些寻求伸冤消愁、或未能得到满足的生活、或渴望实施有违习俗的见解的个人和集团都可以迁往未开发地区而不必忍气吞声或坐以待毙。

这些 未开发 地区 提供了机会同时也引出了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丰富的资源没有劳动力便无从开发，而由此引起的人口大量涌入又提出了独特的同化问题。仅在十九世纪，就有数百万人移民到美、加、澳、新。美国已经非常尖锐地遇到了同化的问题，因为其他三个国家的环境和政策因素导致了更缓慢的而且同质性的移民。在美国、通过许多代人的大众教育产生了一致的观念和价值，这就是通常人们谈及的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的“大熔炉”。

如果说这种同化是那些主要是使用英语和信奉新教的活跃于政坛的领袖们所关切的问题，它也给移民本身造成许多困难。第一代的移民如果不是使用英语便很可能终其一生都有一种外来人的感觉。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则在语言、文化和其他价值上面临着忠于旧世界还是忠于新世界的冲突，而在这种情况下，后者终会获胜。各种社区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在宗教和其他文化纽带编结得很好的情况下，往往能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实现一种宽容的彼此互补的调节。然而也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几代人都不能实现满意的调节。

同时，无论是欧洲人还是相当一部分亚洲人都未遇到非洲人那样的磨难，他们最初是被当作奴隶

带进来，到了1863年才获解放。他们从故土上带来的价值和体制尤其不适合现代环境，使他们生活在分裂了家庭和社区的奴隶制度下。奴隶解放使黑人遭遇到两方面问题，他们缺乏能够在转变时期确保社会内聚力的发达的本土文化，同时来自其他人口的巨大压力也阻碍他们的同化，结果：对抗与异化广泛存在，只有大多数黑人从事农业才不致于酿成直接的冲突，但是，后来在工业社会更密切的各种关系中这却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问题。美国面临着双重的整合问题。一是所有社会变成以工业为主导时遇到的普遍问题，二是将黑人公民整合进非黑人社会的特殊的但直接的有关问题。

有些美国历史学家力图概括未开发地区的经验并将其视为与政府控制相对应的个人主义和民主的主要动因。尽管富庶的未开发地区的利益必须以它带来的问题来权衡，但在英语社会里却可能有这种情况。当代关于未开发地区的研究尚无成熟的主题，但深入的探究当可充分揭示：未开发地区有助于以较极端的形式激发中心地区的特征。如果说英语社会特有的意志自由的精神在未开发地区问题上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那么俄国政府的独裁精神在19世纪开发西伯利亚的问题上亦殊途同归。

到了本世纪30年代，当这种第二范型的社会开

始面对社会整合的政治问题时，它们便超过了欧洲的发展水平，并且成为公认的世界上最丰裕的社会。它们不仅受益于新世界广阔的资源和使得它们可能全力以赴处理国内事务的相对分离的地理条件，也受益于从旧世界承继而来的发达且自由的体制以及成千上万为寻求更满意的生活方式而来的训练有素且精力旺盛的人民。

第三范型

政治现代化的第三范型由那些在法国革命后，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而发生了现代化领导强固的欧洲社会所组成。这些社会所进行的使其政治体制适应于现代功能的活动，稍晚于英法两国，它们也经历了重组疆界与人民的漫长和普遍的暴力冲突时期，这是它们经验中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这些社会在现时代主要是自治，尽管东欧以及爱尔兰和冰岛的少数人民最初受到外来制度形式的统治，而从某种限定的意义上这与殖民统治并无二致。象前两种范型的社会一样，这些国家亦在传统时代便发展出了易于适应现代功能的体制。

当然，有一点很重要，许多欧洲社会几世纪以来一直参与现代观念和现代体制的发展，并且在许多领域奋力赶上或超过了英国、法国以及新世界的

那些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员的航海技术；荷兰、威尼斯、达尔马提亚商人的经商成就；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德国血统的科学家；以及这些社会与其他国家的学者、艺术家、技术人员都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形式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然而，在政治领域，他们直到法国革命以后才毅然决然地摆脱传统窠臼，就此而论，他们的政治现代化受到法国模式的决定性的影响。

旧王朝早已于1795年在比利时、卢森堡和尼德兰，于1798年在瑞士，于19世纪前10年于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和瑞典覆亡。在这些国家，可以说，现代化政治领导在1839年（尼德兰）到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已得到强固。在东欧。政治转变开始得晚一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导致帝国王朝的毁灭，东欧的政治转变才得以完成。

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政治领导的强固，其特征在于受到外国模式的决定性影响（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军事力量强加的，或至少是由武力引入的），而且民族建设的过程漫长而艰难。没有一个国家完整无损地走完这个过程。这些领土和政治之重建的最复杂的问题是圣罗马帝国的拖累，在1871年实现相对稳定以前，该帝国的各部分领土一再被重新组合。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尽管基本上没有

造成混乱不堪的局面，但同样充满了暴力事件，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个民族逐渐通过战争、革命和（包括谈判、阴谋、诡计、妥协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外交途径等发展阶段，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了独立。

属于这个范型的各社会之间不仅在传统的体制遗产上而且在政治领导的个别情况上都有许多根本的差别，最鲜明的特征是民族建设所付出的人的代价。这种情况比在英国法国及其在新世界的旁枝要严重得多，政治领袖的精力以及人民的热情和资源都倾注于去保卫所获取的领土，并准备着解放仍受异族统治的毗邻的或相关的领土。欧洲中部到1871年实现了不牢固的稳定，而东部却一直积聚着民族主义情绪，直到点燃了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熊熊烈火。尽管民族主义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自决使得社会不受外族的歧视性统治而建设现代化），但它却连续多少代成了目的本身。在民族主义的祭坛上现代社会所能保障的许多人权被牺牲了；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也屡屡受挫，一再延宕。在希特勒时期的德国，这种扭曲了的价值观以极端的形式施出许多永载罪史的非人暴行。

在这些社会，经济转变最迅速的阶段发生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半期。瑞士、德国在30年代遇到

了社会整合的问题，而另外8个社会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到达这个阶段。这些社会跻入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列，堪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比肩，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它们。其他12个国家，主要是东欧和南欧国家，尚未发展到工业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缓慢的发展归因于基础资源的短缺，但通常它更是决策的结果；它们更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安全、稳定和认同，而不是经济和社会的转变。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它们的政治领袖相对而言缺乏对现代化的关心。

第四范型

第三范型的欧洲社会在新世界的旁枝可以看作政治现代化的第四范型。该范型的社会包括拉丁美洲20多个独立国家，人口为2亿3千万左右。这些社会与那些居民亦以旧世界的移民为主（当然其资源和技术基础不同）并且也是后来进入现代化的第二范型社会不同，它们受外国影响的程度更深，尤其是受到那些不大强调现代化的第三范型社会的影响。

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的实现并未导致现代化领导之权力的增强，相反却确立了趋于使传统生活方式永恒化的新殖民主义形式。即使在那些欧洲人占优势的国家——如阿根廷、波多黎各和乌拉圭——

它们从欧洲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但其现代化领袖的地位仍未得以强固。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这些国家的农耕资源条件限制了都市人口发展来解释，但它首先似乎应归因于那些政治上活跃的居民所持的价值态度。他们昭示的民族目标宣言、确立的政府形式是以自由的欧洲模式为基础的，他们所使用的词令主要来自于法国革命，但他们的政治系统的内容在几代人那里都与现代公民身份和国家状态的体制不符。

在大多数拉丁美洲社会，政治现代化受到下述事实的严重束缚：欧洲血统的居民人数较少，但他们不愿和构成人口多数的印地安人和混血人种居民（有些国家也有非洲移民）共享政治权力。在这方面，这些社会的情况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的印地安人口微乎其微，非洲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在美国，非欧洲出身的人口如此之少，以致于直到出现了社会整合的压力以前，他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未被重视。只是从3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才不可避免地提到公共政策的最前沿。相形之下，大多数拉丁美洲社会，非欧洲出身人口的数量限制了实际的公民身份的扩大，并造成了一些富有的欧洲血统居民与大量相对穷困的半欧洲血统和非欧洲血统居民之间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的社会影

响由于占统治的地位的少数人把他们的财富向海外而不是向国内投资而加剧了。

墨西哥是第一个印地安人和混血人种居民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在那里，实际的公民身份被扩展到欧洲人口之外。这种政治的扩展是通过1917年革命性的立宪改良完成的，它将公民身份扩大到所有居民，实施了土地改革，并促进了政府指导下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成就一部分可用胡亚雷斯① 和迪亚斯② 的准备性工作（他们确立了自由改革与政治秩序相结合的传统）来解释，一部分可用与美国最接近，得以通过商业投资和范例而受其强有力的影响来解释。墨西哥的成就，并非靠其他无济于事的影响，它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源泉就是出现了受革命和自由观念激励的充满朝气的领袖。

到了本世纪中叶、现代化领导在拉丁美洲的半数左右的国家得到了巩固，而且开始了迅速的经济转变过程。近来，人们在测定各个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成就时，得出了种种相关的指标，而从这些指标所排定的各国情况来看，像阿根廷、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在人均发展水平上已大致上可

① 胡亚雷斯（Juarez，1806—1872），墨西哥民族英雄，1858—1872年任墨西哥总统。——译者注

② 迪亚斯（Diaz，1830—1915），墨西哥政治家，1876—1880，1884—1911两度任墨西哥总统。——译者注

与苏联、意大利、日本和东欧较发达的国家相比。其他国家，诸如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等显然正处在迅速转变的过程中。然而，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如玻利维亚、海地和巴拉圭仍处于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之列。

第五范型

那些未直接受外来的干涉，但受率先现代化的社会间接影响而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代表着政治现代化的第五范型。构成这个范型的社会有俄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泰国，它们大约有12亿人口。这些社会都有这种情况：它们的传统政府都是强有力的，因为它们都有集中化官僚政府的长期经验，这使得它们能够在现时代长时期抵御直接的广泛的外来统治。与其他大多数社会相比较，它们本质上是自主地实现现代化，而且具有源远流长的领土与人口的连续性。这些社会维持它们独立的能力可以从各种环境来解释。在中国、伊朗和土耳其，权力的均衡，或更坦率地说，权力在较现代的竞争者之间的分配，无疑是比维护它们独立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因素。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泰国，难以渗透和孤立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在俄国和日本、独立首先依赖于它们自己的军事实力。然而利用权力平衡以及维持意义重大的军事机构的能力，归根结蒂源自于有组织的政府有足够的力量迎接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外来挑战的传统。

这些社会代表的政治现代化的范型也可以从它们无需面对的问题来考虑。它们在现时代不必去为在外来统治下差异很大的领土上创立新国家而烦神。这是一种深深分离的经验，尤其是在那些后来进入现代化的欧洲社会，它花费了政治领导人大量精力和心血，使其顾不上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问题。第五范型的社会最为持久不衰的特征之一是它们在遭逢现代性的挑战之前（在中国、日本和伊朗是早在若干世纪以前）便确立了它们国家的疆土和人民的基础。这些社会也不必去对付直接外来的殖民统治的特有问题。这些国家在现时代都从某种程度上经历过外来的干涉，外国曾在一个时期占据了它们的领土(意大利统治了埃塞俄比亚5年)。它们在有条件投降的形式下给予外来者优惠的待遇，同时，它们还广泛依助于外国的贷款和顾问。诸如此类各种干涉形式与殖民主义所代表的直接而拖延的外国监护的经验迥然不同，这些社会的领袖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以依赖更现代的社会为耻，但除却较短

的占领时期，这是一个依附的问题而不是征服的问题。

在这些社会中，传统政府本身遇到现代性的挑战是开天辟地第一遭。如德川时期的日本、清代（满洲）时期的中国、奥斯曼时期的土耳其、卡亚尔王朝的波斯、狄奥多尔和曼涅克二世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和却克里王朝时期的暹罗。这种官僚政治的传统可能适应兴修水利和建立通讯的特殊问题发展而来的，或者可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将其归因于地理、政治环境和领导机遇等学者们尚有争议的因素，但意味深长的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堪与英国和法国媲美，它们在从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转变中具有连续不断、缓步前进的特征。

这些传统政府是如此强大，足以阻止它们的国家遭受更现代的国家的践踏，因为现代性的挑战实质上是外来的挑战，尽管现代知识作为内部的挑战会在这些国家找到拥护者，而且最终它们也会非常现实地认识到，如果不引入现代改革，终将会屈从于外来统治。因此，它们开始了所谓有限的或防御的现代化的计划，力图维护传统社会，使它免受因国外或国内现代化者的成功所引起的深入而全面的变革。这种改革包括俄国的彼得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改革、日本的德川幕府改革、土耳其的马哈茂德二世

和阿卜杜尔·梅德吉德一世改革、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的改革、暹罗的蒙库和朱拉隆功的改革、阿富汗的沙·纳西如德丁改革、埃塞俄比亚的曼涅里克皇帝改革。这些改革所关注的都是为官僚和军队提供现代训练和装备、改进交通运输条件和建立高等教育体制。国外专家被邀请进来训练本土的学者和技工，本土的领袖则远涉重洋去学习现代技术。

然而，这些改革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们旨在强化传统体制以顶住外来的压力而不是转变传统体制。农耕经济和构成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并未受到有限度的现代化的影响，精英集团保持着他们的传统特权。通过这些手段更现代的社会的挑战不管怎样一时得到了回应，朝向渴望深入现代化纲领的政治领导的转变还是延宕了几代人。然而这些具有根深蒂固的保守本性的政府被防止它们脱离实际的目标驱赶着，而且它们还逐渐认识到深入的现代化最终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认识或是从军事挫败后的震惊和恐惧中得到的，或是在对现代性之优势的不很令人振奋的环境的认识中得到的。

无论如何，重要的问题在于：在这些国家，从根本上与过去决裂既不是由政府之外的国内力量所发动的革命所造成的，又不是由外国势力的占领所造成的，也不是由反对外国统治的民族起义所造成

的，而是由传统领导本身所造成的。能代表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是俄国1861年的农奴解放、日本1868年的推翻幕府、中国1905年的现代学识对作为一种选拔官僚的条件的古代经典的取代、波斯1306年、阿富汗1923年埃塞俄比亚1924年、暹罗1932年立宪政府形式的确立。这些标志着旧王朝的终结的行动或是由统治着的君主所造成的（如在俄国和中国）、或是由在任的官僚集团中高层成员的领袖所发动的。后四种情况通常被称作“革命”，但它们只是统治精英集团内部的革命，而与英国、法国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不大一样。

尽管在这些社会中，有限而集中的政治现代化形式是由在任的统治者和官僚策动的，但他们并不能长期维持这种首创精神。唯有日本没有发生推翻王朝的革命而于1945年使现代化领导的政治权力得到强固，虽然30年代和40年代的军事反叛和美国的占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内部的革命。在其他国家现代化领袖的强固卷入了迅猛的革命，诸如：俄国1917年2～3月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布尔什维克10月革命；中国孙中山在1911年、蒋介石在1927年、毛泽东在1949年所领导的革命进程；土耳其凯末尔在1923年、波斯里泽汗在1925年推翻在位王朝所引起的革命，而阿富汗在1923年、埃塞俄比亚在

1924年、泰国在1932年开始的现代化领导还不能说已得到了强固。

传统文化的内聚力和认同感能使这个范型的社会在面对外来的强大的现代化压力时保持它们的完整性，但与此同时，它也以各种方式延宕了转变的过程。最极端的例子是中国，它是最古老最成熟的传统社会，在使自己的体制适应现代性时困难也最大。在对这种现象各种各样的解释中，似乎最有道理的解释是其政治和理智领袖们深信：传统的真理是千真万确的，他们自己不能丢弃之。直到1905年中国才用现代知识代换了科举考试的传统知识，即使在今天，许多中国领导人还保持着明显的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观。

这些社会由于以上指出的理由，可以归入一个政治现代化范型，但在其他方面它们却大相径庭。这些差别不仅在它们的传统观念和体制上而且在它们的资源基础上都是显而易见的。俄国和日本都是从深厚的农业基础上起步，到了19世纪末，它们已跻入世界上最迅速的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之例。在20世纪，由于它们在经济发展范式以及在政治领导的起源和体制上与众不同，它们今天按人口计算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已赶上或超过除英语世界和西欧以外的大多数社会。从人均基础上比较来看，中

国、伊朗、泰国和土耳其取得的进步不大，而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亚则处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第六与第七范型

那些经历过殖民统治的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100多个独立的和依附的社会可以划分为最后两个政治现代化的范型。第六范型由34个独立国家和29个依附国家构成，人口约有10亿，它们充分发展的传统文化在适应现代功能的过程中能够与更现代的监护社会的文化相互作用。因此，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所面对的适应现代知识的问题与基督教和犹太教遭遇的问题相似。阿拉伯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和马来语为着现代交往的需要而得以改进和丰富，这就像当年英语、法语和意大利、以及稍后的俄语、日语、汉语和土耳其语所遇到的情况一样。近东和亚洲的传统政府形式适应于现代政治的需要，这也与当年欧洲的封建体制和俄国、土耳其、日本和中国的官僚体系情况相同。然而构成第七范型的社会（次撒哈拉非洲和大洋洲31个独立社会，将近20个依附社会，有2亿人口）没有充分发展的宗教、语言、政治体制，当它们面临现代性挑战时，不容易适应现代条件，相反，它们发现原封不动地

从更现代的社会照搬现代观念和体制更实惠。

这两种范型的共同点在于都经历了殖民主义，这对于现代化的开始阶段即现代性对传统社会的挑战具有激发作用，但却会使下一阶段即现代化领导的政治权力的强固阶段拖延下去。在殖民社会中更年轻更有冲力的领袖通常不是传统精英集团的成员或亲眷，他们往往在宗主国受到高等教育后又回国，他们发现自己改革的努力受到本国传统领袖和殖民统治者的联合反对。这对于有远见的年轻的领导人来说是一次深感失望的经验，结果，他们的现代化纲领往往采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的形式。的确，一旦殖民地最终获得了独立，其领袖通常都是排外的现代化者，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反对欧洲的欧化者。在他们寻求引入现代观念和体制的同时，他们也抵制外来的影响和援助，甚至不惜以较慢的变革速率为代价。他们希望尽快实现现代化，但他们希望靠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主要从剥削的角度来解释殖民主义的观点，不能说明这些社会中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剥削的确存在，特别是在拥有容易采掘的矿产财富或拥有能够吸收监护国工业产品的殖民地那里。就这些活动能够带来非常高的利润而言，把它们说成剥削是恰

如其分的。尽管这种剥削给一些欧洲人造福不浅，但也没有以任何根本手段使殖民地穷困潦倒。这些殖民地太穷，难以生产出多少按人口计算的财富，也无法吸收大量消费品。对发达国家来说，工业品的大市场及其主要投资目标，是在国内或具有相当的发展水平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遭受到最残忍的财富掠夺和最剧烈的暴力流血，并不是由它们自己的现代化领袖在获得独立之后把社会从农耕生活方式转变为工业生活方式的努力所致。殖民地的经历使得人们特别注意这些社会的监护的地位和现代化领袖在争取独立的努力中的挫折，但典型的政治暴力和经济困难是在他们获得独立之后才以最极端的形式出现。

与属于第二、第四范型的社会（即欧洲社会作为其旁枝在新世界建立的殖民地）有很大不同，这些殖民地在其政治内聚力上依赖于监护的势力。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它们才具有实现独立国家状态的历史基础；它们无论是作为殖民地还是以后作为独立国家、其政治结构都是监护势力的政治权威所造成而不是由它们自己的创造性所导致。印度或许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它是一个最初由英国当局聚拢起来的、由500多个传统主权体系所组成的乌合之邦。其他大多殖民地社会同样依靠监护势力的政治

权威，在监护势力撤开之后，它仍在领土的划定、独立的条件和其他方面留下有效的余威。

尽管往往处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受监护的地位，这些社会的传统文化的水平使得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合作者参与酝酿现代化。本土体制和直接引入的体制的相互适应产生了独创的，有效的形式。它们发展了教育系统、建立了高等学术机构，在国内外训练了领导干部，并能在受监护的框架中承担起许多自治的责任。当现代性的挑战在这些国家体现为欧洲观念和体制的最初影响时，现代化领导的强固便在监护之下开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独立时期完成。努里·赛义德，尼赫鲁或苏加诺在独立前都曾感到灰心丧气，但不能说那里的现代化领导的强固，伴随着比在欧洲或新世界情况下还要大的暴力。监护势力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但只要它们撤开就会逐渐显示出：这些社会现代化的障碍首先应当到传统资源和体制的遗产中去寻找。

第六范型在政治现代化中遇到了许多共同的问题，但第七范型的社会所碰到的问题却与此不同。它们缺乏充分发展的传统文化，不能在较大的程度上适应现代功能或与更现代的社会的文化相互作用。所以，它们遭遇到了两个特殊的问题：在殖民时期，它们不能启动实质性的现代化；而在取得独

立之后，它们又在相对现代化的世界环境中，在前所未有的条件下，一下子遇到了其他社会自从现代性的挑战以来一直面对着的全部问题。

在这些社会中正像在第六范型中一样，监护势力追逐有限的目标，并且不把大量投资视为己任，而大量投资对于推翻传统领袖、改进农业、建立工业和发展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较发达的殖民地社会往往自己行动起来，不断冲破监护势力的当初的阻力，向前迈进以创造自己的现代体制。次撒哈拉、非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人民没有这种创造的能力。能说明这些在殖民统治下的社会之相对静止特征的，并不是监护势力的歧视性压迫，而正是这种缺乏创造性。因为它们的独立不是标志着现代化领导强固阶段的终结，而是标志着它的开始；正是它们的独立方向其领袖第一次提出了创造现代社会的任务。

相对说来，实际上是白手起家的第七范型社会的前所未有的经历，使它们遭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很难预料。唯一能够确切预言的趋势是它们不必亦步亦趋地追随率先进入现代化的社会。它们不必去发明创造便能获得喷气式飞机、现代工厂和教育纲领。在另一个极端上，同样能确定的是缺乏发达的传统文化使它们很难通过直接借鉴而获得现代体制。如果有可以无限利用的资源，这些社

会便能获得整套的现代学校、医院、工厂、农田和城市装备。问题只在于训练一代使用这些装备的新人。这对于发达社会与不发达社会同样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只不过发达社会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装备而已。因此，在前面漫长的征途上，对于其农业人口和文盲的数量与人口总数的五分之四以上的社会来说，只能走对一切社会都通用的捷径：根据其资力从发达国家获得现代装备。由于它们的资力一般都很有限，而且它们是从很低的发展水平起步的，因此，前面的道路修远而坎坷。

五

现代世界的前景

1 现时代的世界政治

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影响着各社会内部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它们相互的关系。纵然国际关系的许多传统形式仍旧存在——诸如联盟与战争，征服与殖民化，文化传播与宣传——但这些古老的形式被赋予新的意义。今日，最令人惊叹的新情况就是知识、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最终心理变化的速率。这种惊人的变化速率造成了意想不到的不稳定类型和不稳定程度，以至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发觉极难对付这种不稳定的局面。

维护国际秩序的核心问题在于：尽管国际秩序

中每一个参与者都从自己的角度渴望稳定，但它们在规模、影响、发展程度、政治文化遗产以及对国际环境的认识上差异甚大，以至于它们互相之间难于找到合作的共同基础。这并非是说有可能实现永远不变的稳定，因为只要人类还具有思维能力，所有的社会体系（包括地区的、国家的、国际的，将始终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自从社会进入有组织状态并相互建立关系以来，不稳定力量与秩序力量就一直在扭斗着。然而，现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知识的迅速增长导致了昔日起作用的种种力量的性质与范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自17世纪以来，各种秩序形式（如外交实践、会谈程序、国际法、国际政治或功能性机构）的不断发展有助于使这些关系制度化，但是，各种类型的国际混乱的延续和日益扩大表明上述种种体制无法调节不稳定的关系。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各种发展增加了维持世界秩序的难度。各个社会通过交换外交使节和加入国际机构而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参与者的数目逐年增加，从1825年的25个，1900年的40个，1920年的60个增加到1965年的130多个。维持这些数目众多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和意见交流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不可低估。仅联合国总部一年一度的评议会就要产生出用六种语言写成的不下90000页的文件，而

这就必须印发450000000份文本。世界各国在规模上的巨大差异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例如联合国各成员国的人口多至5亿，少至10万；国民总产值上达7千亿美元，下至几百万美元。

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对于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国家之相应的国际地位的影响。短短几百年的时间，这些国家从罗马帝国的边区村落一跃而为举世皆知的最大势力中心。作为现代化的始作俑者，它们也担负起现代化的布道者的角色。它们也曾以入侵者的身份将现代的观念和体制传播到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在其影响鼎盛时期(1900—1920年)，寥寥几个欧洲国家就将多达5亿的非欧洲人置于其统辖之下。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导致了连续不断的摩擦。在那个尚武的时代，许多现代手段常常被拒斥。这一关系也造就了一批反欧的现代化者，他们一方面借鉴欧洲人的做法；一方面又与欧洲的统治作斗争。然而，归根到底，更加现代的国家还是成了其它国家的效仿对象，它们给后者既带去了现代知识的益处又引入了无法回避的问题。由此看来，帝国主义可被视作为一种展开现代化的力量。当被统治者发展到有能力摈弃那些更加现代的社会的监护之时，后者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就日趋衰微。

早期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在西欧与新大陆都处于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当时的世界上几乎没有可匹敌的对手，这使它们最终成为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中心，并在许多方面成为所有其它国家公认的样板。相形之下，后来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则需面对更严重的竞争与不稳定，而且还时时处于这种急迫的压力之下：面前的样板看上去离自己如此之遥，以至于希冀的目标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现代化程度迥然相异的社会的并存只能给现代程度较低的国家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尽管这一破坏的程度取决于引进变革时的国内情况。无论如何，在喷气式飞机与牛车并存的地方，现代化所承受的考验要严峻得多；而在各方面发展都较为平缓和均衡的国家，这一考验相对就要小得多。

尽管后来进行现代化的社会显然遇到许多深刻的问题，它们也占有明显的优势。帝国主义经常仅仅被视为政治压迫的根源，然而事实上，它却以相对小的代价传播着现代化的种种益处。由于帝国主义的原因，许多发展已臻完善的现代体制和人工制品可为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所利用，使之免去了创造它们本来应经过的代价昂贵的试验阶段。早年进行现代化的社会有时发现那些曾得益于自己开创

性研究的国家已超越了它们。在机械与生产方式上，在创造性思维和科学研究上，早年进行现代化的社会意识到它们昔日的学生终将与它们平起平坐，有时甚至将它们抛在身后。

总体说来，通过帝国主义传播现代思想和体制会强化现代性的挑战；不过它也延宕了现代化领导者的获取权力。监护国只想按其自身的需要，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将现代化的利益推广到一定程度。它们并不愿看到一种彻底的现代化，因为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被统治者的独立，并使统治者丧失本来可以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的种种好处。确实，彻底的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动员极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的革命过程。除非它牵扯到根本的民族利益，没有一个监护国会承担这种任务。法国曾帮助阿尔及利亚走向现代化，俄国在中亚诸国、日本在朝鲜和满洲也曾这样做过，不过这些均为特殊事例。而屡见不鲜的，倒是像荷兰在印度支那、英国在印度、美国在菲律宾群岛、比利时在刚果那样，监护国依靠传统的寡头政治统治来维护秩序。如此这般，监护国便可以以最小的资源代价来维护其权威。然而，这却给当地的现代化领袖们造成巨大挫折。他们通常在监护国的高等学府中受过教育。

人们早已注意到现代化具有紧张的特征，其主

要原因之一应追溯到这个事实：即现代化程序欲赋予各国政府更大的权威而与此同时又使它们更加相互依存。一方面，为了顺应现代化的要求而动员各种资源、建立秩序、形成认同、维持体制的统一，政府必须拥有更大的权威以利于在经济、社会领域内实施全国控制。另一方面，各种力量又趋于使各个国家更加相互依附，这些力量包括通讯手段的改进、现代知识的普及、商品和服务交换范围的扩大、数百万人口从一国向另一国的迁徙、国际联盟职能性组织的出现、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经济的专业化。经济与社会的变革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与技术，这很难在单一的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国度中全部得到满足。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由于其广袤的领土和丰饶的资源及技术而能够在与邻国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得以发展。其中美苏两国以其不同的方式尤显突出。不过，它们毕竟只是例外，种种既强化又削弱政治权威的巨大力量常常给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带来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确实，这些力量一直无所不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联盟关系、战争以及标志着现在国际关系的政治整合的种种尝试都看作是在寻求安全感。与过去相比，寻求安全感更显急迫。从此角度看来，19世纪末发展到最后阶段的

帝国主义证明了更加现代的国家企图通过将其主权扩大到不够现代的国家并以此控制其资源和技术的途径来加强本国的安全。很清楚，紧随帝国主义旗帜之后的未必就是投资、贸易和人口过剩。现代国家中推崇帝国主义的利益集团是有着多种考虑的。与此同时，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安全的有力保证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有足够的例证说明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从它们的海外领地中攫取它们本来捞不到的好处。由于从占取某些领土中所获的利益无法预先计算清楚，帝国主义国家总倾向于先把这些国家争夺到手，以免其被别的对手抢走。此外，要维护一个帝国就必须占领战略要地，以求能保护那些较有价值的和较边远的领土。有些现代国家将其统治扩大到毗邻的国土上，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宗主国社会，而不是将其作为殖民地统治起来。譬如，英国兼并了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俄国兼并了乌克兰、波罗的海诸国、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

至1900年左右，较为现代的国家的扩张暂告一段落，究其原因并不在于它们占领的国家的反抗——这一反抗直至一两代人之后才发生——而是由于再无领土可被征服了。现在，现代社会通过联盟体系寻求通过帝国主义无法实现的安全。原先，联盟关系被看作是安全的从属性保障。一旦海外领地

受到威胁，有必要时便可牺牲任何联盟关系。如今，这种关系却成为首要的问题，它被看得如此重大，以致于为了保护一个无论多小的联盟，且除了削弱联盟体系而别无选择的话，现代国家便不惜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在此情况之下，国际冲突便象瘟疫一般传染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危机而引发的。

这一次世界大战起因于欧洲政治体系不能适应民族主义和相互依存之间的矛盾的压力。而且，和平的方式无助于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相反，它往往使强化民族主义、经济统制主义以及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力量更加巩固；并削弱了协调各国之间差异的体制与信念。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与经济上的闭关自守蔚然成风。和谈会上提出的各种建议以及后来为了使现代化的国际压力制度化而强施的各种方式无不失败。经济上的民族主义使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被大大加剧，同样也使通过国际手段缓解这一危机的种种努力遭到挫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削弱了欧洲对于其它民族的影响，并通过引人众多参与者以及各种势力集团而改变了国际体系。随着各国进入整合较之发展成为更主要问题的时期，对国际秩序的关注日益增加，而对可能导致战争的海外冒险的兴趣则逐渐减少。

比较发达的国家已进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要不是因为世界大萧条的破坏性影响，它们很可能会避免第二次冲突。很显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各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支持有秩序的国际体制。然而，持这一态度的国家为数甚少。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许多国家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仍是现代化领导的强固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许多国家面临着民族建设的任务，这往往要求它们去吞并邻邦，打碎王朝帝国统治，统一互无联系的土地。一俟领土问题解决之后，在此发展阶段的国家常常采取封锁的政策，千方百计地试图在一个被看作是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保护仍很脆弱的独立。这种态度对于稳定的国际秩序无任何益处，另一类型的国家，也拥有几百万人口，仍在寻求摆脱外来统治，争取独立。国际秩序对于它们恰是头号敌人，因为它们独立的主要希望就在于监护国产生动乱。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70个国家，10亿多人口，从外国控制下解放出来。另外还有40个国家，2700万人口，仍急切地盼望着独立。

如此纷繁复杂的发展水平和五花八门的民族目标，是由这些社会的居民根据各自冲突的意识形态而领悟的。除却富有和穷困的简单并存不说，深深

候人每一社会和许多亚社会生活经验中的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是更合理的意识形态，它长期以来存在于政治思想中并且代表着在概括和抽象人的经验方面的努力。这些意识形态发源于西欧，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的设想和信仰、同样关切现代化的问题；然而，它们在价值和眼界上却有根本的差异，这引起一种体系与另一种体系相对抗，而且它们日趋与每一个社会理解自己民族利益的方式交织一起，以致于甚至那些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也会发生武力冲突。

政治科学家可能至少会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范畴：自由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经济统制主义。这种范畴一经划出立刻会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并被分作许多更细的部分。为此，我们只消指出这点就够了：这些敌对且矛盾的意识形态，即使都追求着相同的一般目标，也是造成国际政治体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承受着过时假说的重负，无法充分说明现代世界的实际情况。意识形态必须保持稳定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在众多不同的人民中间维护意见一致。然而，这些意识形态所涉及的现代环境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它们发现自身不断为事变所超越。

在一个负荷着相互冲突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中，秩序有赖于国际体系中的主要成员之间的一致意见，在这种国际体系中动乱与不稳定所付出的代价比可能获得的利益更大。这种意见一致的前景蕴含在两个因素中：大多数国家都发展到对国际整合的要求超过了闭关锁国和机会主义的价值；军事技术的革命使大规模战争的代价提高到难以计量的程度，以致于使可能获得的利益完全无法与之比拟。

无疑，说起国际体系的秩序有赖于主要参与者的意见一致已是老生常谈。然而，回想一下18世纪以及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中的情况还是有教益的，那时决定国际秩序的司令部就在欧洲，它靠着将冲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里，维持各种力量的和谐。这种和谐被1792—1815年间的革命战争破坏了，这些革命战争的原因在于那些很容易与现代化的过程联合在一起的变化性力量。后来，这种和谐又被重新确立起来，而且直至19世纪的后半叶，它都相当成功地服务于维持国际秩序的目的。这种利益的和谐被1848年的革命，克里米亚战争和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战争所削弱，但直到欧洲面对1878年的重大危机时，造成认同的力量仍然强大得足以维护秩序。

然而，从1880年代到1945年没有形成与此类似的认同，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受到了众所周知的最大战火的摧残。显然，各民族希望从战争得到的价值要比预期的代价大得多。又必须承认，就其确保了绝大多数参与者的安全而言，两次世界大战都带来了实际的利益。现在，这种经过合理的计算的代价和利益的平衡，只受军事技术发展的左右。直到核武器的出现（实际上直到1950年代核武器发射系统臻于完善），从大规模国际战争中究竟能否获得利益才成了问题。这并不是说，那些强国的政治领袖已正式首肯禁止使用核武器（如果有适当的检查系统监督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也不是说那些著名的军事专家都已不再认为使用核武器是正义的了。现在，人所共知，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要比一、二十年前用常规武器进行的战争所产生的后果大得无法计量。

由于核武器的使用，战争的代价大幅度增长，军事技术的革命对那些审慎地避免动用核武器的大国取得一致意见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这种态势对于维持国际秩序有意义深远的贡献。事实上自19世纪末期以来，今天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比任何时候都要小。与此同时，这种核武器导致稳定的倾向带来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副产品：使用常规武器的地

方性战争现在相对来说比以前花费的代价要小并有希望带来实际利益。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刚果、克什米尔、越南以及其他地方的战争都保持在适当的限度里。的确，由于拥有核武器的社会在使用核武器上受到限制，其他社会则比在别的情况下相对具有更大的尚武潜力。在这种意义上，核武器一旦用作制止大规模战争的威慑力量，它就会创造出这样一种环境：小规模战争的发生不象前几十年那样会带来可怕的重大后果。

今日之世界是一个充满希望但仍然不甚安全的世界，国际秩序是由强国来维持的，这部分是因为它们认识到它们的最终安全要靠国际整合的途径，部分是因为它们担心在核武器的时代其他道路会付出重大代价。这些希望与恐惧在联合国中找到了即使是不完善的也是最好的表达，联合国通过它的各种机构反映了迄今所能实现的协作程度以及对发展一种有秩序的关系系统似乎是最有助益的国际功能类型。在这种由较发达的社会驾驭的秩序框架中，众多不太发达的社会（有一些也相当发达）追求的目标是既承受着地方性变革所造成不稳定的必然性，又担负起不会危及国际秩序也不会引起核武器危险升级的发生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2 现代世界的概念

国际性冲突潜在的破坏性甚至在核武器使人类面临全面毁灭的可能性之前就已激起建立世界性一般组织的想法。在各种有关现代世界社会如何可能从各国家主权的混乱状态中出现的观念中，有两股思潮尤为值得注意。这两股思潮均发源于欧洲，它们的共同之处不仅在此而且也在于它们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共同的奋斗目标。然而它们却面临着从不同的道路去实现共同的目标。其中一股思潮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流行于西欧和英语社会，它发起形成了国联和联合国并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产生很大影响。另一股思潮产生于那些将西欧和英语世界人民的优势视为对自己的独立和发展构成威胁的国家。在第二股思潮中，共产主义领袖的观点最丰富、也最持久。

在先进的西欧和英语社会流行的现代世界的概念断定是它们首倡形成国际体制，而且世界的转变是由于它们的价值和体制被广泛采纳的结果。这种概念起源于根植在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宗教和社会思想，在18、19世纪，有关世界实际情况的多少现实一些的观点开始进入这些理论。然而，直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大灾大难降临，才能说这股思潮离开了思辨圈子而进入了实践领域。

那种认为现代世界植根于先进的西欧社会及其海外后嗣的经验的观点可以看作一种发展理论，一种对待其他社会的态度，一种计划。发展理论优先强调的是人的活动的政治方面。历史变革被看作是通过理论家的更新换代而进行的从政府主宰一切，最终向人民自己执政的逐步转变。这种理论坚实地建立在被认为是“西方的”宪政经验的基础上（实际上它吸收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被看作是普遍有效的。在这种观点看来，“西化”和现代化实质上是难解难分的。

有关各种政治系统必然从专制制度向立宪民主发展的理论反映了扩散论思想在政治发展理论中占据优势。这种思想坚持认为西欧和英语社会（统称作“西方”）已经发展出的政治体制向“非西方”社会的传递是最关键的问题。正如汽车和喷气式飞机无论在英国还是在也门，无论在法国还是在马尔加什共和国都能很好地工作一样，个人主义、公民自由、代议政府等概念也能由英国和法国向那些社会传递并能在那里发挥作用。但有一个必要条件，即：那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必须促成适当程度的启蒙。世界被分割成“西方的”和“非西方的”社

会，对后者而言，正确而不可避免的道路就是尽快地采纳前者的政治体制。人们承认，他们自己的传统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能适应西欧和英语社会的规范，但主要强调的还是“西方”政治体制向这些社会的扩散。由此而论，各种共产主义和经济统制体系都不被看作现代化的一种纲领，而被视为暂时性的社会失常，它们要么不打算实行政治自由，要么经由国内革命或外国干涉而受到刚愎自用的领袖的左右。

这种概念所设想的计划包括在每一个新的国家建立各种形式的民主政府，并且同时形成这些政府的世界性组织。建立这种尽如人意的政府以及这些政府的国际联盟显然被当成人类正在趋向的目标。经济和社会变革仍将继续进行，但将在多少确定的民主国家的框架中进行。这些社会被看作是平行发展的，尽管它们之间的差距尚远，但终将达到同一目标。

这种观点有许多类型。有些人把国际联盟视为人类的最终议会。一些严肃的国际关系的研究者以同样的精神把1960年代看作应当把联合国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征税、立法、管理和强制权的道地的世界政府的时代。较温和的提倡者则打算长期等待并容忍多种多样的发展范型。然而，不管哪一种类型都认

为现代世界将带有“西方的”本质特征。

从这种西化观来看，20世纪的政治发展泛出了乐观主义的曙光，除了亚洲的三个共产主义国家之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获得独立的70多个国家都可在一般意义上称作西方民主目标的追随者。即使其中有些国家在其政治发展的某个阶段大肆宣称是“反西方的”（如1920年代的土耳其和伊朗，1950年代的埃及和印度尼西亚），它们的政治领袖也都广泛吸收着欧洲的激进的共和模式并可以说是都在寻求“西方的”目标（尽管他们偏离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当代的世界政治被看作“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内战（“东方”一词所包含的内容的差异要比“西方”更大）。西方的优势在于有更多的资源、更丰富的经验，而且更贴近势在必行的政治发展路线。从这种观点来看，挑战在于某些社会迄今仍必须面对这种状态：它们可能受着通过捷径追求现代性的错误允诺的诱惑。

共产主义者想象的现代世界社会所采取的形式不会导向诸如联合国这种富有意义的成就，但是它阐述了某些令人感兴趣的观点。如果我们要去问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如何看待未来世界的社会组织，他十有八九不能给予非常确切的回答。然而他会承认：创造一个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我党的

公开的目标，而且他能就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需要做什么的问题说千道万。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领导人还未对这种远景谈论什么，因为那时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工业化和国防问题。但是世界性的社会结构是共产主义从其形成之日便已明确的目标。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又开始成为苏联讨论的主题。

这种世界性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当然是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但当初他们的学说对这个问题的论述非常模糊，非常一般化，列宁及其继承人后来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就其最终目标以及有可能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作了更精确的记述。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苏联关于发展一种世界性社会的概念就是个别国家中阶级斗争的引伸。按照这种理论，当无产阶级在各个社会夺取政权之后，它便可能将这些社会熔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首先依据的是对英国、法国、德国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是最先进的国家，他们承认世界上的各种社会有所差别，而且对经由什么过程来实现世界共产主义并无清楚的观念。苏联领导人一开始同样没有明确的想法，只是到了俄国革命形势迫近的关头，他们才开始重新解释这种学说以迎接新的环境，为自己的需要服务。由于共产主义者

于1917年获取了政权，其领导人开始把俄国看作是最先进的社会，因此，他们最先考虑的是全世界不可避免地向共产主义发展。

纵观苏维埃统治的早期，尽管当时的环境尚未提供创造世界性共产主义社会的适宜条件，而且据认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具体实施必须从国内开始，但这种社会已被作为一种理论上的目标而提出。就是在那个年代，苏联官方文件已明确宣称并在公开场合一再重复这种观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是未来世界苏维埃社会共和国的样板，并且是它实现的第一步。然而，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了有助于进一步精确阐述这种纲领的环境。到了1950年代，随着苏联对东欧占领和共产主义领导者在中国及其邻邦的胜利，世界上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共产主义统治之下（尽管这些社会的领导人怀有大相径庭的观点和政策）。这种得益，再加之苏联和美国在核武器及其发射工具发展上形成的激烈对峙，使其理论上的目标接近于实现。

近年来，苏联领导人讨论了他们的学说如何通过国际和国内手段而实现的计划。在国际舞台上，尽管他们持这种十分刻板的学说，但他们实际上却承认不同社会的传统与问题各有差别。他们提出要把共产主义者已获取政权的社会尽可能凝成一个紧

密的整体，并在各地援助共产主义或非共产主义领导人中的伙伴直接夺取政权。他们设想首先会在更不发达的社会遇到各种机会，而且他们认识到先进国家不容易为共产主义者夺取。因此，苏联的目标是让共产主义控制的社会包围它们并逐渐地支配它们。

曾几何时，他们还认为实现这种最后的胜利需要一场大规模战争，但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他们已改口强调经济和政治的方法了。苏联领导人坚持认为：借助于扩大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他们将能在发达社会中制造经济混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大混乱可望导致实质性的政治动荡，它将给共产主义者用颠覆的手段控制这些社会以有利的时机。核战争的威胁与渴望和平和裁军的宣传会作为先吓后哄对方的手段被交替使用。中国的共产主义领袖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概念：亚非拉各国将在与中国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相似的道路上，在反对更先进的国家的世界性革命运动中联合起来。然而，这种独特的中国式的概念意义有限，未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最终的世界性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增添新的内容。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领袖把他们国内的基本任务视作沿着苏联开辟的道路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实现

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经济繁荣终将会实现，那时工作日将会缩短，人的需要将会极大满足。他们也承认，这个目标还非常遥远，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共产主义领袖主要的努力目标是增加生产。他们并未宣告完成这个过程的特定时刻表，但从不发达的国家提高生产水平显然所需的时间来看，这个目标的实现为期尚远。

共产主义理论把现代世界社会当作最终目标而且往往用模糊、空泛并且经常矛盾的字眼来描述它。一方面，他们承认一种高生产水平的世界经济非常需要集中的行政管理控制的方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最终消亡的学说则要求一种分散的行政管理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矛盾可以从马克思所坚持的观点得以辩解：人的本性随着生产体系的改变而改变，在共产主义体系下人将无需被指导管理。有些共产主义者还把“国家”和“行政管理”区别开来，将前者视作强制机构，将后者等同于管理企业和体制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机关。我们可想而知，一个共产主义的党、或者一个工商企业社团、工会或其他法人团体即不是以正式的国家体制来管理社会，也只是意味着给国家一个别称而已。世界的语言问题也给共产主义政府造成很多麻烦，他们曾就所有的语言或至少主要语言最终能否

熔合形成一种新语言展开过辩论，而最近又就俄语本身能否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语言展开过讨论。的确，近些年来，俄国共产主义者越多地讨论未来世界的社会，它便越类似于当代苏联社会的投影：党通过工会和其他公共组织的工作，逐渐地取代了国家。无论如何，共产主义者始终认为这种未来社会中的领导非常重要，而不管它是否采取“国家”的形式。他们正致力于强化这种领导。

苏联关于现代世界社会概念的本质力量在于，它承认所谓“现代化”是人类的中心任务，而且承认人们可以预见技术何时将可能缔造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它的固有缺陷在于，除了关于最终乌托邦的含糊其辞的概括外，它所提供的不过只是带着自己全部特质的当代苏联社会的现代化形式在全世界的投影。苏维埃领导人实际上提高了俄国的工业生产，他们也从其他各个方面使其现代化，但是他们为达到这一点所付出的在人这方面的代价，比以前建设现代化的社会都要高。他们发展出了许多引起广泛兴趣的体制，诸如农业集体化、中央计划。但是当这些发明创造被采用时，俄国的农业传统和问题以及俄国国家的实践都与此前和此后的社会大相径庭。

苏联的理论忽视了现实，未能充分注意不同社

会的各种各样的传统和实践。即使是在共产主义势力范围里，苏联、波兰、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政策也有根深蒂固的差异，而且，在这种势力范围的边缘上，南斯拉夫还演化出另一种不同的操作原则。苏维埃系统发生影响的重要源泉就在于它有一个小而精悍、组织良好的领袖集团，它能把握一个社会并能为彻底现代化的目标动员社会资源和技术。无疑这种情况鼓励了那些关闭经济和社会转变的更不发达社会的领袖。

西欧和英语社会坚持的现代世界的概念的力量就在于它们所实现的高水准。实际上，这种高水准鼓舞了共产主义的以及其他的现代化纲领。它的主要欠缺在于未能由负责的政治领导充分形成一种世界观。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可以对自己的问题采取实用的态度，这并不妨碍它们概括地思考自己正在做的事。它们提出的有关自己以及有关其他国家经验的简明陈述，与竭力使其纲领概念化、合理化的共产主义领导相比更呈现出某些不利条件。在许多情况下，现代化是借助发达国家的方法和援助而迅速发生的，土生土长的政治和知识领袖缺乏意识形态的目标和激情。

上述关于现代世界概念的比较仅仅是从已提出的各种态度中撷取的两种。从公元前4世纪的柏拉

图到19世纪的康有为，曾详尽阐发了多少关于人类问题的乌托邦式的救世方案。在20世纪，未来的现代世界的前景也是小说、哲学和政治学最热门的论题。这些思考都有很大的阅读价值，但是它们没有充分而实际地赢得对系统阐述政治纲领来说是必要的支持。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关系的战略中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和“东方”的现代世界概念受到其提出者的本族中心主义观念的侵蚀，他们把自己社会的历史发展过分简单化，并以一种教条主义的精神力图把他们的历史理论应用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关于现代化的国际性争论所展开的意识形态论争氛围，给予这两种概念的具体影响都比原来所料想的要大，而且这两种观点的意识形态的倡导者都倾向于把对手描绘成用大大小小的急功近利的手段策划征服世界阴谋的魁首。

3 国际整合的范型

包含着更大的世界主义成分的世界观并不难达到，在许多学术领域已就此展开过初步的研究，但先进社会的领导人向来过于关切国内增长和维护国际秩序的问题（而且也可能过于对自己的成就水平

志满意得），以致没有对前面世界性任务的概念化给予充分的重视。当然，曾经或正在受监护的社会，其经济社会的许多发展很可能是由更先进国家的技术知识和技术人员造成的，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援助的范围在那些社会获得独立之后便增加了。但是，这种活动并没有带来那种其意义能够被普遍理解的世界现代化的概念。

不难预见，世界性整合在某种形式上将是十多个更先进的国家已经达到的相互依赖水平的合乎逻辑的最终结果。就我们现在所能想见的程度来看，社会层次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化道路的终端。当一个既定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丰衣足食，受到良好的教育，享有很好的消费品、医疗条件和社会安全的时候，便可以说已经万事大吉，直到某种新的、尚未预见到的刺激出现并导致进一步的不同类型的变革。这种特定道路的终端即使是在那些目前最先进的国家也尚为遥远，因为不管怎么说，它们仍还处在社会整合的早期阶段，远未能控制住它的问题。

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对于个别社会而言，在这条道路假定的终端之外，下一步的危机已依稀可见。社会不会孤立存在，但世界上却有133个独立国家，和大约40个仍处于依附状态的国家。似乎

很清楚，政治现代化的下一步危机将是由国际整合问题引出的。这与18世纪发生在美国，19世纪发生在德国、意大利，现在发生于阿拉伯世界、东南亚或许还有次撒哈拉非洲的民族统一运动大不相同。民族统一作为民族建设过程的一部分，通常构成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向现代化领袖手中转移的一个阶段。同样，历史上出现的联邦、同盟系统，包括国联和联合国具有不同的等级，但它们都未能真正将各主权国熔合起来。这里所关切的并不是那些联盟，而是在民族层次上已经顺利实行社会整合的国家之间的国际整合的运动。这种新形式的国际整合的联盟将具有一个国家的属性。它应能征税，实施法规，要求其公民尽忠。一旦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它应对各个成员国保持同等的关系，就象英国、美国、苏联、德国、意大利和印度各国一旦联合起来对待它们各组成部分的亚社会那样。

这种联盟的动因与原先导致民族建设的动因大体相同，它是已在社会层次上发生的政治现代化过程的逻辑上的继续。在这种动因中，首要的是为其公民的福利提供更好的环境的愿望，这里所说的福利指的是经济的增长（更大的市场，资源和技术的更大获取和动员）以及更有效地防备现存国际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

目前唯一接近这种模式的联盟是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1958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条约下形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条约使得各签署国承担起在12年到15年的时间里从较大程度上实现整合的义务，它包括消除一切关税壁垒，统一社会安全体系和工资津贴。“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相关的“欧洲原子能委员会”以及更为松散的组织“欧洲议会”确立了一种范型，它很好地表明了其它整合社会在寻求进一步扩大现代知识的利益的道路上将会遭遇的问题。

考虑到世界性整合的问题，应当承认到21世纪世界上大多数社会很可能仍尚未完成经济社会转变的主要任务，并且尚未进入社会整合阶段。与此同时，人对其环境的认识反映在科学及其技术应用中，它今天正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快的步伐朝前发展。思维的潜能仅仅受人们将知识适应于人类事务的情感能力的束缚。到21世纪或更近的未来，大可与核能发现相比的人的知识以及对其环境的控制的新发展将会出现。然而，当我们讨论意料之中的东西时应当牢记意料之外的东西也同样可能发生。

我们可以根据上述讨论对今日的世界进行思考，这个世界包括：拥有4亿4千5百万人口的已遇到社会整合问题的14个国家；拥有23亿人口的正处

于经济社会转变阶段的55个以上社会；拥有3亿6千5百万人口的现代化领袖正处于强固政治领导过程中的58个社会；以及大约50个规模和重要性不同的在外国的监护下遭遇着现代性挑战的国家，它们的发展前景或是在现代化的领袖努力下实现独立，或是以某种方式与更先进的国家分享主权。

这样一个世界充满了各种问题和危险，这些问题和危险会一直延续到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更远。我们只要想一想14个现已处于社会整合阶段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暴力，就可以想见在150多个仍在应付现代化早期阶段问题的国家前面会遇到什么。先进国家的理论家往往以为现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将会转好，正象他们自己的社会经过长期的现代化的阵痛后，似乎又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国内稳定。他们用自己的国家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从未遇到的标准来把握世界上其他地区。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世界上的其他人民应当或将会以比率先现代化的国家更高的艺术或更大的节制来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亚洲、拉美和非洲人民将会比欧洲人更熟练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相信他们将能从欧洲的经验中获取收益并从欧洲的失误中得到教训呢？美国和德国了解英国和法国经验的机会并未能使他们避免破坏性的内战，俄

国也未能从更先进的社会的经验中充分收益以阻止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最暴烈的国内骚乱。信奉基督教的人在相互对待时或在对待具有其他信仰的人时是最冷酷无情的。现时代最大的战争就发生于他们影响所及的势力范围内，但是具有其他信仰的人民在面对现代化提出的艰难的选择时是否会做得更人道一些还要拭目以待。说明世界在20世纪后半期比起20世纪前半期暴力将会减少的大任就落在了那些人的肩上，他们相信28亿人将会以相对舒缓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因为已有4亿4千5百万人比较起来或许只是暂时地驶入了社会整合的避风港。

现代性的功能具有普遍有效性，所有社会都有望实现政治强固、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心理调节，但每一个社会都有独特的使自己的体制适应于这些功能或采纳率先进入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出的体制等方面的问题。西欧和英语社会的体制从封建制中演变而来，封建制鼓励个人主义、地方积极性和冒险精神。这些社会还有广阔的资源可供利用。除非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它们的体制不可能被转移到并不具备这些传统和资源的社会。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其统治集团广泛吸收英国文化，而且今后几代人中将有5千万到1亿，最终还会有3亿到4亿带有五花八门的非英国地方传统的农民成为城市工人和

领薪职员，但即使在这两个国家，我们仍会看到其传统和资源的影响有多么大。

同样，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关切的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普遍特性，苏维埃体系仍建于特殊类型的传统和资源之上。苏维埃领导人从沙皇时代承继了世界上极少数国家所达到的中央集权政治控制的传统。他们也享有只要不用西欧和英语国家的标准去衡量便堪称充裕的农业财富，这使得他们可以不依赖外国援助，而只靠高昂的人的代价可为其急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纲领筹措资金。然而，亦步亦趋地追随苏联的现代化模式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则无一成功。各共产主义政府拥有某些重要的共同特征，如共产党独揽政治权力，直接靠所有制而不是间接靠立法控制生产资料，以及倾向于用暴烈方法铲除人的障碍这样一种发展动员方式。然而在实际政策上，如资本积累和积聚的方式、控制农业的手段、管理和劳动的组织、发展的缓急和侧重等，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彼此相去甚远。

各个社会可以相互学习很多东西，有许多例证表明，采纳更现代的国家体制可能比使本土体制适应于现代功能更容易。一种体制越是漠视价值和信仰而注重技术，就越是易于转变。然而适应过程本身包涵着各种类型的艰难选择以及对传统价值和利

益的挑战，而这在更先进的国家中一直是暴力发生的主要源泉。因此，我们可以想见那85个正面临现代性向传统背景挑战和政治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向现代化领袖手中转移的社会，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革命或其他形式的国内骚乱。即使在那50多个现在已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变阶段的社会中，照我们的预期也会在同样的范围内发生目前最先进的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饱受过的国内动荡。

现代化在从世界上少数较先进的人群向多数较落后的人群扩展的时候，不仅带来了实现高水平发展的机会，也带来了前者在抵达这种水平时所遭遇到的全部问题。由于较落后的社会今天以比较发达国家更慢的人均速率向前发展，因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阵痛的扩展还要进一步延宕。在许多较落后的国家，人口比生产增长更快。在20世纪上半叶，较先进与较落后的国家之间的鸿沟趋于扩大。有迹象表明，在50年代这种倾向在有关识字率、都市化等方面的发展指数有所改变，但这个问题在专家之间还有争议。只有当人口增长受到控制后，较落后的社会才可能登上人均收入增长的漫长征途，这才能使它们与更先进的国家步调一致。

从可以得到的证据来看，人类未来发展的范型可以从三个过程来说明，这三个过程彼此不同，但

相互关联，且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矛盾。第一个过程是世界上170多个独立和依附的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迄今为止我们可以预见这个过程将在高层次的社会整合阶段达到顶点。本项研究所主要关注地就是对这个过程的分析，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过程尚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现代知识的普遍化、国际贸易的增长、人的迁徙、资本的流动，以及建设现代化的社会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相互依赖，每一个社会在其展开现代化时都会变得更加依赖其他社会。而各个社会内部的现代化过程趋向于促进没有形式上的外来体制援助的国际整合。

第二个过程正在进行中，那就是某些相对已达到高度整合的地区的发展。这些已高度整合的地区可以成为国际整合的中介点。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和苏联组织起来的国家体系就是这种地区集团的可供选择的范例。英国领导下的联邦以及日本在亚洲都可能扮演着相同的角色。这些主要地区向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宗投资而且把不发达地区有才能的人吸引到它们的大学中来。由于个人热衷于受教育和游历，因此民族主义的纽带显得不大牢固，由这些中心地区培育出的整合类型首先并不是一种政治联邦而毋宁是一种资源和技艺的整合。

前面提出的这种范型是个别更先进的社会得以整合的方式。联合王国的各组成地区业已共存了100多年，它们并未以相同的步伐比肩而行；法国的90个行政区、美国的50个州、苏联的15个共和国以及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区和10个民族地区亦复如此。这些各不相同的组成地区和政体一直保留着自己某些地方特征，有时还保留了某种程度的主权，但这些国家的整合实际上是以大都市区域——即以几百万居民挤在一些大城市和市郊群落而形成的特大城市——为中心。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区域的腹地并不仅仅是或并非首先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而毋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它们倾向于把其他地区的资源和技术吸引到自己这儿来，它们并不需要邻近的发展集团，但可能形成一种棋盘方格范型，彼此以各种方式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伦敦、伯明翰、格拉斯格、巴黎、布鲁塞尔、莱茵河流域的城市、纽约、芝加哥、费城和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就发挥着这种影响。

第三个同时发生的过程是通过国际体制的力量促成整合，世界上各个社会创造了这种国际体制并作好了服从其抉择的准备。许多国际组织业已存在，执行着成员国委派于它的功能，并且不会在专

门化的领域危及它们已取得的实际成果——国家主权。联合国协调这些最重要的国际力量，并且它也成了在全世界的基础上协商影响国际安全的种种问题的主要工具。迄今为止，联合国所达到的国际一致意见极其有限，原因在于其成员国的传统文化和资源技术千差万别。重要的是，联合国在这种环境下已经做了它能做的事，而且它的高级官员至少能在有限的程度上驾驭他们的任务中内在的困难。

这三个同时发生的发展过程——国家的、地区的和国际的——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中都趋向于相互依存并且趋向于一种终极的社会整合。尽管每一个过程的最后结果都是相同的，但它们在许多重要方面却是矛盾的。尽管民族国家最终将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内整合以适应与其他社会发生密切的相互关系的要求，但只要它们首先关切的是现代化领导的强固以及经济社会的转变，就会抵抗地区上和国际上的压力。各个国家在自己的民族主权内从事彻底转变的能力差别很大。然而民族国家是保证这个过程中的许多本质特征的唯一的力量，就此而言，它们趋向于反对地区力量和国际力量的主动性。

在地区和国际的领导源泉之间同样存在着根本上的对抗。地区方面具有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遗产的优势，也有某种程度的整合优势，但这种整

合不可能是在一个囊括一切社会成员在内的组织中进行的。真正的世界性范围内的国际组织必定拥有各种各样的体制遗产和各种层次的发展水平，其共同政策的公分母可能很低。因此，以全世界成员国为基础的有组织活动首先限于通讯交往和商业贸易方面的功能。对较复杂的世界性重大问题的管理，诸如核试验的控制、外层空间的维护，实际上是少数能够参与这些活动的国家的责任。

在最后形成一种整合的世界社会中，谈及起主导性作用是国家的、地区的还是国际的过程为时还早。就我们得到的证据来看，我们期待着业已获得重要进展的地区主动性有可能成为国际整合的主要力量，但这要等到拥有世界上大多数居民的社会都达到这样一种发展水平，以致它们能象现在的先进社会那样有效地参与国际力量。实际上，更落后的国家能否赶上更先进的国家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国际力量最终只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地区集团的支持下起主导作用。我们得到的证据似乎也表明：国家、地区、国际领导力量之间的冲突以及各社会之间的摩擦将提出深刻的并且往往是前所未有的政策问题。以后几代人在处理这些政策问题时需要灵活精明的领导。决策将必须在这种环境下做出：失败很可能要付出核武器大规模毁灭的代价。

六

现代化及其政策

1 历史与政策

尽管从历史演进而来的传统无可否认会延续下去，但人并不是历史的俘虏，在许多重大阶段，个人领导和集团领导向来都是令人侧目的。领袖人物尽力吸收现代观念和体制并不是加速或拖延影响的问题，而毋宁是他们对变革发生的方式打上自己的深刻印记的问题。意识形态是个人思维的产物，现代化采纳的政策特征以及它们所运作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领导本身。领袖人物受到他们的出身、受到他们所能支配的技术和资源的限制，但在这些限制之中，他们的重大的差异则来自于他们所采

纳的特殊的政策。

在各社会内部应用的领导原则对各社会之间的领导也同样适用。一社会对另一社会的影响（或靠怀柔或靠强制）会受到那个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体制的坚决抵抗，然而，那个社会自身的领袖们的影响则会扩大追随者的队伍。带有现代特征的知识和功能既通过一个社会对另一社会的影响，也通过国内过程的独立发展而扩散，而且一个拥有富于想象力的领袖的朝气蓬勃地从事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能够以其本身的成功为榜样对其他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施加重要的影响并逐渐将其影响扩展到整个世界。我们在谈及现代化的过程时，必须要考虑到它的普遍特征、各种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根本差异，同时还要考虑到在社会之中和社会之间进行决策的领导的重大作用，传统体制正是以这种决策为基础去适应现代功能的。

我们完全有可能不用深信不疑的价值（它不同于那种从各个角度来寻求考察主题的客观性的做法）而用一种可能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均衡和前景（这只消考察一下可以得到的证据便可看出）来描述变革的过程。的确，一个人若脱离这种不偏不倚的立场就可能会歪曲前景，而且相应地会在说明用于查找证据、评价选择的各种原则上给读者加重负

担。

另外，在拟定政策时，人们关切的并不是一直发生着什么或可能发生什么，而是应当发生什么，以及在既定的理解现实的框架中应当做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就必须考虑这两个方面。顺理成章，这种观点坚持：我们应当把本质上属于现代化过程的体制变革与不属于现代化过程的体制变革区分开来；体制变革的问题归根结蒂必须从每一社会承继的传统方面来解析；在决定现代化的政策时必须高度重视缩减暴力和动荡造成的人的代价。

历史的分析作为未来的指南本质上是一种对可能与政策有关的各方面问题的确定。作为政策的指南，历史的观点有许多缺陷。对以往的趋势的规划可能并没有充分估计到继续不断的变化。预测可能是在极其狭隘的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可能的选择范围受到往往是无意识的本族中心主义眼界的限制。基于历史经验上的论断往往过于专门化以致使有效性无法保障，因为那些特殊的问题及其个性从来都无法预见。

与此同时，应当承认所有的观念和体制的框架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任何既定的境况中，几乎所有的因素都可以从早期历史而不是最近的情况得以说明。事情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当前的情

况，无论与以往的情况如何不同，都只能循序渐进地对人类累积起来的经验产生影响。如果我们中肯而非虚妄地理解这些累积起来的经验，就能够在有益的限度中预测各种发展。至少，对历史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弄清哪些是很可能不管什么政策都会发生的变革、哪些是可能只有以高昂的代价才能实现的变革，以及政策在可以接受的代价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的范围。

2 多样性的方面

人类在奔向仍然暗昧不明的现代性时贸然展开的竞赛激奋了许多领导者，他们尽力把适应的内在问题极度简单化并夸大了这个过程的可望的发展速率。这种错误观念造成了许多现代化政策的摧枯拉朽、荡涤一切的特征，它们恨不得在一代人中便扭转乾坤。

刻不容缓的现代化不会停留在可能性的领域。英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领导之后200年，还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在资源和技术上都比较富有的人民经过许多代的致力于经济发展之后，美国仍把它的公民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列为穷困者（当然，它是用了相当高的标准）。苏联自从1928年以

来所获得的实际成就是一个在18世纪就有工业成就记录的社会的产物，而且它在1890年代就享有世界上最高的工业增长速率。日本在扫盲、教育和技术方面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是从17世纪业已出现相当高的识字率、世俗的文学与哲学、相当规模的书籍出版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有了更先进的国家的榜样和援助，后来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可能会做得更好一些，然而，它们当中有许多在拥有的资源和技术方面还不及17、18世纪时先行进入现代化的社会。当今知识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能够填上这个鸿沟还无法确定。

各个社会可能达到的成就水平依据所讨论的特殊层面而有所不同。工业生产可以跳跃性地增长，技术人员的资源可以迅速增加，文盲可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大幅度削减。然而社会在其他层面的变革就慢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从农业转向工业长期以来步履维艰，平均每年只能增长百分之一左右。人们在从劳动的机械化中受益之前，生活水准往往是下降的。普通人的信仰、价值和行为方式对现代知识观念的适应步伐更慢，大众传播媒介在维护传统观念方面与传播现代观念同样有效。即使人们希望采用相对乐观的态度（用我们手头上的证据难以证明这种态度是合理的），也必须承认就连

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赶上今天更先进的国家的人均发展水平都需要好几十年，更不消说那些更不发达的国家了。

在考虑现代世界社会的最终前景时，必须承认，历史经验尚未对这种社会终将采取的形式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证据。世界上生活在达到了小康水平的社会中的人为数很少，而且将这少数人的经验用作判断时必须万分谨慎并要加以充分修正。现代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在先进国家上一代人普遍坚持这样的信念：迄今为止，由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发展出来的特殊体制，在预期的过程中将为所有其他社会所采纳，这种设想一直未被经验证明。

政策所关切的不是无法预见的未来，而是更直接的未来，是今天的问题的可以预见的扩展。就是在思考这种更直接的未来时，我们也不能断定将会发生什么特殊的问题，以及它们将会采取什么形式。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现代化所引出的问题不可避免。这些问题在各个社会将采取不同的形式。尤其对于更先进的国家来说，价值的相对性会使它们陷入艰难的选择。除非在一般意义上，任何一个社会的体制范型都不可能作为其它社会的样板。每一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找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在对从事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进行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了这个事实：各个社会在成就上的千差万别归因于它们传统的体制遗产而不是现代化领导的政策。当然，有不少引人注目的未能动员起实际存在的资源和技术的例证，如葡萄牙的萨拉查、印尼的苏加诺、古巴的卡斯特罗就是其中几例；也有靠着贫瘠的资源大获成功的例证，如瑞士、挪威、日本、芬兰、土耳其；但这些都是特例。我们尽可对前者表示遗憾，对后者加以称赞，但无论是褒是贬都应承认这个过程的内涵十分复杂，而且由于对它们的相对无知，我们还是应该谦卑一些为好。大多在现代条件下朝气蓬勃、繁荣昌盛的社会在其利用现代知识提供的机会之前就已享有相当程度的强健与富足。

起码，制订现代化的政策时应当认识到，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体制对于具有大量现代化经验的社会而言有着深远的重大意义。如果没有国王、贵族、平民之间关系的长期演变，我们很难想象英国的议会制。美国的宪法也深深植根于17、18世纪，当然有人坚持以为它业已落后于时代了。苏联政治体系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独裁制度的传统，而这能追溯到莫斯科公国的诸位大公们集中权力的努力。日本精英领导的范型来自于传统的职分等级制度内

部长期的相互关系。

今日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的社会都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体制，传统体制对这些社会最终采取什么形式的现代体制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的过程越晚，先行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所提供的模式对其体制的影响越大。但对于那些卷入了许多人的价值和忠诚的活动区域而言倒未必如此。那些新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往往是在更现代的国家受的教育，他们在外国模式的强烈影响下开始从政。然而，几十年之内，在国内受教育的领导者大量从农民中涌现，而且由于本土主义价值和心态的高涨使那种早期的趋向淡化了。即使在这些地区，外来模式仍影响深远而且在本土传统体制适应现代功能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许多宗教领袖必定难以接受其他信仰的正确性一样，许多决策者也难以承认现代化的各种纲领在其各自的环境下都是可行的。

判断各种社会应依据它们开展现代化的政策的实质，依据它们以合理的人的代价将现代知识的裨益用于解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成功，而不应依据它们所贴的标签。有些政治领袖自称为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某些方面相对而

官是成功的。其他一些贴着同样标签的人则过于相信他们正在造福于人类。有时军政府会在新国家夺取权力，它们这样做往往是因为武官们是可以找到的训练最好的官僚，人们应从他们的行为上判定其功过是非。在更先进的国家，完善行政系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就是将文官权限与武官权限领域区别开来，但在新国家却未必如此，因为在那里训练有素的文官实属凤毛麟角，而军队的首要作用不在军事方面而在行政方面。

在政治科学家的词典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相互有别的世界，但在比较现代化的领域中，它们在成就水平和发展速率上是接近的。俄国和日本在体制结构上，在上世纪的政治发展中有许多鲜明的反差，但在人均成就水平方面，它们却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今天它们在现代化社会等级序列上的排行相同。现时代的普遍特征在于知识共有并不断积累以及可能实现的功能性成就。但正如前面指出的，完成这些成就所运用的体制工具很可能因有关社会的历史经验的不同而多种多样。

无疑，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的功能性要求在全世界大都相同，记录并研究这些统一性是大有用处的。谈及个别问题时情况亦复如此。正是多样性扩展了令学者瞩目、使决策者共鸣的统一性。那些寻

求将民主制政府（或其他卷入全社会参与的体制）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识字率或都市化相互关连的人，往往忽视了体制得以存在下来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后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使外来模式适应于自己的需要、习惯和能力。决策者必须把目标和手段加以区别，所谓目标就是这些社会为了政策的稳固而寻求实现的功能性目标，所谓手段就是在可以接受的人的代价的限度里为保持政策的灵活性而采用的实现目标的体制手段。无疑，在价值领域里，目的与手段是相互依存的，但这种相互依存只有在各种不同体制的调整下才能维持。

3 不稳定的方面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所面临的境况普遍相同，尽管每一个社会对此的解决各具特色。政治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向现代化领袖手中转移的问题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往往伴随这个过程而出现的不稳定和暴力使得决策者碰到一些最困难的选择。先进国家都曾经历过极度不稳定的时期，然而，它们一旦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治安局面之后，便倾向于把其他地方的革命视为对和平的非正义性的骚扰。政治现

代化不一定与大规模的暴力相联。有许多鲜明的例证表明，社会可以不通过国内战争的总爆发而实现这种转变。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是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日本国内的发展与它和邻邦的关系比较起来还是相当稳定的。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各种形式的内战、解放和统一战争与国内暴力。不仅在政治发展的决定性阶段有大规模的革命和内战（英国、美国、法国、俄国、中国的情况就是其中的典型），而且在从传统向现代化领袖的根本性转变之前、之中和之后一直都会有无数小的战争、反叛和骚乱。即使在今天，许多政府仍然动荡不安以致它们宣称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消除各种类型的国内暴力。

充满社会的各种形式的衰落、停滞、倒退不象革命和内战那样引人瞩目，按照早先现代化社会的标准来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被公认为是“正常的”。无疑，纳粹德国时期的情况是最令人触目惊心的，那个自我炫耀经济和社会体制合理化的国家竟受着满脑袋反现代化观念的领袖的统治。在葡萄牙，政治领袖把国家倒退到与拉丁美洲更不发达的国家相同的经济和社会水平。其他国家则在有意义的活动阶段和挫败性的混乱阶段之间摇摆不定，

走走停停。这些各色各式的功能障碍归因于各种各样的情况。在德国，战败、经济萧条、判断失误联袂而至破坏了具有现代观念的领袖的权威。在葡萄牙以及其他国家，世人与各利益集团的狭隘眼界一直限制了政治权力发挥作用。在许多拉美国家，欧洲人占优势的精英集团则依靠限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其垄断的权力免受印地安人和混血人种的影响。通往现代性的航道上到处是沉舟漏船。

*　　*　　*

人们预期，在正常发展过程中，世界上许多地区不稳定状态还会在未来几十年中拖延下去。不管是传统势力和现代性力量之间的斗争还是相互对立的发展纲领之间的竞争，各种形式的暴力都将难以规避。某些社会将有可能从监护国或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那里获得技术指导，它们可能避免剧烈的动乱而完成从宗法制度向现代官僚科层国家的转变。但更有可能的是，在更发达的国家将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国内冲突，除此之外，在不久的将来，较不发达的国家每年将会发生10到15次革命。如果说这不大乐观的话，那么从得到的证据所确定的标准来看，这至少是“正常的”。在更先进的国家，决策者的任务不是阻止革命，因为那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而已。他们的任务是以既有助于成功地以较低的人的代价向前发展又有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方式引导这些革命。

在根据这种极其灰暗的前景来盘算自己面前的选择时，更先进更成功的国家的决策者必须认识到，他们影响其他国家变革的力量不是无限制的。应当承认，各种形式的不稳定时有发生，而且不稳定的形式有赖于这些国家中领袖人物与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如果动用训练有素的占领军倒很难影响它。制订政策所应关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如何把各种体制成功地强加给那些新国家，相反应该是建立合乎情理的功能标准，维持切实可行的鼓励与遏制的方式，以便用可以接受的人的代价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领导。遏制应有分寸，不应走到关系破裂，或走到另一极端，建立排他的卫星国式的关系。这两种政策都会削弱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前者太远离行动的场所，而后者过于牵进当事者的利益。

决策者在抉择是否参与或至少是容忍政治暴力方面面临着困境，这种困境提出了一个价值相对性的重大问题。的确，根据最先进的国家奉行的价值来判断所有社会是毫无道理的，但是它们的这些价值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产生危害呢？在这里我们

必须把相对价值和绝对价值作一区分。相对价值就是不同社会通过各个时代以及它们身处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演化出的传统观念和体制的范型。绝对价值则是更先进的国家所达到的功能性成就的水平。我们不能指望带有不同的传统并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能用与先进社会演化出的现代观念和体制相同的方式接受现代观念和体制。然而，更先进的社会的责任在于弄清在其影响所能渗及的范围内，更不发达的国家如何能在一定 环境 下 采纳尽可能人道的政策。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式能使人们预先确定哪种政策在任何特定境况下最有助于人的尊严，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什么能代替具体的判断。然而，有一点是能够可靠地预言的：如果先进国家不尽其最大的能力发挥自己的影响，非人道政策的倡导者就会掌握主动权，这些非人道的政策最终不仅会危及新的建设现代化的社会，而且也会威胁到先进社会。

4 国际行动的基础

现时代，政治才能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指引世界各国缓慢而必然地为世界性整合而奋斗。所以说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是因为各种调整都势必会遇到

世界各国彼此不同的体制和现代化政策，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遇到世界上大多数社会出现的国内深刻的不稳定。所以说这个过程是必然的，是因为知识的增长会创造出各种功能性的能力，而这些功能性的能力只有通过人类的世界性组织才能实现。

无疑，关切国际整合的决策者所面临的最明显的问题是从哪里起步。尽管只要人类延续下去，某种形式的政治整合终将会出现，但很清楚，那只是这个过程的最后产物而不是它的起点。在政治发展的现有阶段上，只有最先进的国家才能有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彼此之间的整合，欧洲在整合方面的努力的经验为遭遇这种冒险开辟了大有用处的磨难的门径。那些仍在对付现代化领袖的政治强固和经济、社会转变等问题的社会，由于其国内的关系，在处理它们即使是有限的整合所牵及的共同问题时也是极不可靠的。拥有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各社会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将会投入较大程度的政治整合。

联合国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基本问题讨论和实验的框架，但它本身并非代表着一种整合的努力。的确，它本身的宪章明确否定了它干涉其成员国国内事务的权力，除非在安理会判定危及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情况下。在世界发展的目前阶段，对联合国的

限制是完全合适的，如果赋予国际组织任何更大的权威，它的成员都不能接受。

世界贸易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扩大，或许与国内贸易扩大的步伐同样快，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尚未达到一种整合性世界经济体系所要求的程度。现存的国家经济体系弹性很大，足以维持国际关系生存与生长所必需的类型，而且建立于相互分离的国家体系之上的世界经济将无须求助于体制变革而进一步扩大提供丰富的资源。在经济领域如同在政治领域一样，只有很少一些相对先进的国家，尤其是规模适中或较小的先进国家才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对于持续增长必不可少的经济整合。

只要大多数国家尚无系统的需要或尚无能力投入与其他国家的整合关系，那么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强制将继续在国际层次上发挥分化而不是联合的作用。巩固世界性人类组织的需要并非来自各成员国的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需要，而是来自于其安全的需要。如果不是因为核武器的存在，世界人民则可能在其走向整合的道路上逃脱进一步的国际战争。不无讽刺的是，只有当世界人口的大多数都生活在仍处于现代化的早期阵痛阶段，并无意于任何较大程度的整合的社会中时，才会出现对某些世界组织的迫切需要，但是世界性毁灭的威

胁显然需要人民果敢地行动。

在更先进的国家，决策者为之奔走呼号的这种行动的领域涉及到：控制核武器、使可能成为冲突策源地的国家和战略地区中立化、当现代化的革命危及到颠覆大国现存的关系时，对之进行驾驭。

在控制核武器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第一步，是英国、苏联和美国在1963年达成的、由90多个国家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年苏美进一步就不在太空投放核武器达成协议，而且建立了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的热线联系，以图培育可能取得实质性成就的希望。然而，这些协议仅是刚迈出的小小一步，从根本上说，世界的命运仍有赖于美苏两国领导的自我克制。这并不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坚固、长远的基础。与国际安全密切相关的是控制人类在外层空间的活动，并将这些活动限于和平的目的。我们不能说，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步。

国家和战略地区的中立化在近代历史上也有先例，可以用作行动的指南。瑞士（自1815年）和比利时（1815—1914）在国际保证下的中立化就是这方面的最主要的范例。德国1914年对比利时中立的侵犯，并非强烈地告诉了人们这种协议的虚弱，而是这种违约的重要后果。近年来，奥地利1955年自我中立化，老挝1962年在13个国家保证下的中立化

（包括中国、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使得关于这两个国家的国际紧张局面得以缓和。这种方法在成为争端的战略性地区，诸如奥兰群岛（自1856年）、丹吉尔（1923—1957）和的里雅斯特（1947—1954）也是很有用场的。1959年，12个在南极圈拥有利益的国家同意这个地区的中立化和非军事化。

中立化，在那些本身缺乏实力但又因其地理和战略上的缘故而被认为是冲突策源地的国家和地区发挥着很好的作用。但若把这个原则扩展到更大更复杂的地区看来是困难的。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5年间关于欧洲各部分中立化的问题提出了将近200个计划，但没有一个能被普遍接受。在各种情况下，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总会得出这种结论：在现阶段，它们的安全很难用这种计划来保障。然而，这种计划建议值得不断地研究，因为政治力量变动不居，此一时似乎是不可能的调整，彼一时则是可行的。类似的建议、计划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许能成功地应用。以克什米尔、古巴、台湾和东南亚国家为中心的国际问题可能在某种中立化的形式下更易于解决。

控制现代化的革命是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它涉及到世界上权力的分配，核大国把此视为关乎自己

安危的本质因素。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国内所卷入的各种力量都可能与这个或那个大国有密切的联系。一方的一次胜利则被视为另一方的一次失败，一方的多次胜利则可能导致国际力量均势的重大转变，而这被看作影响到失败者的安危。以往，各国诉诸武力以防止这种失败；两次世界大战均起源于这种境况。近年来，埃及、匈牙利、古巴、刚果、老挝和塞浦路斯的革命导致了威胁到世界和平的危机，而朝鲜、越南战争则出现了不祥的均衡。

这些革命使更先进的国家中的决策者陷入困境。如果革命的方式较为温和，不会变成国际冲突的渊薮，那么他们应当任其自然发展。如果革命危及到其他国家的安全，且有可能酿成重大的国际争端，那么其他国家则应义不容辞地寻求对其进行制约。尽管现代化往往伴随着暴力，但广泛的暴力和国际冲突对于现代化来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核武器的时代，人们应在暴力未发生之前便限制它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在这方面依靠国际干预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在巴勒斯坦、刚果和塞浦路斯，国际干涉就是在未抑制强健的变革力量的情况下，控制了危险的形势。即使是国际干预在大动干戈的条件下进行的地方，如朝鲜，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加以干预，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暴力。多向的干预要比单

向的干预更可取，但单向干预比完全不干预要好，如果不干预就会扩大冲突的区域的话。决计干预一般应当发出简短的照会，然而只有付出行动后才能对革命形势作出可靠的判断。评价一种干预的抉择的最终标准是看其趋于扩大还是限制了冲突的区域。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事物的军事性干预总是担戴着很大风险，而且应当尽量地使单向干预国际化。

5 国际性认同的形成

在全球性规模上为保卫人类所能采取的直接而具体的步骤并非很多，这些步骤主要限于国际安全的领域，而且在现阶段所能够做的主要是为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创造一种国际性的认同。解决各种特殊的问题需要许多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但对这些问题之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成熟的理解作一精细地阐述倒可以更快地展开。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不能指望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产生戏剧性的变革，但如果他们想要在核子时代避免可能酿成大灾大难的冲突的形式，就必须在变动的世界中设法在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基础上实现认同。

尽管联合国有种种欠缺，但它对确立这种认同

作出了基本的贡献。尤其是通过联合国大会，产生了人类共同利益的感受，并阐明了世界性的行为标准。人权宣言和其他原则的声明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确立世界性价值和心态的权威，并使得其他旁门左道无望取代这种权威。联合国大会也成了大国和小国之间、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后来者之间的调节中介。因此有助于在各种差异之间的架桥铺路。这些差异可能已成为理解的很大障碍。尽管联合国大会的权威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借助于强制性的工具，但它却已在广泛承认普遍适用的价值和规范之需要的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现实。

国际性认同的开端也将建之于功能性的基础上，在这方面，特殊的需要和利益为国际眼光提供的根基往往比较为一般地关切世界政治更为深厚。基督教会的全球性活动减少了许多理解方面的障碍。制造业和商业的各种重要部门认识到有必要采取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在技术领域，一些较大工程的实施诸如改变气候、探索外部空间，都成了国际合作计划的基础。在许多现在正开展研究的学术领域，不断通过探索人之环境而寻求真理大有助益于在各种价值领域形成世界主义的标准。

在确立国际性认同的领导方面不仅包括颁布宣言、提出建议（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也包括动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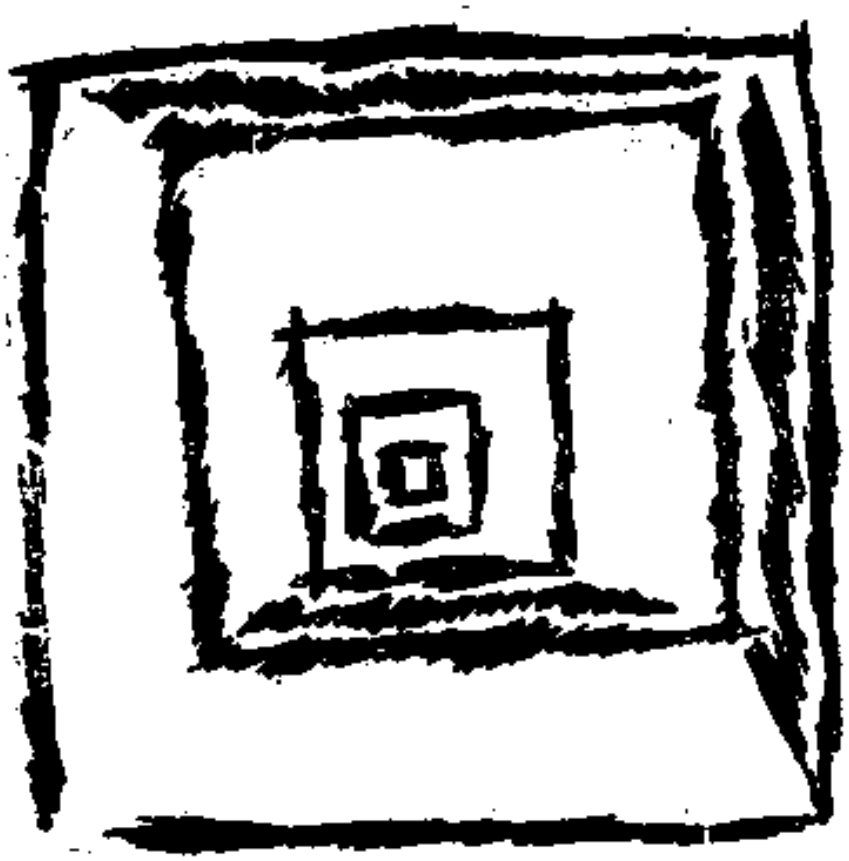
国内资源支持被认为对于人类的利益是本质性的措施。在国际事务上和在国家事务上一样，地方性的关切、旨趣和价值的成见是最持久和最根本的有待克服的障碍。在这方面，领导是最艰难的，因为它必须对作为其基础支持领导的权威的源泉本身提出挑战。地方性的价值与规范只能通过教育慢慢地变革，所谓教育包括通过教学、教科书和其他交流工具传递抽象观念，也包括用具体的形式实际地表明国际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的关系。

今后几年，领导者将会遇到一些全球性关切的问题，这包括使各种各样的传统体制适应现代功能、控制将伴随发展而来的连续不断的不稳定、建立国际行动的基础，以及形成一种国际性的认同等。构成这些主要关切的基础是人类经验中意想不到的变革范围，它威胁到一切公认的价值并破坏了有助于稳定的能被接受的行为范型与不断增长的知识所提供的要求和机会之间微妙的平衡。

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的基本的挑战就是对各地领袖人物的创造精神的挑战。他们必须要在至少能防范大规模毁灭的国际体系的框架中，寻找使普遍的绝对必要的观念和体制适应于各社会不同传统的渠道。如果最终会达到各种社会趋于同质化从而形成一个世界国家的阶段，作出必要的体制方面的各

种安排将是很容易的。实现这一点可能尚须许多代人的努力。人类面临着许多问题，它们将会极大地考验人类的创造精神。决定着现代世界采取什么形式的领导将走向那种社会或社会集团——它们在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时被证明是最成功的。

現代化之研究



1 形形色色的世界历史

尽管，我们生活的时代，技术已把前所未见的自然界整体带给了一个星球上的人类，人们乘上外层空间运载工具只需几个小时便能围着这颗星球绕上一周；而关切人及其发展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在处理人类整体的问题上总不是那么成功。这部分归因于这个研究任务太艰巨，部分归因于缺乏许多重要主题的充足的原始资料与辅助性研究，部分归因于研究者本身的素养和视野。历史学业已习惯了局部的、断代的和民族的视野，而史学工作者刚刚才开始用较宽泛的措辞来思考。想起来撰写一部现

代欧洲史而不是各个国家历史的汇编只不过是近一两代人的事，而且这种想法首先并不是欧洲人提出来的。

从其总体上界定人类历史应当不是什么比确定它应当是什么更容易，因为那里有许多人们应当回避的事例。的确，人类历史不应当被分割成合乎时宜的各个阶段，然后一个挨一个铺陈世界所有国家的历史。这种态度却是自18世纪以来源远流长的撰写世界历史的特征。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用的。它能把丰富多彩的人的经验描述得有声有色，但对于理解这种经验却帮助甚少。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之下，一些职业历史学家撰写了不少世界历史，如 Louis Halphen 和 Philippe Sagnac 编著的《人民与文明》（20卷，1926—46）；Walter Goetz 编著的《世界史》（10卷，1929—1933）；Vert Valentin 编著的较简明的《世界史：民族、人、观念》（2卷，1939），但他们都把自己的概括限制于个别的地理区域和特定的历史年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著者和编者出版了不少以学术性为主的世界历史，如Jacques Pirenne 著的《通史的大趋势》（7卷，1945—1956）；Maurice Crouzet 编的《文明通史》（7卷，1952

—1957)；Fritz Kern 和Fritz Valjavec 著的《世界史入门》(10 卷，1952—1961)；J·R·von Salis 著的《当代世界史》(3卷，1951—1960)；以G·N·Clark 为首的顾问委员会编的《新剑桥现代史》(12 卷，1957—)；Lucien Febvre 和 Fernand Brandel 编的《世界之命运》文集(13 卷，1957—)；Golo Mann 和 Alfred Heuss 编的《世界史入门》(10卷，1961)新改写本；J·H·Plumb 编的多卷本的《人类社会史》(1965—)。从这些著作来看，他们的任务仍不是概括人类整体，而仅仅是分门别类地处理人类的主要组成部分。最近出版的一些文集更关注的是问题而不是年代，但是这些问题是从很有限的范围中选出的。大多数教科书和单卷本的历史故事却在较通俗的层次上具有那些特征，尽管由于篇幅的限制往往使作者不得不作出一些相当勉强的、暧昧不明的概括。

那种具有广泛的感染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上述已提及的世界历史特征的选择态度，是把世界历史当作欧洲的延展。这对于教学目的——从已知的东西走向未知的东西；介绍欧洲之外的人民，将其引入欧洲人的视野——有某些价值。但是，一旦认定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精心作出的概括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同样行之有效，那么这种有用的教

学方式就会变成肆意曲解的渊薮。譬如这种态度就反映在 J·H·Robin son 著作的题目上«文明的磨难：我们今天的体制与观念向全世界扩散及其发展概述»（1926），尽管其中不乏博学与明智之见。这种态度普遍的表现是将反映欧洲本身事变的断代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历史分成古代、中世纪、早期现代、现代几个时期对于说明欧洲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印度或中国亦复如此吗？

讨论人类整体问题的最引人注目的方法之一是根据一种观念或一种有先定期待目标的概念框架构想它们。这种目标通常是作者按照对自己社会遭遇的问题解决设想出来的，并且他靠着想象力的跳跃，试图重整世界历史的各种力量以支持他设想的特殊的解决方式。这种世界历史的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找到了最清晰的原始表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了最大众化的促动因素。尽管这种态度不是经验的，但它至少有从问题和发展的角度看待历史的优点，并且激起了对涉及人类整体问题的激烈争论。然而，这种刺激并未在编史工作上结出硕果。只有两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世界历史著作直接受到它们的激励：N·A·Rozhkovs'«从比较历史的观点看俄国历史：社会动力的基本法则»（12卷，1919—1926）；E·M·Zhukov 为苏联科学院

编的《通史》（10卷，1956—1965）。前者根据俄国于1917年宣称先行达到“社会主义”阶段，寻求将各个大陆和各个时期的社会都纳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几大阶段。后者在史料组织上仍是较为传统的，但它通过充斥各卷的一般解释性段落和对各个社会的解释表达了这种观念：所有人类将沿着苏联开辟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大量产生出来的但对理解很少助益的争论，都致力于根据各种文明的比较研究找出历史的范型。这种思考线索可以追溯到Heinrich Rückert的《世界史教程——一种有机的描述》（2卷，1857），他断定存在着若干分立文化并期待着最终出现一种世界性的欧洲文化。俄国生物学家Nikolai Ia Danilevsky 在他的《俄国与欧洲》（1864）中展开了一种类似的方案，但他构想未来的依据不是世界性的欧洲文化，而是占优势的斯拉夫的“文化—历史类型”。这种历史态度后来在Cswalol Spengler 的《西方的没落》(12卷，1918-22)和Arnold J.Tognbee的《历史研究》(12卷，1934—1961)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尽管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 Spengler 读过 Danilevsky 的著作，或 Danilersky了解 Rückert的著作。

从Rückert到 Tognbee 的影响链未被确立，但

这些研究的思考线索明显相同。他们不仅受着直接关切自己社会生存的激励(它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让这种关切支配他们的思索以致让历史用于说明而不是用于激励。Rückert关切的是普遍观念的实现，对他来说普遍观念就体现在欧洲——基督教文化世界之中；Danilevsky关切的是他设想为俄国和欧洲之间不断增长的对立；Spengler关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现的传统欧洲的衰落；而Tognbee关切的则是他年轻时看到的两次世界大战对社会的惊心动魄的影响。人们有这种印象：他们在开始讨论前就已经知道了答案，并且让自己在理解历史中受这些答案的左右。他们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实验室，对重新审议传统上强调民族历史做法，对承认人是历史研究的正确的主题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但由于他们无视经验论和逻辑学，因而惹出许多不结果实的争辩。

其他的世界历史是由倡导先定目标唤起的，尽管文本的主要部分在结构上可能是因循惯例，并且叙述的逻辑只是间接与结论相关。H·G·Wells的《历史纲要》（1920）可能是读者最多的单卷本的人类史，它尽管固执己见，但论述充分，它最后呼唤一种世界政府。Hendriek Loon的通俗的《人类的故事》（1922），以同样的精神把现代仅仅看

作人类为新的更好的世界永无止境奋斗的早期阶段。其他各种较通俗的世界历史，大多都设有一种高不可攀的目标。他们一般寻求鉴别而不是确证各个民族、种族或宗教集团、或文化在更大的事物系统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大多是由中、西欧，美国和俄国居民撰写的。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作家从14世纪的伊本·赫勒敦到20世纪的尼赫鲁也做过令人感兴趣的贡献，但他们为数太少而且间隔太长。

所有这些态度都反映着对世界历史的关切，但他们一般都没有考虑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经验。一旦他们考虑到了，结论便会更多地基于希望和良好的意愿而不是基于对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深思熟虑的评断。他们尤为关切的是以各种型式结合起来的民族、文明、文化。世界历史所关心的不应当是文化的积累或民族史、文明史，而应当是人类经验的总结。世界历史不应当是关于地区的历史，而在地区史那里，欧洲史就是关于各个欧洲国家的历史，民族史就是关于他们各种更低的组成部分的历史。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去写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或欧洲的民族主义。对于人类整体我们也能做出如此视野的概括吗？

2 关切人类

将人类作为一个总体的来理解的愿望尚未得出众所接受的结论，但多少代以来它业已成为史学之外许多研究领域的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是检验那些首先基于欧洲经验的公认的概括；研讨欧洲和其他文化、社会的相互影响；克服有关学科的民族偏狭和学术偏狭；促成关切人之行为的所有学科综合起来。1965年10月，教皇保罗六世在世界基督教大会闭幕时发表的声明"现代世界的教会"，就是我们时代的关心人类的特征的一种表现。

在学术上，这方面的先驱是人类学家，他们对原始生活的兴趣把他们引向直接与世界上其他部分的人类相接触。人类学是第一个把人类作为整体考虑并且关切人类事物中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的社会科学。推广人类学关于文化和文化适应的概念已表明对其他学科的学者是一种激励，随着人类学研究的特有的活跃，人的经验总体出现了。尽管大多人类学研究所关切的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地区性的，但它的广阔的视野很好地反映在许多把人类整体作为主题的概括性著作中。人类学近些年来也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宗教学和语言学以世界范围为根

据对统一性和差异性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些领域的早期研究偏重于历史的差异性而不是关于人类整体的概括，但它导致了许多基础研究的积累，它一直被现在那些对外来信仰和文化持同情态度的学者所运用。欧洲人统治亚洲、美洲和非洲人民的经验也唤起了比较不同文化的兴趣，这对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尽管一开始大多数欧洲人是把他们当作影响的客体而不是研究的主体，但是，经验最终表明要想充分领悟适应和文化移人的过程，就必须按他们自己的语词来理解他们的文化。对亚洲、拉美和非洲人民的语言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研究业已成为较为发达的社会主要关切的问题。高等教育，甚至某种程度上的中等教育，就受着这种关切的影响；无数众多的研究组织已确定研究这些人民的传统体制以及他们在适应现代境况中所面临的问题。

这种研究对于作出关于人类的系统概括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从那些尤为注重对这个主题进行多学科研究的期刊领略一下这种研究的视野：巴黎，现代非洲与亚洲行政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出版的《非洲与亚洲》（1948—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世界政治》（1948—　）；哈佛大学出版的《创业史探索》第一辑(1949—1958)，

艾尔哈姆学院出版的第二辑(1963—)；布鲁塞尔，国际各种文明研究所出版的《文明》(1951—)；芝加哥大学出版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1952—)；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亚洲人民》(1959—)；巴黎，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出版的《第三世界》(1960—)；伦敦出版的《发展研究杂志》(1964—)。这些方面的许多研究是由联合国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委员会和专门机构承担的。

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原则上也包涵着人的总体经验，尽管它们实际上只是近几年才把眼界延伸到欧洲和英语世界以外。在它们在对发达国家之外的体制进行的比较中，比较性地论述其他社会体制、人格类型、经济系统和政府为数甚少，而在它们寻求探讨作为这些体制基础的一般性的行为过程中，这种比较性的论述更是罕见。然而，对这种基础性过程的兴趣目前已在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并且许多基于欧洲和英语国家经验的假说正在根据这种研究得以修正。的确，更成熟的社会科学家总是使他们的兴趣超越一门学科或一个地区。Max Weber，是当代社会科学奠基之父，是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对价值与行为之关系的兴趣把他从社会学引向政治

学、经济学、宗教学和心理学，并且从欧洲经验引向印度、中国、希伯莱、俄国和美国。这种环抱世界去追寻特殊论题的作法不再是绝无仅有的，这表现在Weber作为主编之一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库》（1888—1933）中发表的许多论文。现在，学者在受训练之中或之后往往便被鼓励着进行多学科的跨地区的思考。

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变革的研究也做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十分成熟的贡献，虽然它们尚未得到历史学家充分的检验。例如Vilfredo Pareto 的社会变革概念是一种在实际的短期目标和理想的长期目标之间的循环选择，它用文献是难以证明的。另一方面A·L·Kroeber和 P·A·Sorokin 则不断致力于用文献证明他们自己关于文化之进化表现为审美表达之循环的解释。值得称道的是，Kroeber在他篇幅很长的研究《文化增长的结构》（1944）中，坦率地总结说他对普遍范型的寻找未能成功。然而，Sorokin没有放弃他的信仰。R·Coulborn 尤其受到Kroeber和Sorokin的激励，提出所有文明社会都能被看作经历着信仰、理性和完善的循环过程，这种循环最后终结于政治衰落和分解。R·E·Furner是一位深受人类学影响的历史学家。他所采取的态度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他提出了一种技术决

定论，即把社会的循环发展归因于技术发明的周期性停滞，并且认为这种循环发展将以对科学方法的世界性接受而告终。

有一点似乎很清楚，社会或文明面对有关主要问题发展出一种趋于渗入各种表达方式（包括意识形态、风格、宗教或价值系统）的理解水平。然而，这种理解水平不断受到新的经验、外来威胁和知识增长的挑战。我们可以把社会或文明看作驾驭冲突的系统，它们必须对付从稳定力和适应力之间的无尽斗争中产生的紧张。这种斗争从实质上说是发生在知识界和政治界领袖之中的斗争，这些领袖均持不同观点，他们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寻求维持众所公认的行为方式和势在难免的创造发明之间的某种平衡。这种管理冲突的企图每每不见成功。不言而喻，各种文明和社会除却那些目前还生存着的之外都已不复存在了。这种经验构成了许多循环论的基础，循环论业已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论题之一，这就不难理解为社会和文明卖力地挖坟掘墓的历史学家们何以忽然想起把人的生命循环当作一种主要类比。这些循环论作为一种一般的整理原则是完全可信的，这是因为各种主要人类组织形式显然都经历过成功与失败的交替，但若用主观抽象的词语来表达它们，纵然是循环论

本身也难以说明它们意味着什么，历史材料如何才能纳入它们的框架。因此，这些理论并没有实际的解释价值。

Talcod Parsons从这个主题发展出更精确的方法；它的研究颇得益于其前辈的实验，得益于一代经验社会学家和理论社会学家丰富多彩的探索和批评。我冒着可能将其过分简单化的危险斗胆地将他的行为理论描述为：一种交替侧重强调人在适应、目标获取、范型维持和整合各方面行为，从而探索社会变革的理论。这种理论对于已习惯了稳态与变革、改革与反动二分法的历史学家而言太抽象了。然而，它是第一次寻求全面说明人格、文化、社会、社会机体以及影响人的心态的各种变化范型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学家司空见惯而又大惑不解无限复杂的实在。理论史学往往蒙受的是过分简单而不是过分复杂之苦，因此，任何被认为是复杂性的理论都能得到同情和理解。

人类学方法和近年来的社会学方法的那种研究社会结构和变革特征复杂性的总体态度刺激了多学科综合研究问题的兴趣。从一种范型的诸多有关事实出发去创作（无论是叙述性还是分析性的，不管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永远是历史编写的核心问

题。无论如何，由于历史学和有关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大幅度增长且越来越成熟，这个问题已变得极为复杂。职业史学家的兴趣从原先的政治体制扩展到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变得抵触政治史。对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觉悟是对19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激励的政治史学家的尖锐批评所唤起的，这两种态度的对立和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与此同时，自从世纪之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促进各种史学分枝以及历史学和有关学科综合的尝试。

1900年由 Henri Berr 在巴黎建立的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在这方面做出了最系统的尝试。它出版的刊物有《综合历史杂志》（1900—1930），之后又有《综合杂志》（1931— ）；它每周都召集各个学科的学者进行讨论，力图以此澄清诸如文明、社会、个性和统计之类的概念；而且它不断组织编写卷帙浩繁的通史《人的进化》，原计划出版100卷，现在已出版了60多卷，这些活动都以博大精深的方式，集中注意多学科综合的问题。

随着综合的兴趣的发展，它不但包容了自然科学也涵盖了行为科学。20世纪知识的增长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培育着这种兴趣，探索更一般的综合之可能性的刊物不仅有《综合杂志》，还出现了荷兰的《综合》(1936—)，德国的《综合研究》(1947—)，

美国的《一般系统》（1956—　），英国的《密涅瓦》(1962—　)和《分类学》(1963—　)等。这种关切也反映在《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1938—　)的筹划上。1952年以来在芝加哥人的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下，各个领域都召开了一些研讨会，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出版了一些书刊。

在那些致力于从其全部复杂性上理解他们的环境的学者当中，生物学家们发现自己处于影响全局的地位，因为他们迅速变化着学科不仅卷入了人与自然而且具有一种回到地质年代之初去的独特的历史兴趣。俄国著名生物学家V·J·Varnadsky 热衷于寻求人、动物和植物生命中共同因素以便对生物进行概括；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则超出了这种努力而系统阐述从地球于气体中形成一直到未来人和自然发展的进化概念。Teilhard 在沉思中发现用“心智层”这个术语来描述现代知识的普遍性是很有用处的，它是思维基质的全球氛围，这种思维基质在发展中脱离了人的生物存在而获得了自己的有机生命，它是一种世界脑的形式。

这种宇宙观层次的概括很难说与在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这种概括唤起他们将眼界超出自己著书立说所依据的原始材料而去领略那最终属于他们理解之任务的知识视野。待到

有可能对人和自然的共同经验作出有益的概括之时，我们创作世界历史便开始不仅是说明地方、民族、地域、大洲或文明的经验，而且也阐明了全人类的共同经验。有不少理论家持这种世界历史观，从16世纪的Tean Bodin到20世纪的N·I·Kareev，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一些有影响的实践家。其中最著名当推瑞士学者 Edward Fueter，他在《世界史——过去的一百年》（1921）中力求从一种总体的观点写作历史并将所谓“世界的欧化”作为他的主要论题。这项任务的种种困难都反映在近来一些世界历史著作概括人类全体的试验性的努力之中。Alexander Randa编著的《世界史手册》（4卷，1962年第三版）作了令人感兴趣的尝试，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对日常事件和材料的概述，并以简明的《人类的总体形态》作为总结。这些由著名学者所作的简明论题的综合为大规模地从事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榜样。《当代世界史》（2卷，1962—1963）采取了另一种态度，这本书是由已故的Fritz Valjavec拟定，由Felixvon Schroeder完成，其中第一卷专门谈国家历史，第二卷则讨论世界性的发展及其动力。这种尝试的欠缺在于各位作者分别撰写某个主题的各个章节，缺乏首尾相贯的组织，而且开篇论述现代世界的基本原则

和根本力量的章节只是一种引言而不是综合。

William H·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社区史》（1963），在更全面更成熟的层次上，从各个发明中心、各种文明在其鼎盛时期发挥主导性影响的角度提供了组织和解释的方案。这种对待各种文明的态度与其说是比较性的不如说是扩散论的，它根据三个时期来组织划分文明：中东优势（公元前500年）、欧亚文化均势（公元前500—公元1500）和西方优势（1500年以后）。这本书的题目提示是与Spengler的再次较量并表明对他认为处于衰落时期的现代工业社会充满信心。McNeill的解释依据的不是类似于文明史学家的那种循环而是都市中心的竞争和被证明是最能解决自己时代特殊问题的文明优势。这种独树一帜态度一开始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前景。

《人类史》（6卷，1930— ）一书与上书的观念有些类似，但更严格地集中于改革过程。这本书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为“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委员会”准备的。主持者力图改进以前的人类史著作，他们不仅舍弃了政治、经济、军事层面，强调文化、科学层面，而且邀请了众多民族的学者专家参加，并将文本的评注草案提交给许多国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员会。如果我们从

头两卷来评价的话，这项成果显得缺乏高屋建瓴的解释，而且受到不少批评家的左右：要完成如此具有权威性的课题的确需要协作，但是批评家和专家的人数和权威应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并且要尽可能地遵守一种思想准则。或许这部书的以后各卷会从前面的几卷吸取经验教训。与此同时，这项研究中的不少观念和材料也能从《世界历史杂志》(1953—　)中看到，这也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出版的一本独出心裁的国际性、冒险性的杂志。

支撑历史学家们对于现时代人类整体经验的新兴趣的是能赢得掌握许许多多形形色色资料的问题，这些资料便构成历史研究的基础。通史若没有专门史作为基础便无法撰写，那些对于系统概括人类整体有用的东西必定具有世界性的远景。迄今为止，沿着这条思路所获得的大多数成果来自于对一个或几个历史时期中许多社会所共有的特殊问题或体制的研究。个别学者偶尔也能充分运用原著或第二手著作对诸如战争、帝国主义、革命、河谷文明、专制主义、社会阶层和都市文明之类的主题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Roberr R·Palmer 的《民主革命的时代》(2卷，1959—1964)就是这种研究的杰出典型。

这种比较往往需要代表着各个专门领域的学者

通力合作。譬如，对于水利文明，封建制度、政治现代化等富有价值的研究向来都是合作的结果。布鲁塞尔“让·布丹比较体制历史协会”自1936年以来出版的一系列重要的合作而成的多卷丛书，涉及封建义务和豁免、农奴制、土地使用权、房地产、市场、城镇、外国人、妇女与和平等，它就属于这类最富想象力的著作之列。其他形式学科间的和比较的历史受到下列学术杂志的激励：Lucien Febrre和Marc Bloch 1929年在巴黎创办的《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慕尼黑出版的《世纪》（1950—　）；牛津大学科普斯·克里斯蒂学院出版的《过去与现在》（1952—　）；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国际社会历史评论》（1956—　）；苏联科学院在莫斯科出版的《世界文化史杂志》（1957—　）和《现代与当代历史》（1958）；密执安大学出版的《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1958—　）；和伦敦威纳图书馆出版的《比较历史杂志》（1966—　）。

3 现代化的概念

当代关于现代化的论述汲取了上述丰富多彩的研究和思想遗产，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功业未竟，仍在确定它的主题，并且仍在现代性的普遍特征与各种

社会和文化的独特体制之间作基本的区分。这种较新的探索方式旨在多学科地研究人类，以期从其全部复杂性上描述并说明那些现在已被公认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变革过程。这项研究受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得独立的国家的经验的很大激励。对于亚非拉人民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直到许多人民突然出现在独立的国家中，才有了关于他们的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概念，这些概念首先是由率先进入现代化的社会曾受到的挑战的经验为根据的。

S·N·Eisenstadt的《现代化：增长与差异》是有关现代化研究的入门津梁。它先是作为印地安那大学政府系的一本小册子于1963年出版的，后来又发表在《印度季刊》第20卷（1964年1—3月号第17—42页）。这是一篇有关文献提要的考察，也是一篇有关这一研究领域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其本质的论说。它强调必须既注重发展的量的指标又要关注随这种过程而来的体制的变革，但是他也提请人们注意，体制范型呈现出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是此领域的研究者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的社会的经验考虑量的增长和体制变革之间直接关系的最早的冲动，也有一些人仍在寻求将识字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其类似的指标与代议制政府和公民自由联系起来。Bisenstadt俯瞰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出结论：

不同社会由于其寻求将连续变化的能力体制化的方式不同而大异其趣。

现代化研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从下面一系列问题起步：传统社会的体制结构；领导集团的性质和承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与其不同的现代化顺序之间的关系；一切建设现代化社会所遭遇的关键性问题；以及往往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断裂和停滞等等。Eisenstadr也强调作为区分普遍与特殊的方法比较研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的重要性。Eisenstadr本人也写了一些论文讨论这一领域的许多关键问题，其中一些论文已以《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层面论集》（1961）、《比较体制论集》(1965)为题结集出版。他还撰写了《帝国政治系统》(1963)一书，这是一本有关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研究，下面我们还会一再提及。

想对这个问题作一般了解的读者一定会对《现代化：增长的动力》（1966）一书提出的观点感兴趣，这本书由Myron Weiner主编，由25位美国学者执笔。这些篇幅不大的论文最早是为美国之音主持向全世界播送的系列广播节目准备的，它们代表着对那些正在寻求答案的主要问题全面而权威性的陈述。

Marion J·Levy著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国

际事务的背景》（2卷，1966）提出了现代化研究的最系统的理论探讨。他将现代化界定为“利用非生命动力资源，运用各种工具增大奋斗的效力”，他用这种宽泛的定义的框架最早开始关注相对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之间的差异。这种基本的差异是本书三个主体章节的主要参照点，这三章分别涉及了：①社会系统各层面（角色界定，团结、经济分配，整合与表达方式）；②社会的组织关系（氏族与家族组织，政府与社团，经济组织，军事组织，以及宗教、教育和娱乐方面的组织）；③共同要素、各种变项、问题焦点。他在这里将各社会的普遍要素和特殊要素作了区分，并讨论了现代化对稳定性影响的核心问题。

读过Levy早期著作《社会结构》（1952）的读者会发现，他最近研究所使用的逻辑框架和术语在那里业已出现。他过去的与现在的研究之最大的不同在于，现在研究的结构是靠着不断对相对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的社会作出区分而运作的。尽管前面一段的描述仅仅是对其内容目录式的概括，但它起码转达了Levy分析的视野指向。他煞费苦心地说明他首先关切的不是经验论证，而是要提出有关事实的假说。他首先从美国、中国和日本提出了许多例证，但他主要强调的是对他用于分析各社会的诸

多结构和功能范畴中统一性和差异性作逻辑说明。

Levy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对有组织的社会中反映出来的人的行为持总体态度，这提高了理解他所表达的现代化现象的灵活性。它所呈现的社会学理论的性质对于许多习惯于较简单的叙述和分析方式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显得太抽象了，但是它的逻辑力量能使细心的读者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感受到各种结构的范围和变化。它们作为从理论上寻根溯源的说明也许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现代化作为一种普遍的解决办法对于传统社会具有颠覆性，现代化对于发展中的社会具有深刻的动荡性的影响。

David E·Apter将他的《现代化的政治》(1965)一书题献给Levy，他使用了Levy的一些分析性范畴，但在范围和目标上作了更多的限定。Apter对现代化的研究依据的不是从传统到现代性的整个转变过程，而是从传统主义到工业化的特定转变阶段。Apter更关切的是过程而不是相对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之间的差异，他集中注意的是建设现代化的各个社会中反映出来的促进变革的因素，如意识形态、动机、流动性。他从一些非常简单的范畴出发提出自己的分析，如完美价值和工具价值；等级式、金字塔式和部门式政权类型；传统派、调和派和

改革派角色类型；世俗自由主义和宗教集体主义政策模式等。但是他广泛地吸收了美国最近的研究成果，并表达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选择的鲜明印象。

I·Pobert Sinai 在他的《现代性的挑战：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1964)一书中也关切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中促进变革的因素，而且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果敢的领导对于动员社会的资源的需要上。他对于新国家明显缺乏强健有力而又能自我约束的领导感慨不已，他用富有戏剧性的语言将他们宣昭于天下的目标与无法令人感奋的成就作一对照。他的研究开始注意到现代化所发生的传统文化背景，并提出了那些在其文化遗产中见不到有目的的组织的社会能否指望发展出将其体制适应于现代功能的能力的问题。Sinai在其即将完成的一项研究中将参照5个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中国、日本、墨西哥、俄国和土耳其——更详尽地追踪这个论题，它们都表现出指导社会变革的非凡的能力。

要研究不同社会寻求其体制适应于现代化所体现的功能革命的不同方式，自然而然要特别强调政治发展。Edwand Shils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最初在《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二期(1959—1960)上发表的“新的国家政治发展”中，明确强调传统体

系相互有别，因而变革有可能采取不同的政治形式。他看到政治发展所选择的形式不仅有政治的民主，也有监护的民主，现代化的寡头政治、极权式的寡头政治和传统的寡头政治。他把这些视为通向民主的形形色色的道路而不是目的本身。他同意Sinai的关键的变项是从事现代化建设的精英集团的性质的观点并认为新国家将会找到胜任的领导。

在政治科学家中具有同等影响的是G·A·Almond的研究，他和J·S·Coleman主编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Almond在本书的引论中尤为强调作为一种理解方式结构—功能分析，以期用这种理解方式动员起各种政治系统完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所要求的任务。这种态度对政治科学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们以往坚持认为当代西方体制本质上是“现代的”，而且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但是在分别专述有关国家的章节中，他并未系统地运用自己的模式。Almond及其同事在纽约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协会的赞助下，计划写一套非常重要的“政治发展研究”系统丛书。这套丛书论及官僚科层、教育、交往和政治文化的各卷由这些领域最有才气的学子合作完成。这套丛书也包括下面要讨论的日本和土耳其的比较研究。有关论述政党和政治发展危机的各卷正在准备之中。

Fred·W·Riggs在他的《发展中国家的行政管理：棱镜社会理论》（1964）中力求将转变社会中体制变革的问题概念化。Riggs用“棱镜”一词旨在描述“熔凝”的传统农耕社会向“扩散”的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中间阶段，他透过这种转变的“棱镜”来考察这些社会的问题。就他在研究菲律宾情况的基础上关注行政管理方面的功能专门化提高的问题而言，Riggs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然而，他并未通过“棱镜”去旁征博引17、18和19世纪欧洲社会的情况。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倾向一种极其狭隘的决定论。W·W·Rostow在他的《经济增长阶段论》（1960）中，没有对传统体制表现出的差异作出严谨的说明。他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自由经济的决定论者，他认为到达了“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各社会之间的差异就会趋于消解，这会把它们引向先行现代化的社会所体现的模式。他的想法引起了富有成果的争论，他的观点被拿到国际会议上讨论，然后他又将讨论的论文汇编成《向持续增长起飞的经济学》（1963）一书，其中提出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问题。A·F·K·Organski在他的《政治发展阶段》（1965）中提出了原始联合、工业化、国家福利、丰衣足食的阶段划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决定论的

经济阶段划分。

Dankwart A·Rustow即将发表的研究成果《各民族的世界：现代政治的动力》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著作，他关注的是在民主——极权连续体中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将变革体制化的各种途径。同样Kadvon Vorys编著的论集《新国家：政治发展的问题》（它是作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年鉴》第358卷出版的）也研究了发展的问题、领导的范型和有关国家的政策。Lucian W·Pye是这个主题的最重要的研究者，他的论文被汇编成《政治发展的各个层面》（1966）一书。

从人的行为的角度考察现代化问题方面也出现了令人感兴趣的研究。K·W·Deutsh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交往与控制的模式》（1963）用控制论作为一种理解方式来说明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政府如何实现对于保持一种有活力的稳定性是必不可少的"张力控制"。同样E·E·Hagan在他的《评社会变革论：经济增长如何开始》（1962）中首先集中注意心态的变革，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在传统的社会中领袖人物把握经济机会潜能的能力是以这种心态变革为基础的。尤为令人感奋的是L·W·Pye的《政治，人格和国家建设：缅甸对认同的寻求》(1964)，它详尽生动地描述了领袖人物在离开相对稳定的

传统生活方式之后发生的认同问题，以及他们一旦与其追随者取得了有机联系之后寻求创造新的认同方式。

首先局限在美国出版的书来讨论现代化的主要概念，似乎显得太狭隘了，但事实即是如此，现代化研究的早期阶段大多总结性的工作都是出于美国学者之手。这些学者用各国语言对世界各地的情况作了大量研究，这种研究是有力度的，它反映了新世界看待旧世界的新观点。与此同时，这种研究也有其某些弱点：描述的事件与行为的发生背景相距甚远；过分抽象，偏重于整理的概念和方法而忽视了物质实在；甚至有时物质实在完全被消融，以致变得无影无踪。

从各种相关学科探索这些概括所依据的较为特殊的论题，使得人们很快使用多种语言从事学术研究。近几代人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探讨都在这种或那种方式上关及现代化的研究，如果人们想尽可能全面地界定这个主题，并且考虑到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仍在积累中，那就需要倾尽一个大图书馆的资料。这种学术趋势的走向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国际文献目录年鉴上寻见。这里仅仅考察了有关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之比较的较为特殊的

研究。

4 比较的问题

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其核心问题在于从历史上演进而来的各个社会的体制与由近几百年来知识的迅速增长产生的普遍有效的价值与行为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涵盖了各家现代化研究者的许多争论焦点，它特别受比较方法研究的影响。

定量化是争论焦点之一。近几年来，令人满意的比较统计学已被普遍地应用。此领域的开辟性研究当推耶鲁大学的Bruce M·Russett 和其他人为编制政治资料程序而编著的《政治与社会指标世界手册》。这本手册实际上收集了对大多数国家都有效的可资测量其特性的所有重要数据并为着比较的目的将其按照总值和人均值表加以编排。它也将这些政治与社会指标与一些范型相关联起来并且以9个指标为基础按5个发展阶段提出一些国家的分级系列。对14个国家的最高阶段的比较曾在上述第三章中用作界定那些被认为处于整合时期的社会。这些编著者很明智，他们对于自己的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不敢妄自尊大，尽管他们还没有走到Oskar Morgenstern的地步，后者在他的《论经济统计的

准确性》（1963年第二版）中怀疑这些统计数值的有效性。

这部《世界手册》在涉及范围上不象W·S和E·S·Woytinsky汇编的《世界人口与生产》（1953）和《世界商务和政府》（1955）那样雄心勃勃，但在提出的材料上却显得更为精明老练。其他一些汇编比较统计数学的尝试，包括联合国发表的基本系列丛书都可以参阅《世界手册》的注释。

Arthur S.Bank和Robert Textor撰写的《跨政体概观》（1963）对于比较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量的尝试有着特殊的兴趣，它按照57个政治和社会变量对115个社会进行评定。然后用计算机的方法把各个国家的这些变量都分作两类并相互参照。例如，这样就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各个国家在农业人口比例上的高（66%以上）、中（34—66%）、中低（16—33%）、低或极低（16%以下），也使我们看到其他56个变量与这种水平的相互关联。应当再说一句，这里运用的两个选择出来的变量都是在前面的第三第四章中，在早期的阐述中提出的分期和类型。只要查阅Banks和Textor一书的第77—80页以及附录的计算机印出的第81—86段，读者就能测算出类别不同的社会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

《跨政体概观》的局限在于，只有三分之一的

变量是基于客观的可检验的标准，首先是统计性的，而另外12个变量则是基于主观标准，但是受到了十分清晰的界定，易于进行理智地讨论。比如，这些变量包括上述的分期和类型，也包括“选举制度”、“集团反对派的自由”、“官僚科层的品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特性。这些可能完全是社会的普遍特性，但它们所共有的范围属于主观判断的问题，而且这个范围是有争议的。第三组变量差不多占57个变量的一半，不仅是基于主观标准而且也未加以适当的界定或首先是西方指向而非普遍指向的。这些变量中包括“西化”、“政府的稳定性”、“领导的魅力”、“社团的利益结合”等。

应当看到，这种情况反映的是行为科学的状态而不是Banks和Textor的判断。作者为其选定了最适用的标准，但我们的知识状态是，许多政治和社会特征并未被充分地研究，以致未能被公认为是普遍适用的。尽管有些局限，《跨政体概观》还是能诉诸应用，Philip M·Gregg和Arthur S·Banks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9卷（1965年9号，第602—614页）上发表的“政治系统的各个方面：《跨政体概观》的因素分析”一文对此有很好的说明。

其他一些在定量方面的努力，尤为值得比较现代化的研究者注意的是Simon Kuznets在《经济发

展和文化变革》（1956—1964）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各国经济发展的定量方面”；Norton Ginsburgin《经济发展图表集》（1961）；Karl W·Deutsch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5卷（1961年9月号第493—514页）上发表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以及Frederick Harbison和Charles A·Myers在《教育、人力和经济增长：人的资源发展战略》（1964）第三章中阐明的人的资源发展水平的比较指标。

似乎还应另立一卷公正地评断最近的研究所提出的比较现代化的问题。只消这样说就够了：大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一些政治学家都深深执着于这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将取消传统，这种观点基于形式服从功能的理论假说，就其来龙去脉而言实质上是一种西化观，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经验研究能支持这种假说。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深深感受到传统的滞留力，政治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则以他们受教育的情况和他们的研究方向而异。在他们看来，形式服从功能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即适应变化的功能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各种形式一开始就如此地千姿百态，它们适应变化的功能的能力也如此地千差万别，因而理论假说应当依托于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探索研究也应指向

这些相互迥异的形式及其适应能力。

Harry Eckstein在“普林士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论集第10集”《稳态民主论》(1961)中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说明，尽管它是从不同的背景下为着不同的目的说明这种情况的。Eckslein发展了这种论题：政治系统若要处于稳定状态的话，就必须保持一种权威范型，它必须和社会上流行的家庭的、经济的和社团的权威范型和谐一致。在一些论述政治文化的著作中也展现了相同的分析路数，尤其是G·A·Almond和Sidney Verba撰写的《公民文化》(1963)，它比较了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政治心态；其次还有Clifford Geertz编的《旧的社会与新的国家：亚洲和非洲的现代性探索》(1963)；JJ·Spengler和R·Braibanti 编的《传统、价值与社会经济发展》(1961)和Lucian W·Pye和Sidney Verba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1965)。W·B·Hamilton编的《体制的转变》(1964)分析路数有些不同，尽管其题目标明谈的是体制的转变，但它强调的是本土体制的转变，而不是从更先进的社会引入的体制的转变，而这是一条较容易获得成功的道路。

囊括了众多国家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在早期探索阶段已经存在的问题。Richard L·Merritt和Stein

Rokkan编的《比较民族：跨民族研究的定量数据》（1966）对这些问题作了很好的介绍，这本书与《世界手册》一样是“耶鲁政治数据程序”的产物。有关这个领域的专门研究为数众多，这里只能列举一二：J·H·Steward的“当代变革的跨文化规律”，载《京都美国研究讨论会公报》第2号(1956)第9—17页；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的《经济增长与结构比较研究：关于研究目标与组织的建议》(1959)；S·H·Udy·Jr著的《劳动组织：非工业人员比较生产分析》（1959)和A·Etzioni著的《复杂组织比较分析》（1961）。

东亚是关于引进与适应争论的主要试验基地之一，J·K·Fairbank，E·O·Reischaner和A·M·Craig将他们的《东亚文明史》的第二卷冠以《东亚：现代转变》（1965）的标题，力图表明中国、日本及其邻国的现代化是在传统领域里发生的。他们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一个彻底的现代化了的东亚在其表层文化范型上或在其深层理念和价值上只是现代化的西方的反映”（第9页）。E·O·Reischauer的论文“现代史新观”（1962）和“切近的‘现代化’的定义”首先在日本期刊上发表，后又被美国信息服务公司作为小册子重印。他在这两篇论文中更完善地发展了各种体制执行共

同功能的论题。Hideo Kishimoto在《世界历史杂志》第7卷（1963）第871—874页上发表的“东方的现代化与西化”一文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亚洲研究协会现代日本讨论会计划出版的5个专题论文集将要详尽探讨文化差异的论题，其中两本已经问世：M·B·Jansen编的《日本人关于现代化态度的变迁》(1965)，W·W·Lozkwood编的《日本的国家与经济企业》（1965）。这套论文集将有关日本问题的驳杂的研究集中在现代化的问题上，并有可能对日本经验中的独具因素之间的关系作出十分重要的探索。

关于中国的研究尚未达到如此的境地，也没有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但已开始起步，J·K·Fairbank，Ssu-sü Teng和其他人合编了《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一种纪实性概观1839—1923》(1954)，其中附有一卷本的注释和文献目录。Fairbank在《世界历史杂志》第3卷（1956）第381—406页上发表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问题与建议”提出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分期框架。其他有关用人类学态度对东亚的研究还有M·Nash的《通向现代性的金光大道：当代缅甸的乡村生活》（1956）。

人们对于日本和中国不同经验的比较研究也一直相当重视，A·B·Lole在香港的《Chung Chi 杂

志》第4卷（1965年5月）第99—138页上发表的“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比较”一文对这种研究作了概括。C·E·Black在“亚洲的现代之路”（载《Jiyu》第7卷；1965年10月，第92—99页）一文中提出了涉及日本、中国和俄国的更大范围的比较观点。北海道大学就这个题目开了一次大会，Shigeto Toriyama和Tsuguo Togawa编写的“关于‘现代化’的报告与讨论”对其成果作了报道，此文发表在北海道大学出版的《斯拉夫研究》第10卷（1963）第71—84页。

R·E·Ward和D·A·Rustow的《日本和土耳其的现代化》（1964），力图沟通东亚和西亚，这是吸引了英国、日本、土耳其和美国各路学者的一次独特的国际性冒险。尽管日本和土耳其都有一个有效力的政府遗产，都没有受到直接的外来统治，但这本书对其传统体制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这有助于说明它们今天在发展水平上何以如此不同。

关于中东现代化的富有价值的一般性解释，有D·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亡：中东的现代化进程》（1958）；这是一种开拓性的研究，另外还有M·Halpern的《中东和北非社会变革中的政治》（1963）。关于个别国家的重要的研究有：D·E·Ashford的《墨西哥的政治变革》（1961）；B·

Lewis的《现代土耳其的升起》（1961）；R·H·Pavison的《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856—1876》（1963）；W·R·Polk的《南黎巴嫩的开放，1788—1840：西方对中东的影响之研究》（1963）；C·A·Micand，C·Moore和L·C·Brown的《突尼斯：现代化的政治》（1964）；R·L·Tignor《现代化与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1862—1914》（1966）和R·G·Landen即将问世的《十九世纪末以后的阿曼》。

如果不是篇幅所限，我们还能在这里列出的简要介绍的英文著作的书目上加进法国学者G·Balandier，J·Bercqne，R·Le·Tourneau，R·Montagne和T·L·Miège关于伊斯兰变革的广泛的基本的研究。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学者也作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他们使用西方语言从事写作。

俄国，当然也是热门的研究题目，它是欧洲的一部分，但在体制遗产上却与为现代化理论设立参照系的西欧社会大相径庭。然而，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加剧了意识形态的紧张，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始被当作现代化的一个范例来研究。C·E·Black编著的《俄国的社会转变：1861年以来社会变革的各层面》（1960）一书云集了38个撰写者力图弄清俄国自农奴解放以来整个历史发展中持续的因素和变化的因素，以及实际上表现出来的

独具因素与普遍因素。下列一些著作讨论了相同的问题，但仅限于苏维埃时期：B·Moore, Jr的《苏联的恐怖与进步：苏维埃专政中某些变革与稳定的源头》（1954）；R·A·Bauer, A·Inkeles和C·Klackhohn的《如何研究苏维埃系统：文化、心理和社会的论题》（1956）以及A·Kassof主编的即将面世的专题论文集《苏维埃社会的前景》。

Z·Brzezinski和S·P·Huntington在《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1）中从比较的渠道考察了这两个国家的权力和政策的主要类型，并得出结论：它们很可能沿着与各自不同的传统遗产相和谐的道路实现现代化。

苏联理论家实质上从不同的观点探讨这些问题，有关这个主题的官方教科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2卷，1963）发展了以这种假定为核心的历史理论：苏联发展的模式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其他所有国家注定都要遵循这种模式。G·V·Osipov主编的《苏联社会学》（2卷，1965）提出了苏联的更具学术性也更实际的解释，它提供了广泛的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某些国际比较的文献。能代表苏联关于新国家发展的观点的是T·D·Thornton主编的《苏联眼中的第三世界》(1965)。苏联学者也写了广泛涉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

民与问题的著作，这些研究都是在科学院的资助下开展的。

H·Lefebvre在《现代性引论》（1962）中发展了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是一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1958年被开除出党，Lefebvre寻求依据作为确定现代化过程中本质因素的方法的当代社会学理论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某些政治学家对从过去承继而来的政治体制的持续发生影响的强调，导致了一种从现代视角看待早期历史的新的兴趣。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基础性研究是S·N·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系统》(1963)。他是现代化问题的最重要的研究者；这本书以详尽的分析方法为基础描述并比较了传统政治系统。与其相类似但更限于社会集团的研究有J·H·Steward编著的《水利文明：比较研究》(1955)和K·A·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极权比较研究》（1957）

R·Coulborn主编的重要论文集《历史上的封建主义》（1956）不仅研究了西欧，也研究了日本、中国、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印度、拜占庭帝国和俄国的封建制发展中的统一性。M·Clagett, G·Post和R·Reynolds编著的《二十世纪的欧洲与现代社会的基础》（1961）一书探讨了欧洲的

传统体制与现时代的关联。J·R·Strayer是以上两卷书的主要撰稿人，他在K·W·Deutsch和W·J·Foltz主编的《民族建设》（1963）一书中撰写了“欧洲民族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文，比较了英国和法国的情况。S·P·Huntington在《世界政治》第18卷（1966年3月）第378—414页发表了“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他在这篇令人感兴趣的论文中也注意到了早期历史。S·M·Lipset的《第一个新民族：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看待美国》（1963）从一种比较的框架重新解释了美国历史。

我们能够开列出许多对各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现代化变革进行比较的书目，上述所提及的只是其中一些较为贴切的篇名。迄今所做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但是在我们的概括被恰如其分地检验之前，鉴别一下两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互相依存的问题的各方面是合适的：为了详尽阐发对所有社会都适用的假定与问题的范畴而发展理论；用心研究并比较构成人类的各个社会的个别经验（包括传统的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

让我们不断提出问题并寻求答案吧。

走向未来丛书

1984年出版

人的发现　李平晔著
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　李宝恒译
激动人心的年代　李醒民著
GEB——一条永恒的金带　道·霍夫斯塔特原著
乐秀成编译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根据F·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编译　湛　耕编译
现实与选择　朱嘉明　吕　政著
经济控制论　何维凌　邓英淘编著
探险与世界　于有彬编著
看不见的手　杨君昌编著
语言学与现代科学　陈明远编著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金观涛著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刘青峰著

1985年出版

人的现代化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著
殷陆君编译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汪家熔编著
没有极限的增长　朱利安·林肯·西蒙原著
黄江南　朱嘉明编译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金观涛　唐若昕著
在国际舞台上　陈汉文编著
昨天　今天　明天　邓正来编著
摇篮与墓地　陈越光　陈小雅著

走向未来丛书

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著
第三次数学危机　胡作玄著
凯恩斯革命　杨君昌编著
艺术魅力的探寻　林兴宅著
西方文官系统
杨百揆　陈子明　陈兆钢　李盛平　缪晓非著
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　邓英淘　何维凌编著
新的综合
〔美〕爱德华·奥尔本·威尔逊著　李昆峰编译

1986年出版

富饶的贫困　王小强　白南风著
定量社会学　郭治安　姜璐　沈小峰编译
儒家文化的困境　蒲功森著
系统思想　〔美〕小拉尔夫·弗·迈尔斯主编
杨志信　葛明浩译
日本为什么“成功”　〔日〕森岛通夫著　胡国成译
悲壮的衰落　金观涛　王军衔著
弗洛伊德著作选　约翰·里克曼编　贺明明译
西方的丑学　刘　东著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美〕R·K·默顿著范岱年　吴　忠　蒋效东译
画布上的创造　戴士和著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美〕约瑟夫·阿·
勒文森著　刘·伟　刘　丽　姜铁军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著
黄晓京　彭　强译
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　宋德生著
增长、短缺与效率　〔匈〕亚诺什·科尔内原著
崔之元　钱铭今译

走向未来丛书

1987年出版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钱乘旦　陈意新著
竞争中的合作　陈汉文编著
计量历史学〔苏〕科瓦尔琴科主编　阎一　肖岭译
哲学的还原　麦克斯韦·约翰·查尔斯沃斯著　田晓春译
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　林一知著
人的创世纪　张猛　顾昕　张维宗编著
社会研究方法　〔美〕艾尔·巴比著　李银河译
发展社会学　胡格韦尔特著　白桦　丁一凡编译
上帝怎样掷骰子　陈克艰著
空寂的神殿　谢选骏著
震撼心灵的古旋律　郑一凡著
以权力制约权力　朱光磊著
整体的哲学　金观涛著
人体文化　谢长青　葛岩著
人心中的历史　刘昶著
探寻新的模式　罗首初　万解秋著
发展的主题　周其仁　杜鹰　邱继成著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美〕K·J·阿罗著　陈志武　崔之元译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英〕查·帕·斯诺著　陈恒六　刘兵译
马克斯·韦伯〔英〕弗兰克·帕金著刘东谢维和译

走向未来丛书

1988年出版

波兰危机	王逸舟　苏绍智著
人的哲学	金观涛著
四颗政治风云	怀效锋著
现代化的动力〔美〕C·E·布莱克著	段小光译
信念的活史：文身世界	徐一青　张鹤仙著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	约瑟夫·本-戴维著 赵佳苓译
平等与效率（美）阿瑟·奥肯著	王忠民　黄清译
伦理思想的突破	韦政通著
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	〔荷〕C·A·范坡伊森著 刘东　谢维和译
人口：中国的悬剑	何清涟著
理性主义	陈宣良著
突破省窗	张五常著
第一个工业化社会	钱乘旦著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	叶舒宪著